



上海外国语大学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新丝路学刊

Journal of New Silk Road Studies

(总第10期)

马丽蓉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新丝路学刊编委会

主 编 马丽蓉

编委会名单 (按照姓氏拼音排序)

程 彤 段 晴 郭长刚 李希光 刘迎胜

卢山冰 罗 林 宁 琦 潘志平 荣新江

石源华 王 健 王建新 王林聪 王 文

吴思科 邢广程 许培源 杨福昌 杨富学

杨 恕 于 漫 周 烈

〔西班牙〕安娜·普拉内特

〔巴基斯坦〕纳杰姆丁·谢赫

编辑部主任 杨 阳

执行责编 钱学文

编 辑 王 畅 姜 颖 李圣辉 凌晓逸

目 录

• 特稿 •

-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历史、现状与展望 杨福昌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发展的挑战 姜 锋 / 15

• “一带一路”研究 •

-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以色列经贸合作案例研究 陈广猛 于忠西 / 26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框架内的铁路合作及其意义 王 南 / 5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建设性参与阿富汗社会重建研究 闵 捷 / 69

• 丝路学研究 •

波斯文化典籍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 [荷兰] 阿里阿斯噶尔·赛义德古拉卜 / 84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启示 刘 晨 / 94
丝路沿线佉卢文铭文钱币考述 杨富学 袁 炜 / 121

Contents

• Special Section •

Yang Fuchang, China-Arab Strategic Partnership: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 1

Jiang Feng,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ing China-EU Partnership for Civiliz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 15

• The Belt and Road Studies •

Chen Guangmeng, Yu Zhongxi, A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 26

Wang Nan,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ortance of Railway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 52

Min Jie, Study on China's Constructive Participation in Afghanistan's Social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 69

• Silk Road Studies •

Ali-Asghar Seyed-Ghorab, China's Image in Persian Culture: The Role of Aesthe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84

Liu Chen,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Singapor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 94

Yang Fuxue, Yuan Wei, Circulation and Spreading of the Kharosthi Inscription Coins / 121

• 特稿 •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历史、现状与展望

杨福昌

【摘要】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中阿都是历史上丝路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和缔造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为双方伙伴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是中阿友好合作新的历史起点。从国际因素、阿拉伯国家的需求及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务实态度三个维度看，双方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共同做中东和平稳定的维护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互学互鉴的好朋友，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切实的贡献。

【关键词】 阿拉伯国家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 杨福昌，中国中东学会前会长，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驻科威特、埃及前大使。

一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梳理

（一）古丝绸之路上的中阿交往

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是两个古老的民族，在四个世界文明古国中有三个是由这两个民族缔造的，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早就把双方联系在一起，双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天然伙伴，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通过阿拉伯地区传入欧洲，海上的交流也留下了辉煌的记录。

张骞“凿空”后，丝路畅通，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釉陶等商品，特别是丝绸，大量西运，西亚、中亚各地商品也不断销往中国，形成丝绸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①正是因为有了丝绸之路上的相互了解，先知穆罕默德在 610 年创立伊斯兰教后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说明中国在当地已有一定的知名度。穆圣归真后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使者来华，时值唐永徽二年（651 年），中国史学家将这一年定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元年。

在海上，唐代以前，中国已成为印度洋贸易的重要国家之一。唐代贾耽所著的《皇华四达记》，提及“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中国通向阿拉伯的航道，其多为中外学者引用，弥足珍贵。伊本·胡尔达兹贝所著的《道里邦国志》详细记录了东西交通路线、驿站及贸易情况，其所记录的有关中阿陆海交通路线的内容也是重要的历史地志学参考资料。阿曼航海家阿布·欧拜德·卡塞姆在 7 世纪从苏哈尔航行到广州，这是中阿历史交往中的一段佳话，至今在广州还矗立着“苏哈尔”号帆船纪念碑。^②

1405 年，郑和奉命下西洋，旨在建立明朝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宣扬大明国威及进行通商贸易。他率领的最后一支船队于 1433 年回国，郑和船队先后出使航行 7 次。前 3 次，船队仅到达印度半岛，从第 4 次开始，远行至西亚和非洲，船队去过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有佐法尔、亚丁、麦加、索马里等。郑和船队往往有 200 多艘船，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对促进中国人民同阿拉伯人民相互了解、加强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船队访问过的国家纷纷派员回访。郑和结束航行半个世纪后，欧洲的一些冒险家开始对非洲和亚洲进行掠夺式入侵，开辟殖民地，掠夺资源。^③

古代中阿交往主要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进行。古代官方层面的中阿交往主要包括：（1）以朝贡方式进行的官方政治交往，为中阿人文交流营造与确立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与制度保障；（2）以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互市贸易为主的官方经济往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为中阿人文交流打下了重要

①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第 22 页。

② [阿曼] 阿卜杜拉·侯萨尼：《中国与阿曼苏丹国的历史关系》，《阿拉伯世界》2002 年第 1 期，第 7 页。

③ 王铁铮：《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第 118 页。

的物质基础。古代民间层面的中阿交往主要包括：（1）阿拉伯传教士与中国朝觐者的宗教之旅，为中阿交往夯实了社会民意基础；（2）学术之旅成为中阿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相关人士撰写的见闻游记为中阿交往提供了史料佐证；（3）往来于陆、海“丝绸之路”的中阿商贸之旅，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理念，为中阿交往提供了原动力。

（二）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三次建交高潮

新中国同 22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出现三次建交高潮，具体情况如下。

1. 万隆会议开启了中阿建交的大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国家开展了气势磅礴的民族解放运动。新独立国家百废待兴，力求摆脱外界干扰，自立自强。在此背景下，亚非两大洲 29 个国家领导人于 1955 年 4 月 18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亚非会议，体现了他们对联合自强的追求，激励着亚非人民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携手并肩，共同战斗。出席万隆会议的有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沙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 9 个阿拉伯国家。^① 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同这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表示支持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主张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呼吁解决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支持北非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周总理指出，“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争取独立的附属国人民的暴力镇压还没有停止；在南非联邦和其他地区进行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迫害还没有制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② 可以说，万隆会议为中阿双方提供了一个进行了解的机会，加深彼此的了解为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埃及是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是都持有反帝、反殖、支持民族独立的共同立场，经历了相互了解，先民间、

^① 杨福昌：《发扬传统友谊 再创辉煌未来》，《西亚非洲》2006 年第 6 期，第 9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 150 页。

后官方，文化、经贸开路，两国最终达到政治上建交的目的。中埃在正式建交前已有文化和经济上的往来。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艾哈迈德·巴库里访华，中埃两国签订了文化合作会谈纪要，其规定双方互派老师和学生任教及学习。同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布·努赛尔访华，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及议定书，其规定双方互设享有一定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在中埃两国签订文化合作会谈纪要后，中国主管部门立即决定派1名老师、7名学生赴埃。在中埃正式建交前不到半年时间，两国完成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1956年5月16日，埃及内阁会议通过决议，断绝同中国台湾的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使节。5月30日，中埃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考虑到两国的相互愿望，已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①

从1956年同埃及建交开始，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一共有10个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它们分别是：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索马里、突尼斯、毛里塔尼亚。^②

2.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带动了中阿建交的第二次高潮

“文革”期间，极“左”思潮不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极大破坏，对中国的外交也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的使节基本被召回，仅留下驻埃及大使一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受到了影响，1966年，双边贸易额为1.66亿美元；1967年、1968年平均仅为800万~900万美元。1965~1971年，中国没有再同新的阿拉伯国家建交，国内的极“左”思潮对中阿关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1971年，第26届联大讨论中国问题时，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扫清了一些国家同中国建交的重要障碍。促成第二次中阿建交高潮的原因除了

①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年第21期。

② 杨福昌：《中阿关系的回顾和展望》，《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2期，第5页。

③ 顾坚：《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与阿拉伯世界》，《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42页。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还包括中国在外交上纠正极“左”思潮、美国调整对华立场等。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事业的立场也鲜明如初。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于6月6日致电埃及纳赛尔总统、叙利亚阿塔西总统及巴解组织舒凯里主席，对这些国家和组织抗击入侵表示支持和进行声援。同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①阿拉伯国家积极评价中国的坚定立场。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改变对华立场，中美关系得到缓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为它的盟国和其他同它关系密切的国家同中国建交开了“绿灯”。

1971~1978年，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掀起了第二次建交高潮，这一时期同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有6个，它们分别是：科威特、黎巴嫩、科摩罗、约旦、阿曼、利比亚。

3.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了中阿建交的第三次高潮

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进行了战略性调整。首先，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明确提出不与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借助一方对抗另一方，妥善处理好同大国的外交关系。其次，中国非常重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推行睦邻友好政策。最后，中国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依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没有忘却这一属性，同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密切联系，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主要是海湾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处于权威地位，沙特更是这一宗教的发源地，它们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双方建交推迟的原因之一。当中国以开放的思维、和平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时，在中国国内各种宗教都受到尊重、人民享有充分信仰自由这一情况被外界所了解后，中国和上述国家在建交上的障碍自然消除了。

^① 杨福昌：《中阿关系的回顾和展望》，《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2期，第6页。

1979~1990年,中国同吉布提、阿联酋、卡塔尔、巴勒斯坦、巴林、沙特等6个国家建交。至此,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 新时期的中阿关系

随着中国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阿积极发展双边关系,进行政治、经贸、科技、文教、军事、卫生、体育、新闻等领域的合作,构建起面向21世纪的友好合作关系。中阿双方关系发展如此顺利,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双方都未把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关系的考虑因素。政治上,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阿拉伯国家大多是伊斯兰国家;经济上,双方发展方式各异,但都尊重对方实行的制度,支持对方选择的发展道路,做到“道并行而不相悖”。

二是双方相互支持,特别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时,支持立场更加坚定。阿拉伯国家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目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尚未恢复、难民问题尚未解决。

三是双方经济互补性强。以贸易为例,中国向阿方出口的多为机械、工业制品、纺织产品等,进口的主要是石油。中国生产石油,但无法满足需求,以2017年情况为例,中国产油1.91亿吨,消耗6.2亿吨,进口4.24亿吨,其中1.57亿吨是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占当年石油进口总量的37%。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中阿关系将持续健康发展。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简称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21世纪探索的新型合作模式。在2004年9月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阿关系被确定为“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中阿双方进入了集体对话与合作的轨道。这也成为推动中阿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机制,是促进中阿双方友好往来的重要平台。

2010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提出“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中阿关系进入了全面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在中阿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一）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建交 60 多年来，中阿关系健康、顺利发展，一条主线就是相互尊重、相互支持。2016 年，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阐述发展中阿关系的指导原则，规划中阿互利合作蓝图，为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提供了政策性的指引。同年，习近平主席对沙特、埃及和伊朗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并在阿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习近平在演讲中就实现中东稳定提出了中国的建议，就深化中阿合作阐明了中国的主张。

在 2018 年 7 月 10 日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中阿双方同意将中阿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阿方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做中东和平稳定的维护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互学互鉴的好朋友。”^①

从定位“新型伙伴关系”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再到推进“战略伙伴关系”，中阿关系在双方共同推动下不断迈向新的高度。^②

政治上联系更加密切。除双边关系被提升为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外，双方还要共同建设中阿命运共同体，把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同阿拉伯民族的复兴梦联系起来。中国一直把阿拉伯世界放在对外关系的重要位置，中国的中东政策考虑到支持中东人民追求和平、谋求发展的愿望。首先，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改变阿盟秘书长于 2018 年 10 月下旬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的“碎片化及分裂”状态，像一家人一样，互帮互助；其次，对于阿拉伯国家内部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的问题，中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不激化矛盾，不诉诸武力，力促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最后，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恐斗争，不实现安定，就不会有发

①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l/2018/0710/cb4094-3013853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7 月 10 日。

② 李伟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基础、现状与趋势》，《西亚非洲》2018 年第 4 期，第 4 页。

展,其实安定和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

经济合作达到新水平。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过去的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转为由消费拉动增长。2017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58.8%。中国坚持开放政策,进口必要物品,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求,2018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揭幕,这是推动中国今后5年内实现进口额达8万亿美元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2017年中国进口额达18409亿美元,所以进口额达8万亿美元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14亿人口的大市场对阿拉伯国家肯定有吸引力。从能源合作来看,2017年中国进口原油4.24亿吨,其中从阿拉伯国家进口1.57亿吨。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进口原油5.4亿吨,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原油自然相对增加。^①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5万亿美元,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平均每年约为2000亿美元,最高年份为2014年,贸易额达到2510亿美元,因油价下跌,2017年为1913亿美元。由于中阿双方经济结构不同,互补性强,贸易额将持续增长。

产能不足、基础设施落后、融资难等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瓶颈问题。中国提出通过产能合作提升阿拉伯国家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补产能之不足。这种合作有的是一对一形式的,即企业对企业;有的是通过中国同有关国家合建的经济工业园区进行的。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为例,有数十个中国企业入驻该园区,其产值已经达到7亿美元,向当地缴纳税费5800万美元,带动3300人就业。园区内有一家由中国公司建立的玻璃纤维厂,已投资5亿多美元,年产量为20万吨,在世界同行业中名列前茅,产品99%出口,为埃及增加了税收及外汇收入。在融资难问题上,作为“一带一路”的提出者,中国设立了丝路基金,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它们都可以提供融资方便。2018年7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宣布,中国设立了150亿美元支持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和1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中国在卡塔尔、阿联酋设立人民币清算中心,并同两国设立共计2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西方国家恶意宣传,称中国的贷款使相关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对

^① 外交部副部长张明于2014年6月3日在“一带一路”研讨会上的讲话。

此，在2018年10月14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巴厘岛年会上，埃及投资与国际合作部长萨哈尔表示，中国在能源、铁路、房地产和炼厂等诸多领域对埃及进行了投资，中国的投资没有任何威胁，是双赢的过程。在2018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吉布提丝路国际银行行长盖迪更是一针见血，他说：“中国投资并未产生负债危机，只不过吉中合作让有些欧美企业失去机会，产生不满。”^① 外国朋友以亲身感受说话，比我们出面批驳更有力。

（二）“一带一路”倡议受到阿拉伯国家欢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提供了新平台。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泛起，有的国家为一己之私，挑起贸易战，搅乱了国际贸易秩序，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引起众多国家不满，其中包括欧洲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为维护多边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搭建了有益的平台。在2018年7月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双方同意，“强调加强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强调世界贸易组织在规范和促进国际贸易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支持和帮助”。“一带一路”倡议适应了国际形势，推动了全球化发展。

经历了近8年的动荡，阿拉伯国家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实现安定与发展，这8年恰是世界发生大变化的时期，有的阿拉伯国家在变化中找到机遇，发展了自己；有的阿拉伯国家错过了相关机会，发展受阻。我们相信，阿拉伯国家凭借自身的禀赋定能实现梦想：（1）有约3.6亿人口，青年占很大比例，为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2）有丰富的油气等自然资源，带来了巨大的财富；（3）地理位置优越，四通八达；（4）有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庞大的侨民群体，能与各国建立广泛的联系；（5）经历“阿拉伯之春”洗礼的人民要求变革，要求提高生活水平，领导者也在努力满足人民的要求，这一内在变化是推动国家发

^① 《多国高官驳斥“中国债务陷阱”论：部分西方国家在嫉妒中国》，人民网，<http://m.people.cn/n4/2018/0524/c23-1103183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24日。

展的主要因素。阿拉伯国家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大动荡之后,有的要重建,有的要转型,有的要提升,实现这些目标都需要资金、技术和经验,“一带一路”倡议为它们提供了相关机遇。

中国为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商涵盖两方面意义:一是同有关国家的发展规划对接;二是具体项目由合作方共同商定。在这个过程中,中方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在经济合作中谋求政治私利。国家发改委在 2018 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 2017 年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达成的 279 项成果中,有 265 项已经完成或转为常态工作,剩下的 14 项正在督办推进,落实率达 95%。不论是在“共商”原则中体现的民主精神,还是在落实项目中体现的认真态度,都证明中国是一个务实讲诚信的国家。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表示,在阿中合作进程中,我们完全感受到中方的诚意,绝对信任中国领导人指引的方向。^①

以上从国际因素、阿拉伯国家的需求以及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务实态度三个维度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欢迎的原因。

三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展望

在战略伙伴关系的引领、中阿合作论坛机制完善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

(一) 深化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的中阿关系

2018 年 7 月 10 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讲话,宣布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阿方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

^① 《钟声:新时代中阿关系发展大有可为》,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711/c40531-30139262.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7 月 31 日。

同做中东和平稳定的维护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互学互鉴的好朋友，努力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①

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后，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进程受到影响。在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形势较为稳定，它们迫切需要恢复秩序、发展经济。阿拉伯国家在中国对外交往的版图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是连接欧亚的重要纽带，为联通东西、实现贸易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拉伯国家正“向东看”，聚集中国，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中阿双方取向一致，相向而行。双方应共同认真落实中阿合作论坛行动计划，抓住历史机遇，用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强互利合作。

（二）拓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阿合作领域

“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分布在东北亚、东南亚、中亚、中东、中东欧等地区，阿拉伯国家处于“一带一路”的重要位置上。

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1+2+3”合作格局。中阿共建“一带一路”首先要实现政策沟通，规划好方向。在落实具体项目时，做好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减少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风险。

展望未来，中阿合作将拓展至更多领域：（1）在能源领域，坚持中阿双方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加强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务实合作，鼓励双方在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合作；（2）在经贸领域，继续举办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和其他贸易投资推介活动，完善经贸合作领域的法律框架，深化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3）在基础设施领域，中方既要发挥在路桥建设、电力通信设施方面的优势，也要对当地具体的投资环境进行充分评

^①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l/2018/0710/cb4094-3013853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0日。

估,如中国参与建设的阿尔及利亚中心港、阿联酋哈里发港二期集装箱码头、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等核心项目,要为完善当地物流网络、带动就业创业、拉动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4)在高科技领域,中阿在航空航天、生物制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卫星导航已发展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合作的亮点,我国于 2018 年 4 月在突尼斯建立了中阿北斗/GNSS 中心,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向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服务,并在 2020 年具备全球服务能力。

中阿共建“一带一路”要进一步加强传统领域的合作,发挥中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并加强中阿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探索合作新模式、新领域。

(三) 中阿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自 1956 年陆续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双边关系的一条主线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合作共赢。尤其是在 2004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与中国在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双边关系快速发展。中阿双方加强投资和产能合作、人文交流等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五通”原则,又符合双方发展的切实诉求。

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活动频繁,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中阿学术界和民间的交流活动很多,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发生动荡后,双方通过举行研讨会等正确解读事态,消除误读。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也有“文明对话”机制,自 2005 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研讨会。虽然中东局势动荡,但相关活动并未中断。^①

在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中阿人文交流前景广阔,中阿双方将继续完善、巩固中阿友好大会机制,向中阿各友好协会提供更多支持;推动中阿城市间建立更多友好关系;加强中阿双方在青年交流、妇女对话、减贫助弱等诸多领域的合作。

^① 《杨福昌:相向而行令中阿关系持续发展》,环球网, <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8-07/12409009.html?agt=15438>,最后访问日期:2017 年 7 月 4 日。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人文基础。民心相通有利于增进中阿民众的友好感情，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把“进一步密切中阿人文交流”作为推动中阿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强调“中国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致力于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文件还强调要“加强文明对话，推进不同宗教间的交流。搭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和宽容，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①

中阿通过历史上的交往结下了以“丝路精神”为载体的传统友谊。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为中阿人民增进友好感情、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四 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阿双方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各异，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使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是双方的共同目标。双方都尊重对方的选择，这是中阿构建良好政治关系的基础。中阿是天然合作伙伴，在发展上具有互补性，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阿拉伯国家提出“向东看”，双方取向一致，相向而行。中阿对于提升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已有全新的认识和强烈的愿望，中阿关系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机遇期。中国愿同阿拉伯国家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引领下，共同维护中东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杨 阳)

^① 吴思科：《文化交流与互鉴：中阿关系的基石》，《公共外交季刊》2016年第4期，第47页。

China-Arab Strategic Partnership: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Yang Fuchang

Abstract: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long-lasting. Both China and Arab states ar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and creators of the Silk Road civilization in histo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ab states have established soun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nership.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future-orient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is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China-Arab friendly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three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Arab states and China's pragmatic approach, the two sides will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maintain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Middle East, promote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advance common development. China and the Arab world will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China and Arab states,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Arab States; China-Arab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Belt and Road

• 特稿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发展的挑战^{*}

姜 锋

【摘 要】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被视为中国和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加强文明互鉴的宝贵遗产。这部中国古代典籍在欧洲的翻译和传播推动了中欧之间以及中欧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明互动进程，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历史上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互动目的是“取经求道”，欧洲国家与它们的互动目的则更多体现为“争强求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沿线国家，将它们作为共建的主体，而不仅是被动的对象，这包括中欧之间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也涉及与共建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互动模式。欧洲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经历了从质疑到逐渐了解再到积极认识的过程，但中欧伙伴关系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中欧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挥加强文明互鉴的火车头作用，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全区域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区域样板。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欧文明互鉴 区域治理

【作者简介】姜锋，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文明互鉴一直是中欧相互认知、互利共赢的重要依托。记载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风土人情等的《大唐西域记》等中

* 本文根据姜锋在第二届“丝路学·国际论坛”开幕式上做的主旨发言整理而成。

国古代典籍曾在欧洲文明认知亚洲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后，欧洲人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方式进行了殖民扩张。中国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互动方式是“取经求道”，欧洲与它们的互动方式是“争强求富”。在古丝绸之路发展时期，沿线国家是“被动的”“对象”；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应成为“主动的”“主体”。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政府于 2014 年发布了《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要构建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并指出“中国愿与欧盟一道，将东西方两大文明更紧密结合起来，树立不同文明和而不同、多元一体、互鉴互学、共同繁荣的典范”，以“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的全球影响力”。^①

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欧洲文明式微

近现代以来，欧洲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思想、知识与制度，国际关系中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也都诞生于欧洲并由欧洲国家主导，但欧洲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明互动，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实现的，本质上由殖民扩张驱动，展现的是文明互动过程中的“刚强”“冲突”“武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文明问题已经上升为影响世界秩序的主要问题之一^②，欧盟定义的欧洲是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欧洲，是自我压缩后的“小欧洲”，难以整体地延续欧洲文明。近年来，在欧洲政治话语体系中，“价值共同体”一词的出现频率快速攀升，与此高度关联的是“欧洲的”“跨大西洋的”“基督教的”“自由政体的”“北约”等，它们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区域、结盟、军事和宗教属性，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作为对当代欧洲文明的高度体现，欧盟为自身的发展设定了思想上和空间上的界限，既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又无法造福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如果欧洲文明式微，那么欧洲恐怕无法延续近现代以来的文明传统，难有往昔的视野、思想和力量，这

① 《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全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4/02/c_111005455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5 月 20 日。

② 郭树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外交转型》，《国际观察》2019 年第 3 期，第 1 页。

已经成为欧洲难以回避的历史困境。具体到欧洲文明式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一）欧洲经济的停滞

从表面来看，欧盟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程度逐渐提高；从深层来看，欧洲经济开始萎缩，退守“欧盟要塞”，“朋友圈”不断固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引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且其蔓延至欧元区其他国家，最终演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虽然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了救助机制，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① 2008～2017年，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7.61%降至15.12%；在互联网时代，排在全球前十位的互联网企业无一来自欧洲；欧洲专利数量占国际专利数量的比重持续下降。

（二）欧洲思想文化的封闭

就“人文品质”来说，一个开放、团结、繁荣、有强大人文精神的欧洲更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同，因而不能放弃欧盟曾经追寻的“人文强洲”理想。在冷战时期，推动西方与苏联和东欧阵营和解与合作的德国政治家艾贡·巴尔在生前担心年轻一代变成外交上的浪漫派。近年来，一些未经战争苦难的新生代欧洲政治领导人一边宣扬多边主义，另一边却热衷于实行单边主义，给“多边主义”套上价值观的“紧箍咒”，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划线，建立涉及价值观的“小圈子”，这限制了欧盟国家的思想和科技创新力。

（三）欧洲人口和族群结构的深刻变化

伴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现代化的发展，欧洲不再是由基督教文化统治的欧洲，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比例正在逐渐上升。2016年，欧洲穆斯林数量占总人数的6%；到2030年时，预计将达到8%，甚至更高。^② 有些欧洲国家的领

① 孙涵：《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特殊性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第16页。

② 姜锋：《屡遭恐袭，欧洲应反思“真问题”》，环球视野，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1296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5月20日。

导人甚至认为,欧洲基督徒的宗教意识正在被削弱,笃信教义的穆斯林的数量将很快超过虔诚的基督徒。由移民形成的新族群对国家和地区治理提出新要求,而要使多个单一神教和睦相处,进而对多族群和多宗教社会进行有效治理,远比治理单一民族及单一宗教复杂得多。欧洲政治精英当前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修正传统欧洲基督教文明及其政治思想基础和价值观念,以适应新的文明结构和社会结构。

(四) 欧洲安全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

极端势力借助互联网传播极端思想,诱发“独狼式”恐袭。2016年,维尔兹堡火车杀手就受到了极端思想的教唆。各种信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互联网使人越来越“去社会化”,恐怖暴力日趋“个性化”,“独狼式”恐袭的频现直接导致社会安全治理难度大幅提高。安全失去屏障,社会恐慌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欧洲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五) 欧洲实力被削弱的表现

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冷战后,整个世界格局逐渐由美国主导,全球政治、经济、科技乃至文化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欧之间的利益冲突更趋激烈。仅从美国竭力推动英国脱欧、打压德国来看,美国希望看到的欧洲是一个弱到不得不听命于美国、强到可以跟随美国的欧洲,是一个能够维护美国利益的欧洲。

其实,当今欧洲文明式微源于欧洲缺乏鼎盛时期的理念和视野,源于欧洲治理体系和单边主义盛行造成的欧洲社会撕裂,如难民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裂,加重了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使国内政治中的排外情绪增加;难民的大量涌入还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使主导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西欧文化受到冲击。^①

^① 闫瑾、籍正:《欧洲难民治理的困境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国际论坛》2019年第1期。

二 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变化

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美欧之间甚至欧洲内部价值观出现分裂的当前^①，随着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从质疑到逐渐了解再到积极认识的过程，中欧共建“一带一路”具有更为广阔的全球意义。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它具有天下大同、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精神。在“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中，欧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处，也是“一带一路”的西端终点，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欧洲地理环境复杂，国家众多，“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实施应该基于不同国别，做到因地制宜。由于欧盟主导欧洲的对外贸易、金融、投资等，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直接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实施情况。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广背景下，多个合作项目成功实施，例如，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营使中德两国在制度和规则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中国公司承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项目的80%多的资金由欧盟区域发展基金提供；法国、英国等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绿色金融项目。“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有利于中欧在更多领域加强合作，这样，中欧伙伴关系将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欧洲逐渐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欧洲发展以及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发展的重大意义。多个欧盟成员国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备忘录。中欧战略对话机制的完善使由“领导人”与“战略、经贸、人文”组成的“1+3”高层对话格局逐渐形成。

^① 赵磊：《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115页。

(一) “一带一路”倡议为欧洲提供发展机遇

近年来,随着欧洲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性困难成为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欧洲经济界整体上对中欧关系持较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德国外贸组织主席宾格曼呼吁德国不要陷入“中国恐惧症”;针对中国是“制度竞争者”“制度对手”的说法,代表上百万个德国企业利益的德国联邦雇主协会主席克拉默指出,竞争对德国企业来说是积极的,这能够激发德国经济的活力。2019年,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协议后,欧洲各界对“一带一路”项目的看法变得更加积极,“‘一带一路’带给欧洲的发展机遇多于挑战”这一基本判断正在被更多的人接受。截至2018年底,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1.3万列,往返于中国多地与15个欧洲国家的49个城市,已成为中欧互联互通的亮丽名片。^①当前,中国正采取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进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②中欧之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潜力巨大。

(二)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欧安全合作提供新路径

冷战后,一些欧美国家实行军事干涉主义安全政策。然而,武力没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却使更多的国家与地区陷入动荡,大量难民涌入欧洲。2014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正式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求,为中国的发展和复兴提供强大的战略支持。与美国武力至上的“实力换和平”安全理念相对,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了“相互关联的安全观”,其为国际多边合作增加了理念支撑。^③默克尔提出的“相互关联的安全观”为广义安全观,一方面意味着德国和美国在外

① 《欧盟学者: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日趋积极》,《中国青年报》2019年4月24日。

②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6/c_1210119584.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5月20日。

③ 《姜锋:德国外交或正进入新阶段》,环球网, <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KiHnX>,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3月5日。

交核心理念上产生分歧；另一方面表明德国为国际事务的多边共商敞开了大门，比如针对非洲发展议题，默克尔认同中国为促进非洲发展做出的贡献，认为只有消除贫困，才能保证非洲的安全，使非洲保持稳定，获得相应的福祉，进而解决困扰欧洲的难民问题。

基于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应进一步加强对话、交流，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入合作，进而助力全球治理，实现共同发展。双方可通过加强与非洲等第三方的合作，共同促进欠发展国家和地区发展，以实质性地解决贫困问题，从根本上消除全球难民问题。

三 “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中欧文明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

欧盟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一些国家对部分项目存有疑虑，甚至指责中国。中欧文明伙伴关系的构建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欧之间存在理念上的差异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中国文化有一种寻找“共同”的特点，即在“不同”之中寻找“共同”。这不同于欧洲寻找“差异”的文化，即在“共同”之中寻找“差异”，并把“差异”视为异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参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实现不同文明的共生和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传统国际关系中截然划分“你”“我”、谋求私利的理念有着显著的差别，其要被欧洲接受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二）中欧知识界存在“信任赤字”

欧洲学界依然存在一些抹黑中国的假命题，这些假命题是某些专家和智库的意见，具有很强的所谓“权威性”与“影响力”。最为棘手的是，这些假命题可能导致欧洲最终选择的策略不合适。

一些欧美智库称中国是对西方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不少西方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一些欧洲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优先”。对此，欧洲的有识之士表示担忧，希望中欧通过加强信息交流，防止“假命题”不断固化。

(三) 民心相通的不足制约了欧洲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

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到国际合作和竞争中，但根据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权威评估，文化沟通类风险居各类风险之首，覆盖率达 71.3%，高于主权类风险的 46.9%。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程中，尽管中国努力推动构建中欧人文交流与对话机制，促进中欧民众互相理解与增进信任，但收效有限。中欧文明伙伴关系深化的“瓶颈”从深层次来看就是缺少“民心相通”。

(四)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能力体系的力量有待加强

中欧之间的“理解赤字”是由中方话语供给不足和欧洲理解片面造成的，不能通过解释或说明具体事件及现象予以解决，也不能通过一般的外交交涉、媒体澄清或学术交锋予以解决。双方应通过进行系统的梳理，达成社会共识，进而予以解决，共识的达成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① 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 3 月会见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时明确指出，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掌握一种语言就掌握了打开一国文化大门的钥匙。外语能力与话语能力密不可分，我国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全面推进外语能力建设，再将外语能力建设上升到话语能力建设，努力构建中国的学术理论体系和话语能力体系。

(五) 对“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

外语教育是国家大事，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外语教育情况与中国的发展

^① 《姜锋：中欧迫切需要填补话语赤字》，环球网，<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mKjCOO>，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4 月 9 日。

情况息息相关。我国外语教育家王季愚曾提出，“外语水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著名外语教育家许国璋一再强调，外语教育是“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在国家层面，外语教育应该被视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方式。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广背景下，“多语种+”教学模式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我国应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人才，培养具有卓越国际沟通能力的人才以及精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国情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培养能够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灵魂”的人才。

四 结语

早在17世纪，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就指出，人类较高水平的文化和文明聚集在我们整个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中国。两端的文明和文化各有“上”“下”，中国在政治制度、社会实践方面处于“上”，而思想哲学处于“上”略微“下”。如果中国和欧洲密切合作的话，那么就可以使处于两端之间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逐步过上理智的生活。^① 中国文明观的核心是，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参与国家从“对象”转为“主体”。“一带一路”建设要弘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参与者应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广泛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

尽管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中欧在密切经贸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应加强高质量的人文交流；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中欧文明互鉴，发挥“火车头”作用，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全区域样板。随着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中欧文明互鉴的内涵不断丰富。其中，“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

^①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Novissima Sinica (1697) Das Neueste von China* (München: IUDICIUM Verlag, 2010).

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① 随着交流互鉴的深入，中欧之间的理念相通、话语相通、民心相通，中欧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中欧文明伙伴关系越来越紧密。

(责任编辑：闵 捷)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ing China-EU Partnership for Civiliz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Jiang Feng

Abstract: *Da Tang Xi Yu J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a great work written by Xuan Zang, has been regarded as a valuable heritage for strengthening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is ancient Chinese classic in Europe has promot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ivilizations interactions among China, Europe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It also shows the different interaction purposes from China and Europe to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respectively. The former aimed for a pilgrimage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while the latter focused more on striving for prosperity and wealth. Nowaday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aised by China takes hold in that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are joint subjects instead of passive targets in the cooperation process. Different from the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egions” interaction modes in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Europe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are regarded as joint subjects in the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①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网站，http://www.2019cdac.com/2019-05/15/c_1210134648.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26日。

Road. Concerning the Europe's cognition to the Belt and Road, it shows a process from questioning to gradually understanding and then actively recognizing, however, i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As the role of civilization locomotives, China and Europe should strengthen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develop a whole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to provide a new regional model for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Regional Governanc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与以色列 经贸合作案例研究

陈广猛 于忠西

【摘 要】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以色列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国家，通过加入亚投行等方式积极加强同中国的合作。重庆市作为中国西部的内陆开放高地，近年来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不断加强。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与以色列的总体经贸情况，其次依据详细数据分析重庆与以色列经贸关系的历史和发展现状，最后分别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对重庆与以色列经贸关系的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重庆与以色列在科技、人文等领域深入合作。

【关键词】重庆 以色列 经贸关系

【作者简介】陈广猛，四川外国语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忠西，四川外国语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以色列是一个以创新创业闻名于世的国度，不仅运用高科技农业将荒芜的沙漠变为绿洲，还凭借国民突出的创新创业精神成功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①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加快生产结构转型，中国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西部大开发的重要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4日。

战略支点，重庆近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成绩斐然。但由于地处内陆，整体发展状况较沿海地区落后，亟须注入创新要素，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为了给重庆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重庆市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寻求同以色列政府及企业的进一步合作，促使双方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取得更多成果，推动双方形成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一 中国与以色列经贸关系的基本情况

1992年1月24日，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利维访华，同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签署建交公报，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①。自建交以来，中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合作领域不断拓宽。1992年10月，双方成立了经济贸易混委会，来监督、推动合作。两国现有“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和“中以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机制”两个合作平台，它们为双方的经贸合作提供保障机制。自2016年以来，中以双方启动了自由贸易区谈判，迄今为止已进行了七轮（最新一轮于2019年11月在以色列进行），双方就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等议题展开磋商，取得了积极进展。中以自贸协定一旦签署，以色列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以及对华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都将迎来重要发展机会。此外，1994年、1997年、2009年和2014年，以色列分别在上海、香港、广州、成都设立了领事馆，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2017年3月，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期间，中以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就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中以双边经贸关系总体情况

总体而言，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以色列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科研团队，两国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随着中以双边关系不断加深，以色列已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主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中国已是以色列在亚洲地区的第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建交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96/1207_677208/t644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4日。

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2018 年, 双边贸易额达到 139.1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 其中, 中国对以出口额达到 92.7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 从以进口额达到 46.4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0.3%^①。

从经济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 由于自然资源贫乏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政策, 以色列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十分艰难。在此情势下, 以色列通过不断地努力, 着眼于国外市场, 重视科技和教育, 将人力资本作为发展优势, 取得了经济领域的长足发展。2010 年 8 月, 凭借“外交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 以色列被接纳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进行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色列经济当前最主要的优势是创新能力, 而中国最能吸引以色列的是规模巨大的市场, 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尽管中以两国于 1992 年便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贸易协定》^②, 但当时两国的贸易额并不突出。自 1992 年大批原苏联犹太裔科学家移民至以色列以来, 以色列科技人才数量激增, 科研水平快速提升, 科技实力不断增强, 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贸易额也在 1994 年之后不断增长。同时, 两国还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及议定书》(1995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关于加强经济贸易合作的备忘录》(2005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以色列国工业、贸易和劳动部关于进一步推动中以高技术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8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为对方商务、旅游、探亲人员互发多次签证的协定》(2016 年 3 月) 等一系列文件来促进双边经贸关系发展。2013 年, 中以双边贸易额突破 100 亿美元。

由图 1 可知, 1994 ~ 2018 年, 中以进出口总额总体处于上升态势, 大致可分为下述两个阶段: 1994 ~ 2008 年和 2009 ~ 2018 年。2008 年, 经济危机在全球蔓延, 中国和以色列的经济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中国的 GDP 增速由 2007 年

① 《2018 年 12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 总值表 (美元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6/2278978/index.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11 月 4 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 条约数据库, <http://treaty.mfa.gov.cn/Treaty/web/detail.jsp?objid=1531876666956>, 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11 月 4 日。

的 13.0% 降至 2008 年的 9.6%，以色列的 GDP 增速由 2007 年的 5.4% 降至 2008 年的 4.0%^①。中以进出口总额也出现下滑，2009 年的进出口总额明显低于 2008 年。自 2016 年以来，由于以色列与中国的合作不断加强，中以进出口总额增速较为稳定。2019 年，中国与以色列的进出口总额为 147.67 亿美元，达到中以建交以来的最大值。^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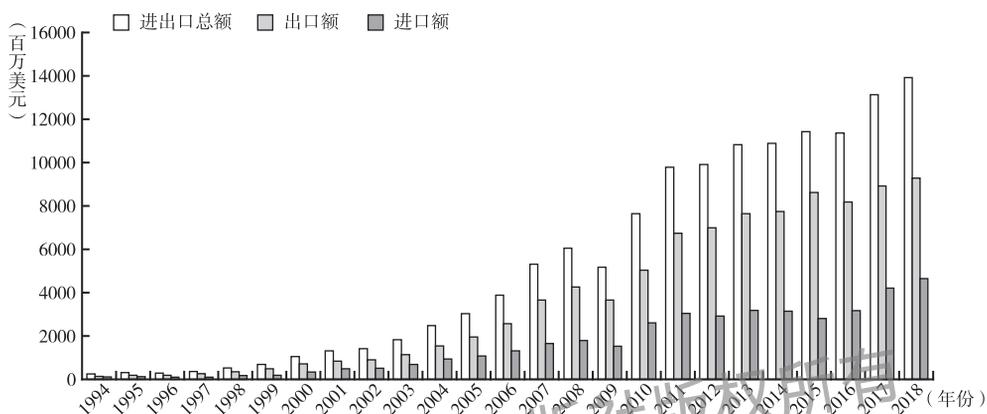


图 1 1994 - 2018 年中以贸易情况

资料来源:《统计月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6/2278978/index.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11 月 4 日。

具体而言, 中国对以色列出口额排前三位的产品分别为机电类、纺织类和化工产品; 中国自以色列进口额排前三位的产品分别为机电类、化工类和珠宝首饰类产品。中国若想扩大对以色列的出口规模, 则需从这些产品中谋求更多优势, 积极注入创新动力, 投入更多研发资金, 提升科技含量, 谋求产品品质提升。

排除外部因素影响, 自 2009 年以来, 中以经贸交流一直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目前, 中国是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 以色列对中国的

①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 http://www.cbs.gov.il/reader/shnaton/templ_shnaton_e.html?num_tab=st1_6_01&CYear=2018, 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11 月 4 日。

② 《2019 年 12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7/302276/2851396/index.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5 月 1 日。

年出口额占其对亚洲年出口总额的 37.5%。2017 年,以色列对华货物出口额为 33 亿美元,主要涉及机器和电子(占比为 41%)、医疗设备(占比为 25%)、化工(占比为 19%)、金属(占比为 5%)、塑料和橡胶(占比为 4%)等行业。据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统计,2017 年共有 271 家以色列企业首次向中国出口产品,其中,医疗设备相关企业为 20 家,移动和电子相关企业为 40 家,农业相关企业为 5 家,美妆护肤相关企业为 13 家,清洁科技相关企业为 7 家,^①如出口医疗设备的梯瓦制药(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imited)、出口农产品的阿菲金(Afimilk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Ltd.)、出口滴灌设备的耐特菲姆(Netafim)、出口美妆护肤品的阿哈瓦(AHAVA)、出口净水产品的 AST 科技(AST Clean Water Technologies)等,这些企业大多是中国以色列商会的会员^②。目前,在以色列市场经营业务的主要中国企业是大型国有企业,如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数量相对较少。2018 年 4 月,以色列中资企业商会(Chinese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in Israel, CEAI)在特拉维夫成立,^③将有效推动中国企业在以色列发展。

(二) 中以双边经贸情况分析

总体而言,近年来,中国同以色列的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从食品、钻石、化工等传统商品贸易朝着高科技产品、新能源、生物技术、现代医药等方向转变,产品结构呈现多样化态势。中国的一些高附加值出口产品如荣威汽车、长城皮卡、中兴智能手机等成功进入以色列市场,联想笔记本电脑更是在出口到以色列的同类商品中最畅销,占据了约 1/4 的市场份额,^④以色列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如耐特菲姆滴灌系统、Vionic 安防设备等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其中,2016 年,耐

① 《2018 年第一季度以色列对华出口大幅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 <http://il.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07/20180702764190.s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② 《商会介绍》,中国以色列商会网站, <https://www.ischam.org/zh-hans/商会介绍/>, 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2 月 4 日。

③ 《以色列中资企业商会在特拉维夫成立(图)》,国际在线, <http://news.cri.cn/20180421/de325052-470e-96f0-c676-eea5d969faa5.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2 月 4 日。

④ 史晓东:《“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以创新合作》,《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9 期,第 62 页。

特菲姆公司还在宁夏银川成立国际工厂，生产高效滴灌管。^①

除了进行贸易外，目前，不少在以色列的中资企业是从事劳务工程承包的国有企业，^② 如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色列分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2014年9月23日，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以色列港口发展与资产有限责任公司在以色列总理府签署阿什杜德南港口建设项目承包合同，合同金额近10亿美元，是中国企业在以色列承包的最大工程项目之一。^③ 在中国投资的以色列企业中，较为著名的有英飞尼迪集团。该公司于1993年在以色列成立，是世界领先的专注于中国市场的跨境投资集团，目前管理着100亿元的资产，已完成100多笔投资交易，并获得了较好的投资回报。2003年英飞尼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业务发展迅速，核心投资者包括以色列IDB集团、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其采用的“创新技术引入+跨境资本投资”的模式得到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协助^④。

随着双边经贸往来加深，中以企业的合作也日益频繁，人员往来增多，大批中国游客涌入以色列，其中高端商务旅行团居多。根据以色列旅游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1~4月，赴以色列的中国游客约为5.5万人次，较2018年同期增长接近70%^⑤。增幅较大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色列历史人文资源丰富，先进的创新科技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以色列国土面积虽然不大，但拥有独特的犹太文化、《圣经》中的圣地在以色列基本上都能找到。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更是一座承载过去与现在的宗教名城。另外，以色列还特别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有数量极多的博物馆。^⑥ 第二，国家政策倾斜。以色列将

① 《以色列耐特菲姆银川国际工厂试运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nx.gov.cn/ztsj/zl/nlkfxjjsyq/syqdt/201603/t20160330_33094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4日。

② 《在以中资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http://il.mofcom.gov.cn/article/catalog/zgqy/201506/2015060100440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4日。

③ 《中国港湾工程公司承建的阿什杜德南港口建设项目成功签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409/2014090074136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5日。

④ 《公司概况》，英飞尼迪集团网站，<http://www.infinity-equity.com/Default/About/12>，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4日。

⑤ 《2019年前四个月赴以色列中国游客同比增长近70%》，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http://il.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5/2019050286521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4日。

⑥ 于忠西：《以色列旅游业发展的经验及其启示》，《旅游纵览》（下半月）2018年第9期，第12页。

旅游业列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旅游部门积极进行营销，旅游及其他政府部门都十分重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努力吸引更多游客。第三，签证和航班便利化。以色列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逐步在北京、上海、广州开设签证中心，并对中国游客发放了长达十年的多次入境签证。2015 年，在以色列驻成都领事馆正式开通签证业务后，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等中国西南地区的游客赴以色列的数量不断增加。2016 年和 2017 年，海航分别开通北京、上海直飞特拉维夫的航线。2018 年 9 月，四川航空开通成都至特拉维夫的直飞航线，这是目前中国到以色列最快的一条航线，吸引更多重庆市民去以色列旅游。

近年来，来中国旅游的以色列人数不断增加。中国吸引以色列游客的除了优美的自然风光、灿烂的传统文外，还有历史上对于犹太人的情谊。开封犹太人社区旧址、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哈尔滨犹太总会堂等都是以色列人访华时常去的地方。随着中以两国之间航线的日渐增多，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以色列人来中国观光旅游。

二 重庆与以色列经贸关系的现状分析

(一) 重庆市的经济现状及对外贸易情况

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直辖市，重庆近年来经济发展形势较好。重庆市积极响应国家部署，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不断优化外贸结构，促进“引进来”“走出去”更好结合，建成了一批新的国家开放口岸，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两江新区、重庆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等国家级开发开放平台，它们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此外，重庆也在积极打造国际产业园，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目前已规划建设“中瑞、中德、中意、中以、中日、中韩、中新”等七大产业园。

随着重庆各产业的不断发展，企业生产能力逐步增强，货物进出口总额不断增加。2018 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5222.62 亿元，同比增长 15.9%。其中，出口额为 3395.28 亿元，增长 17.7%；进口额为 1827.34 亿元，增长

12.5%。在使用外资方面,2018 年全年重庆实际使用外资为 102.73 亿美元,增长 0.9%。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 32.50 亿美元,增长 43.8%。截至 2018 年底,累计有 287 家世界 500 强企业落户重庆。^① 作为一个内陆开放城市,重庆以完善的配套设施、优厚的地方政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为了更直观地体现重庆市与全国其他省区市经济发展情况的差别,本文对 2016~2018 年我国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的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分析。

由图 2 可知,在四大直辖市中,重庆市的生产总值远低于北京市和上海市。随着国家出台产业支持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重庆在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方面区位优势明显,发展对外贸易潜力巨大,未来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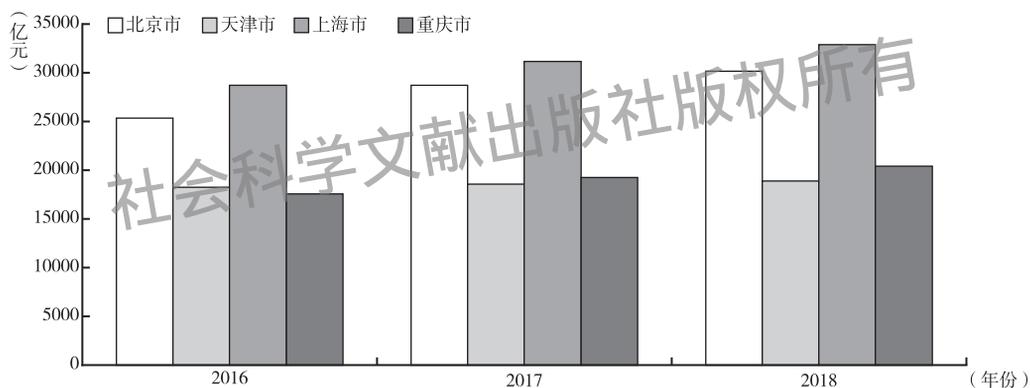


图 2 2016~2018 年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的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2016—2018 年四大直辖市地区生产总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从重庆市货物进出口额来看,2014~2018 年,总体发展态势较为平稳,2015 年后,进出口额有所下降,2016 年的进出口额为 2014~2018 年的最低点,2017 年呈现上升趋势,其变化轨迹与国家整体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基本一致(见图 3)。

^① 《2018 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cq.gov.cn/zqfz/gmjj/tjgb/202001/t20200114_4623759.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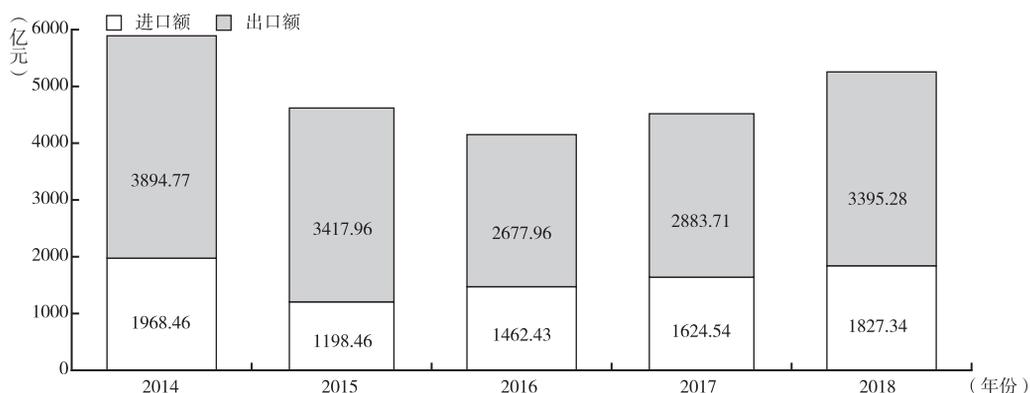


图 3 2014 ~ 2018 年重庆市货物进出口额

资料来源:《2018 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cq.gov.cn/zqfz/gmjj/tjgb/202001/t20200114_4623759.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2018 年,重庆市对外贸易情况有所好转,但要实现进一步增长,则必须重视创新,研发制造更多具有高附加值的新产品。重庆市在 2014 ~ 2018 年都出现了贸易顺差,出口额基本为进口额的两倍,这说明重庆在对外贸易中具有一定的产业优势。从重庆海关公布的 2019 年第一季度重庆市对外贸易统计数据来看,重庆进出口总额为 1315.3 亿元,居全国第 11 位,较上年同期(下同)增长 21.9%,远高于同期 3.7% 的全国平均增幅,在全国排前 11 位的省区市中,增幅居第 2 位。其中,出口额为 865.2 亿元,位列第 8,增长 25.1%,领先全国出口增速 18.4 个百分点;进口额为 450.1 亿元,位列第 12,增长 16.2%,领先全国进口增速 15.9 个百分点。按美元计价,2019 年第一季度,重庆进出口总额为 192.7 亿美元,增长 15.8%,其中,出口额为 126.6 亿美元,进口额为 66.1 亿美元。^①

如表 1 所示,2018 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在重庆市商品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为 88.2%,达到 2993.49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18.2%。在重庆对外贸易中,机电产品成为主力军,西永微电园成为机电产品出口重地。此外,电脑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超四成,3 月,汽车出口量由降转增。2018 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达到 2314.92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21.4%。由数据可知,机电产

① 《一季度重庆外贸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关网站, http://shanghai.customs.gov.cn/chongqing_customs/515860/515862/515864/2397821/index.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是重庆市对外贸易的核心产品，具有一定的产业优势，但重庆市机电产品的附加值不高，且容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重庆市若想从对外贸易中获取较高收益，则需要通过研发更多的新产品和提高技术水平来保持这些产品的竞争优势。基于机电产品的优势，重庆市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及“渝新欧铁路”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范围，更多地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渝新欧铁路”沿线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建立更为密切的贸易联系。

表 1 2018 年重庆市进出口商品情况一览

单位：亿元，%

指标	金额	增长率
进出口	5222.62	15.9
出口	3395.28	17.7
国有企业	109.38	-4.0
外资企业	2131.21	13.5
私营企业	1125.99	30.3
一般贸易	1060.50	7.5
加工贸易	2258.47	24.5
机电产品	2993.49	18.2
高新技术产品	2314.92	21.4
笔记本电脑	1337.73	4.1
进口	1827.34	12.5
国有企业	481.58	-6.4
外资企业	818.51	9.1
私营企业	527.00	46.8
一般贸易	857.40	3.2
加工贸易	373.93	43.8
机电产品	1241.22	13.8
高新技术产品	1025.35	18.5

注：就进出口企业性质而言，可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三大类；就贸易种类而言，可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就产品类型而言，表现比较突出的是机电产品。

资料来源：《2018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cq.gov.cn/zqfz/gmjj/tjgh/202001/t20200114_462375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5日。

(二) 以色列的经济现状及对外贸易情况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 5.2%,在 OECD 国家中属于增长强劲的发达国家。从对 2018 年第一季度增长参数的分析可知,几乎所有参数都实现两位数的增长。私人消费增长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8%,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增长 11.4%,公共支出增长 11.4%。2018 年第一季度,软件和通信产品出口额增长 26.8%。

截至 2017 年 2 月 3 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以色列的主权信用评级为 A+,长期评级展望为稳定。此外,截至 2017 年 6 月 2 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对以色列的主权信用评级为 A1,长期评级展望也是稳定。这些指标反映了国际著名评级机构对以色列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情况保持乐观看法,看好以色列的长远发展前景。

从 2009~2018 年以色列对外贸易整体情况来看,以色列是一个高度依赖外贸的国家,国内资源十分贫乏,用于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主要依靠进口。以色列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进口原料生产出各类产品后,必须通过出口贸易将产品销往国外。因此,以色列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高,2018 年,货物和服务贸易额占 GDP 的 29.4%^①。商品(不包括钻石)出口增幅较大的对象国是赞比亚、塞浦路斯、乌兹别克斯坦、尼日利亚、爱尔兰、中国、哈萨克斯坦、葡萄牙、土耳其、斯洛伐克、埃及和日本等,其中大部分是亚洲国家。2018 年,以色列对中国货物出口额增长 50%左右,约为 47 亿美元。中国现在已成为以色列第二大商品出口目的地,仅次于美国,也是以色列在亚洲最大的出口目的地^②。

由表 2 和图 4 可以看出,以色列的进出口额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且出口额与进口额基本持平,自 2012 年起,以色列的出口额逐步接近进口额。2007 年,以色列进出口总额为 1466.93 亿美元,2017 年进出口总额为 2008.51 亿美元,但 2018 年进出口总额有所下降,为 1426.76 亿美元。受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① OECD 网站, <https://data.oecd.org/israel.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2 月 4 日。

② 《以色列投资指南》,中国投资网站, http://www.chinainvestment.com.cn/type_hwtz/7752.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2 月 5 日。

2009年，以色列进出口总额大幅下滑。此后，以色列经济发展情况基本稳定。2017年，以色列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6%，经济运行情况相对平稳。

表2 2009~2018年以色列服务和商品进出口额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出口总额
	服务	商品	合计	服务	商品	合计	
2009	22309	47017	69326	17909	45984	63894	133220
2010	25170	56837	82006	18798	58234	77032	159038
2011	29272	64962	94234	20459	72501	92960	187194
2012	31684	61014	92698	22227	70403	92630	185328
2013	35593	63063	98656	22690	70592	93282	191938
2014	36249	64219	100468	23719	71033	94752	195220
2015	36844	57203	94047	23995	60442	84437	178484
2016	39497	56137	95634	25819	63902	89721	185355
2017	44700	58669	103368	28871	68612	97483	200851
2018	—	57393	62111	—	—	80565	142676

资料来源：以色列中央统计局，http://www.cbs.gov.il/reader/snaton/templ_snaton_e.html?num_tab=st16_01&CYear=2018，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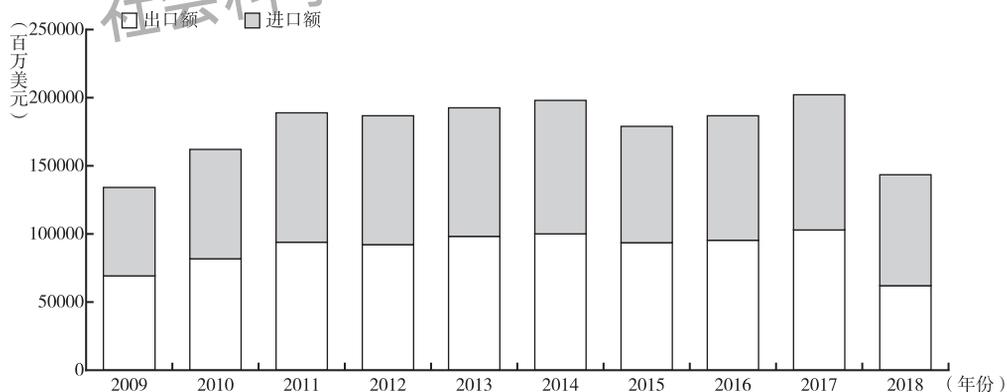


图4 2009~2018年以色列服务和商品进出口额

资料来源：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制作而成。

表3和表4为2007~2017年以色列进出口贸易所涉及的主要商品类别及其贸易额。2017年，以色列进口商品贸易额合计680.081亿美元，其中，轮船和飞机贸易额达到5.011亿美元，占比约为0.74%；钻石粗加工和抛光贸易额为57.547

亿美元, 占比约为 8.46%; 燃料贸易额为 76.024 亿美元, 占比约为 11.18%; 投资商品贸易额为 120.842 亿美元, 占比约为 17.77%; 原材料贸易额为 283.358 亿美元, 占比约为 41.67%, 消费品贸易额为 136.672 亿美元, 占比约为 20.10%。2017 年, 以色列出口额为 530.643 亿美元, 其中, 钻石批发出口额为 22.326 亿美元, 占比约为 4.21%; 钻石加工出口额为 44.930 亿美元, 占比约为 8.47%; 制造业、采矿、采石出口额为 452.311 亿美元, 占比约为 85.24%; 农林渔业出口额为 12.170 亿美元, 占比约为 2.29%。以上数据反映出以色列国内原材料和能源缺乏, 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 同时, 以色列制造业和加工业发达, 能够在初级产品的基础上形成高附加值产品, 在技术上具有相对优势。

表 3 2007~2017 年以色列进口商品 (按类别划分) 贸易额 (净额)

单位: 百万美元

年份	轮船和飞机	钻石粗加工和抛光	燃料	投资商品	原材料	消费品	其他	合计
2007	538.3	9642.5	8944.3	7198.3	21919.1	7824.4	38.8	56105.7
2008	129.6	8836.4	12856.6	8743.2	24803.6	9116.4	45.6	64531.4
2009	232.9	5024.6	8082.1	6525.6	18588.8	8432.4	40.9	46927.3
2010	271.9	7999.3	10455.9	7308.3	22885.5	9736.7	46.9	58704.5
2011	102.1	10156.6	13649.7	10564.7	27050.7	11160.2	63.1	72747.1
2012	487.9	7551.5	16090.3	9961.2	27579.8	10539.5	60.2	72270.4
2013	613.7	8269.9	14560.2	8879.6	27202.9	11506.8	68.9	71102.0
2014	376.8	8584.1	12769.8	9316.5	27820.3	12545.6	66.5	71479.6
2015	214.2	6284.1	7406.5	8626.6	26882.1	11868.7	55.1	61337.3
2016	538.8	6532.2	5843.1	11679.4	27076.0	13334.8	60.4	65064.7
2017	501.1	5754.7	7602.4	12084.2	28335.8	13667.2	62.7	68008.1

资料来源: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 http://www.cbs.gov.il/shnaton69/st16_03x.pdf, 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11 月 4 日。

表 4 2007~2017 年以色列进出口商品 (按类别划分) 贸易额

单位: 百万美元

年份	人均贸易额		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钻石批发	钻石加工	其他	制造业、采矿、采石	农林渔业	合计
2007	6394.7	7813.7	3373.2	7116.9	1.0	34364.2	1303.9	45916.5
2008	7022.4	8830.1	3318.2	6299.2	0.9	40721.8	1214.3	51320.7
2009	5619.5	6269.2	1909.1	3948.9	3.7	35067.0	1265.2	42065.4
2010	6673.9	7700.4	3063.8	5871.9	1.4	40619.7	1365.0	50878.6
2011	7485.2	9367.0	3534.8	7488.6	3.3	45756.4	1382.1	58132.1

续表

年份	人均贸易额		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钻石批发	钻石加工	其他	制造业、采矿、采石	农林渔业	合计
2012	6824.3	9137.7	2740.5	5621.5	3.2	44296.0	1373.3	53972.1
2013	7056.8	8822.7	2910.0	6293.7	3.7	46271.9	1495.2	56870.9
2014	7019.2	8700.4	3064.5	6287.9	2.7	47024.9	1392.4	57667.4
2015	6387.9	7319.0	2200.6	4997.4	0.5	45283.6	1168.1	53534.0
2016	6106.8	7613.5	2704.4	4703.1	3.9	43758.4	1150.5	52188.3
2017	6090.5	7805.6	2232.6	4493.0	9.1	45231.1	1217.0	53064.3

资料来源：以色列中央统计局，http://www.cbs.gov.il/shnaton69/st16_03x.pdf，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4日。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数据，2019年上半年（1~6月），以色列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高、中、低技术产业出口额下降，投资材料（不包括船舶和飞机）进口额减少9.2%。2019年上半年（1~6月）出口额比2018年上半年（1~6月）增长约9.1%，2019年上半年（1~6月）进口额比2018年上半年（1~6月）增长约4.5%。由表5可知，以色列2019年上半年（1~6月）和2018年上半年（1~6月）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但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以色列在能源和原材料等基本依赖进口的情况下，专注于进行钻石加工和生产与出口芯片、现代农业等高附加值产品，这表明以色列的科技驱动能力较强。

表5 以色列货物进出口情况

单位：百万新谢克尔

	2019年6月	2018年6月	2019年上半年(1~6月)	2018年上半年(1~6月)
出口额	99.7	96.6	15.6	14.3
进口额	134.2	136.9	23.1	22.1
贸易差额	-34.5	-40.3	-7.5	-7.8

注：新谢克尔（New Shekel）为以色列货币单位，1新谢克尔约可兑换0.28美元（2019年10月）。

资料来源：以色列中央统计局，http://www.cbs.gov.il/shnaton69/st16_03x.pdf，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4日。

（三）重庆与以色列的经贸往来

2009~2018年重庆与以色列贸易概况见表6和图5。

表 6 2009 ~ 2018 年重庆与以色列贸易概况

单位: 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差额
2009	832	599	233	366
2010	2298	1633	664	969
2011	11269	10701	568	10133
2012	17990	17450	540	16910
2013	10583	9983	599	9384
2014	9368	8565	802	7763
2015	15884	14417	1467	12950
2016	10945	9393	1552	7841
2017	11250	9939	1311	8628
2018	9175	8527	648	7849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重庆市统计局网站, http://tj.cq.gov.cn/zwgk_233/tjnj/, 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11 月 5 日。

整体上看,重庆与以色列的贸易额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2009 年,重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总额为 832 万美元;2012 年,进出口总额达到峰值 1.7990 亿美元,主要原因是 2012 年中国国内经济形势良好,GDP 增速为 7.9%^①,中以高层交流加强,两国合作不断深入,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与以色列国交通和道路安全部谅解备忘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以色列证券管理局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②,这为两国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2012 年,重庆市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532.0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82.2%,增幅居全国前列。^③在此之后,重庆市与以色列的双边贸易额有所下降,但 2018 年仍有 9175 万美元,约为 2009 年的 11 倍。

① 《国内生产总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GDP>, 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11 月 5 日。

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以色列证券管理局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 - 条约数据库, <http://treaty.mfa.gov.cn/Treaty/web/detail.jsp?objid=1531876960155>, 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11 月 4 日。

③ 《2012 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cq.gov.cn/zqfz/gmjj/tjgb/202001/t20200114_4623290.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11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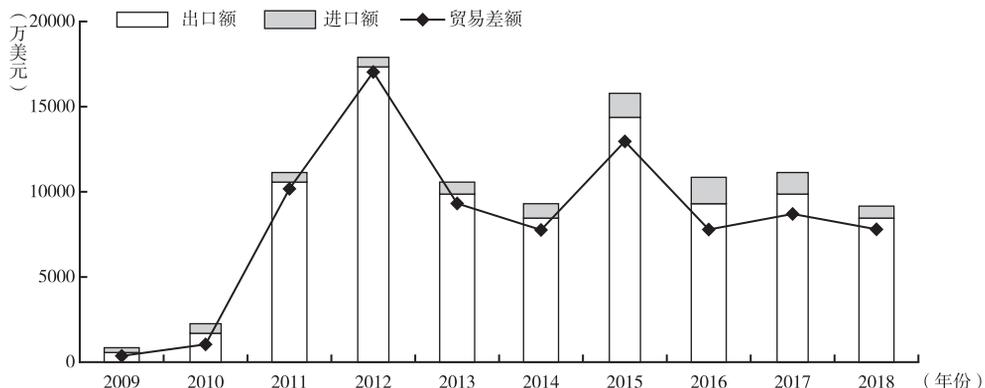


图5 2009~2018年重庆与以色列贸易概况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重庆市统计局网站，http://tjj.cq.gov.cn/zwgk_233/tjnj/，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5日。

重庆与以色列进口额基本保持增长趋势，2009年为233万美元，2018年为648万美元，约为2009年的2.8倍，在2016年达到峰值1552万美元。

从贸易差额来看，2009~2018年重庆在同以色列进行贸易过程中始终保持顺差，2009年，重庆对以色列的贸易顺差为366万美元，2018年为7849万美元，约为2009年的21.4倍。此外，在2012年，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值1.6910亿美元，此后骤然回落，但也相对稳定。

重庆在中以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可参见表7和图6。

表7 2018年全国部分省区市对以色列贸易情况

单位：万元

排名	省区市	进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1	上海	2164998.0	1343370.0	821628.0
2	江苏	935207.1	225304.6	709902.5
3	四川	914500.0	98500.0	816000.0
4	北京	523655.8	144741.2	378914.6
5	广东	310009.6	223797.1	86212.4
6	广西	274852.0	261490.0	13361.0
7	河南	155843.2	148536.0	7307.2

续表

排名	省区市	进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8	江西	141901.0	137665.0	4236.0
9	重庆	63057.1	58605.0	4452.1
10	海南	26238.7	26130.3	108.3
11	云南	11718.0	7812.0	3906.0
12	黑龙江	3698.0	1486.0	2212.0
其他		4225159.1	5881795.4	2327184.5
全国		9144188.0	6107100.0	3037087.0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区市海关统计数据、统计年鉴、商务厅（局）公布的数据制作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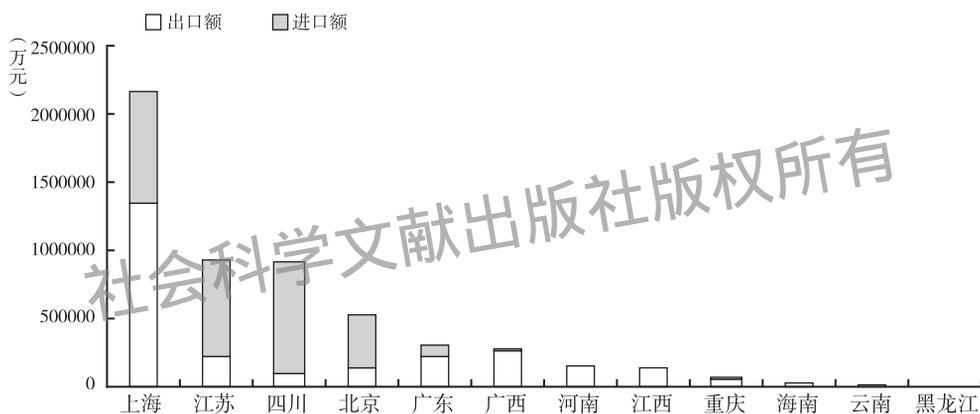


图 6 2018 年全国部分省区市对以色列贸易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区市海关统计数据、统计年鉴、商务厅（局）公布的数据制作而成。

除图 6 列出的 12 个省区市外，其他省区市对以色列的进出口额为 4225159.1 万元，其中出口额为 5881795.4 万元，进口额为 2327184.5 万元。全国对以色列的进出口额达 9144188.0 万元，其中出口额为 6107100.0 万元，进口额为 3037087.0 万元。

表 7、图 6 汇总了 2018 年全国部分省区市对以色列的贸易情况，从进出口额来看，重庆市在 12 个省区市中处于中间偏下的位置，进出口额为 63057.1 万元。在西南地区，重庆排名第 2，这说明重庆已经在中以贸易中取得一定的领先地位，但是与东南沿海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

(四) 以色列在重庆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2018年重庆市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情况如表8所示。

表8 2018年重庆市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排名	国别(地区)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1	美国	10636374.3	9975909.4	660464.9
2	韩国	4882065.8	1767727.2	3114338.6
3	德国	4503982	3865016	638966
4	日本	2238564.1	944594.4	1293969.7
5	马来西亚	2061264.3	608856.4	1452407.9
6	泰国	1532288.2	393336.4	1138951.8
7	荷兰	1463716.6	1341160.1	122556.5
8	中国香港	1432286.1	1421860.8	10425.2
9	澳大利亚	1274549.3	651731.2	622818.2
10	越南	1268798.6	457891.3	810907.3
20	巴西	591852.3	246962.4	344889.9
30	沙特阿拉伯	274941.1	217743.8	57197.3
40	比利时	155501.7	131416.9	24084.7
50	以色列	63057.1	58605	4452.1

资料来源:《2019年4月重庆市进出口总值表(人民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关网站, http://chongqing.customs.gov.cn/chongqing_customs/515860/515862/515863/2429883/index.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5日。

由表8可知,2018年,在重庆市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中,重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总额为6.30571亿元,排名第50。重庆与美国的进出口总额达1063.63743亿元,排名第1;与越南的进出口总额为126.87986亿元,排名第10;与巴西的进出口总额为59.18523亿元,排名第20;与沙特阿拉伯的进出口总额为27.49411亿元,排名第30;与比利时的进出口总额为15.55017亿元,排名第40。由此可见,在重庆的经贸往来对象中,以色列还

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根据重庆海关公布的统计数据,2019 年第一季度,重庆市与以色列进出口总额为 1.95 亿元,减少 19.3%,出口额为 1.76 亿元,减少 21.5%,进口额为 0.18 亿元,增长 9.4%^①。虽然重庆对以色列的出口额减少,但进口额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重庆对以色列精加工产品的需求量较大,从表 9 可以看出,重庆市在 2019 年第一季度进口的以色列商品主要为工业制成品,且需求量较大。

表 9 2019 年第一季度重庆进口以色列商品情况

单位:万元

商品名称	进口额
希蒙得木油及其分离品	173550
其他护发品	42081
香浴盐及其他沐浴用制剂	24631
自攻螺钉	2101
工具夹具及自启板牙切头	652
安全阀或溢流阀	78785
调制解调器	173886
有线网络接口卡	1186
已录制用于重放声音、图像以外信息产品	884036
片式钽电容器	40049
片式多层瓷介电容器	6202
额定功率小于等于 20 瓦的片式固定电阻器	60918
其他可变电阻器	976
未列名未装配的光学元件	20720
其他医疗、外科或兽医用仪器及器具	593008
牙齿固定件	113505
其他测量或检验用光学仪器及器具	6061583
雕版画、印制画、石印画的原本	81138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关公布的统计数据制作而成。

① 《2019 年 4 月重庆市进出口总值表(人民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关网站, http://chongqing.customs.gov.cn/chongqing_customs/515860/515862/515863/2429883/index.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为了进一步展示重庆与以色列的贸易情况，现列出 2018 年重庆市与主要中东国家的贸易情况（见表 10、图 7）。

表 10 2018 年重庆市与主要中东国家的贸易情况

单位：万元

世界排名	中东地区排名	国家	进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21	1	阿联酋	580140.8	528442.3	51698.6
30	2	沙特阿拉伯	274941.1	217743.8	57197.3
33	3	伊朗	249056.9	192111.3	56945.6
36	4	土耳其	203483.7	188657.6	14826.1
45	5	埃及	77770.1	71284.3	6485.7
50	6	以色列	63057.1	58605	4452.1
62	7	摩洛哥	33268.3	32840.8	427.5
74	8	伊拉克	21685.9	21685.9	0
77	9	阿尔及利亚	18691.7	18691.7	0
78	10	突尼斯	17769.9	17374.6	395.3
80	11	科威特	16524	9726.4	6797.6
91	12	黎巴嫩	11585.1	11585.1	0
92	13	卡塔尔	11504.6	8407.7	3096.9
105	14	约旦	6884.4	6881.2	3.2
106	15	叙利亚	6276.2	6276.2	0
111	16	巴林	5236.2	5086.8	149.4
112	17	阿曼	5219.4	5211.4	8
114	18	也门	4581.1	4581.1	0
120	19	利比亚	3642.2	3642.2	0
125	20	苏丹	3042.5	3042.5	0
145	21	巴勒斯坦	1012.6	1012.6	0
149	22	塞浦路斯	727.7	688.7	38.9
总计			1616101.5	1413579.2	202522.2

资料来源：《2019 年 4 月重庆市进出口总值表（人民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关网站，http://chongqing.customs.gov.cn/chongqing_customs/515860/515862/515863/2429883/index.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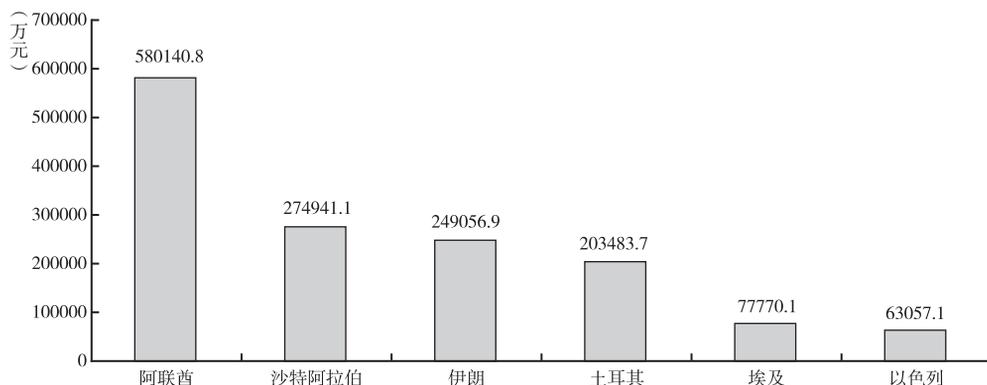


图 7 2018 年重庆市与主要中东国家（中东地区前 6 名）的进出口总额

资料来源：《2018 年重庆市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人民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关网站，http://chongqing.customs.gov.cn/chongqing_customs/515860/515862/515863/2281113/index.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根据重庆海关公布的 2018 年重庆市对外贸易数据，2018 年，重庆市与中东国家（共 22 个）进出口总额为 161.61015 亿元，其中，出口额为 141.35792 亿元，进口额为 20.25222 亿元。重庆市与以色列的进出口额远低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以石油工业为主的国家，可见，重庆与中东国家的贸易存在结构性差异。

重庆海关公布的 2018 年重庆市对外贸易数据还显示，与重庆进行贸易的主要中东国家有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以色列。其中，重庆市与阿联酋的进出口额达到 580140.8 万元，在与重庆市进行双边贸易的 214 个国家/地区中排在第 21 位；与沙特阿拉伯的进出口额为 274941.1 万元，排在第 30 位；与土耳其的进出口额为 203483.7 万元，排在第 36 位；与埃及的进出口额为 77770.1 万元，排在第 45 位；与以色列的进出口额为 63057.1 万元，排在第 50 位。

重庆与以色列的经贸合作主要集中于投资、医药、乳制品方面。在招商引资方面，除重庆市大渡口区第一人民医院利用以色列政府贷款购置医疗设备外，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推介下，英飞尼迪重庆基金于 2011 年在重庆市巴南区揭牌，其投资分布在园林建设、互联网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三个领域。2015 年 12 月 18 日，由英飞尼迪、重庆市产业引导基金、大足区国资委、宗

申产业集团共同发起的重庆中以农业股权投资基金正式成立。该基金主要投资特色农业，促进具有创新要素的农业项目快速健康成长。目前，英飞尼迪重庆基金投资的园林建设公司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园林景观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并已开始筹备上市事宜。

在产业投资合作方面，重庆天友乳业公司已经和以色列阿菲金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引进其先进的牧场管理技术。2017年2月15日，中关村医学工程转化（重庆）中心在重庆开园，两家以色列制药公司 Nano Textile 和 Betalin 与该中心进行相关合作。2017年12月19~21日，在中以两国建交25周年之际，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以色列驻成都领事馆商务处参加了重庆市农业科技交流会，并考察了吴小平葡萄园。2019年1月4日，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核心区的中以（重庆两江）产业园正式开园。该产业园以生物医药产业为核心，是集研发、转化、生产及运营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① 以上这些合作推动重庆与以色列加强经贸联系。

三 重庆与以色列经贸关系的前景展望

总体来看，重庆与以色列的贸易规模正逐渐扩大。随着重庆市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重庆中以产业园建设快速推进，重庆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将越来越紧密。鉴于以色列在高新技术、现代农业、电子芯片等方面的优势，未来重庆市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系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应进一步加强重庆市与以色列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

首先，加强重庆市与以色列政府间的合作与沟通。政治互信有利于双边贸易发展，贸易合作关系的维护和加强应当先从重庆市与以色列建立磋商和协调机制开始。对于贸易往来中遇到的问题，双方应该积极对话，同时还应当进行多领

^① 《中以（重庆两江）产业园正式开园 首批入驻11个以色列项目 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渝设工作站》，两江新区网，http://www.liangjiang.gov.cn/Content/2019-01/04/content_49178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5日。

域、多形式和多层次的经济技术合作,增加对相关产业及新兴产业的投资,使双方的经贸活动出现互利共赢的局面。目前,重庆市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但四川省已有三个城市(宜宾市、绵阳市、成都市)与以色列相关城市结为友好城市;2014年11月,以色列在成都市设立领事馆,这些都说明重庆在与以色列的交流与合作方面仍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实际上,重庆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如2016年9月坐落于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大学开设了希伯来语专业,这对于加强重庆与以色列的交流与合作显然大有裨益。

其次,促进重庆对以色列的出口多元化。出口多元化对重庆贸易结构的优化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与以色列进行贸易时,重庆市应当多元化发展。第一,出口主体多元化。重庆市政府可鼓励中小企业对以色列出口。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受到影响,产品出口竞争力大大削弱。重庆市政府可以在以色列使领馆和商会的帮助下,积极同以色列企业建立一定联系,以为重庆中小企业向以色列出口产品提供一定的可靠平台。第二,政府服务多样化。重庆市对以色列企业和中以贸易情况的了解并不充分,以色列企业对重庆市企业的熟悉程度不高,这限制了重庆市与以色列的贸易往来。政府应当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服务,如定期举办中以产品推介会;利用重庆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提高企业“走出去”的便利化水平,促进重庆向以色列出口产品。

最后,发展重庆市与以色列的服务贸易。重庆市与以色列贸易的多元化发展能够为重庆市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契机。除了货物贸易外,重庆市政府部门还可以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一方面,通过发展对以色列的服务贸易,如旅游贸易等,加强与以色列各行业的交流,增进了解,为重庆市对以出口开拓新渠道;另一方面,重庆市对以色列的服务贸易也要注重多元化发展。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服务贸易的占比将越来越大,重庆市应当与以色列在保险、旅游、教育等领域加强合作。重庆的饮食文化独具特色,重庆“火锅”和“小面”获誉良多;重庆的山城文化、魔幻轻轨都有望吸引以色列民众。

第二,应进一步加强重庆与以色列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

2019年1月成立的重庆中以产业园,是重庆和以色列加强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借助这一平台,双方企业可加强合作,促进交流;在政府的引导下,

积极合作，寻求双方优势互补，如以色列企业擅长开发清洁能源产品，重庆企业可以考虑与其合作，为其生产终端产品所需的零部件或包装产品。事实上，在与以色列的双边贸易中，重庆生产的许多产品的质量已属上乘，但由于缺乏著名的品牌和可靠的销售渠道，重庆市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高额利润，因此，重庆市企业应该构建一套统一、完善的机制，强化产品的差异性，创造国际品牌，使已有产业在对外贸易中获益。

重庆市企业可以对以色列进行投资，充分利用“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创造的有利国际环境，基于以色列的发展情况，如以色列的引资政策和要素比较优势，积极“走出去”。通过创建一批吸引外资的工业园区和集高精尖技术研发及高科技产品生产于一体的高技术园区，为充分合理地利用外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园区内合理地配置资源，促进产业形成一定规模，为企业跨国经营做好准备。

第三，应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进行结构调整。

在重庆市对以色列的产品进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一直在发挥“增长剂”和“稳定剂”的作用。中国与以色列的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差距，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强，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同层次。以色列是发达国家，也是创新强国，主要出口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如生物医药、化学药剂和高科技农业设施等。有鉴于此，重庆市机电产品企业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前，由于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无法维系持久竞争力，重庆市和以色列之间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已进入转型期，传统交易模式难以为继。只有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生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企业，才能在重庆与以色列的贸易中保持优势。因此，重庆市机电企业应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出口结构，与以色列进行高科技产品的差别化交易。

四 结语

重庆市作为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放高地，在与以色列发展经贸关系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庆市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同以色列进行合作，借鉴其发展经验。重庆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具有较为广

阔的发展前景，具体如下。

首先，从国际层面来看。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中把握契机，寻求发展。近年来，由于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非关税壁垒滥用等消极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总体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仍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从国家层面来看。相对于其他中东国家，尽管以色列近年来偶尔出现爆发战争的紧急状态，或因国内自然资源短缺经历艰难发展时期，但其较具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精神仍然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举措，不断推动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最后，从地方层面来看。重庆市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色列在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中从中央层面走向地方层面，不断拓展合作范围。重庆与以色列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理念契合，优势互补。

(责任编辑：李圣辉)

A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Chen Guangmeng, Yu Zhongxi

Abstract: In 2013, China propos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responded positively. Israel, as an important fulcrum countr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s actively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rough joining the

AIIB. As an inland open highland in western China, Chongqing's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with Israel have also deepened in recent years.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overall economic and trade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then it analyze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ongqing and Israel in detail;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t propos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ongqing and Israel, so as to promote in-dept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Keywords: Chongqing; Israe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框架内的 铁路合作及其意义

王 南

【摘 要】中国拥有较强的铁路技术、工程建设能力、研发能力等，并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中国与巴基斯坦互为友好邻邦，在铁路方面早已开展合作。被称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并且为中巴铁路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巴铁路合作空间巨大，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巴铁路合作，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及促进巴基斯坦发展，本文提出了八条相关政策建议，即中巴铁路合作应该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协调、顾及巴方发展规划、助力巴方制造业水平提升、注重对巴方专业人才的培养、注重对当地环境的保护、兼顾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铁路接轨、酌情吸收第三方参与进来、向巴方分享中方发展经验。

【关键词】中国铁路 中巴铁路合作 中巴经济走廊

【作者简介】王南，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学术顾问、江苏师范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研究员、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2013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巴基斯坦时提出中巴经济走廊设想，以协助巴基斯坦进行基础设施扩建与升级，推进和深化两国在能源、安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发展计划的有效对接。巴方对此予以积极回应和高度评价。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表示，中巴经济走廊不仅将使中国中西部地区受益，而且将使巴基斯坦和整个南亚地区受益。他说：“可以预见，中巴还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此外，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合作还可以延伸至中亚及南亚国

家，使 30 亿人民受益。”^①

2015 年 4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习近平主席同侯赛因总统、谢里夫总理共同决定，将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举目全球，这在双边关系定位中是唯一一个。习近平主席评价说：“这一定位是中巴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的鲜明写照，可谓实至名归。”^② 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了 51 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超过 30 项涉及中巴经济走廊。习近平和谢里夫还通过视频为 5 个发电厂项目揭幕。中巴两国签署了一揽子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价值 460 亿美元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计划。^③ 中巴经济走廊事关中巴两国人民未来福祉。它是未来一个时期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引擎，并将为巴基斯坦实现“亚洲之虎”梦想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

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在建或已建成的早期收获项目达到 20 个，总投资额约为 187 亿美元。随着萨希瓦尔燃煤电站（位于旁遮普省）等重大项目陆续竣工、卡西姆燃煤电站（位于信德省）首台机组启动发电等，中巴经济走廊进入早期收获阶段并不断结出硕果。^④ 此外，还有喀喇昆仑公路改扩建项目（KKH，位于北部地区）、苏吉克拉瑞水电站项目（位于西北边境省）、尼鲁姆·杰卢姆水电站项目（位于巴控克什米尔地区）。^⑤ 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领域。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深入，很多具体问题浮出水面，例如，电力短缺、物资运输困难、地区联系不紧密等。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便是加强中巴铁路合作。本文将分别分析巴基斯坦和中国在铁路建设领域的现状、水平和发展方向，结合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最新进展，对中巴铁路合作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八条相关政策建议。

-
- ① 《专访巴基斯坦总理：中巴经济走廊将使 30 亿人受益》，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6/407689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 ② 《记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4/23/c_111505827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 ③ 《中巴签 51 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超 30 项涉中巴经济走廊》，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421/13649987_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 ④ 《姚敬大使在第三届中巴经济走廊媒体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网站，<http://www.fmprc.gov.cn/ce/cepk/chn/zbgs/t151471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 ⑤ 《“中巴经济走廊”一些具有代表性早期收获项目初见成效》，国际在线，<http://news.cri.cn/gb/42071/2015/04/20/3245s493701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一 巴基斯坦加快铁路系统建设的背景

(一) 巴基斯坦铁路系统现状

巴基斯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铁路的建设时间比较早。巴基斯坦铁路始建于 1861 年，1947 年独立前，全国铁路网已初具规模。独立之后，巴基斯坦铁路运输业有过较大发展，全国各省、市之间均有铁路相连，在一些中小城镇之间也修筑了铁路。2003 年，全国铁路线长 11515 公里，共有 781 个车站。^①

布局失衡是现今巴基斯坦铁路的一大问题。一是以南北向线路为主，三大主干线卡（拉奇）—白（沙瓦）线、卡（拉奇）—拉（合尔）线、拉（合尔）—白（沙瓦）线均为南北走向，而东西向仅有苏（库尔）—奎（塔）线及其支线。二是“东密西疏”，东部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路网密度偏高，铁路运营里程约占全国的 3/4。巴基斯坦与印度、伊朗和阿富汗各有一条铁路相连，但由于政治关系、运输量和年久失修等原因，利用率不高，甚至处于停运状态。

在铁轨方面，巴基斯坦是目前全世界仅剩的两个仍使用宽轨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印度）。在巴基斯坦，除 412 公里路段保留米轨外，其余路段均为宽轨。在铁路网络信号系统方面，绝大多数（6600 多个）信号站仍沿用老式机械通信信号系统，有 39 个信号站采用全继电器互锁信号系统，南部 154 公里复线铁路采用自动闭锁信号系统，还有个别路段采用中央控制信号系统。

巴基斯坦拥有跨境铁路，在其四个邻国中，印度、伊朗和阿富汗都有铁路与它相通。不过，巴基斯坦与这些国家连接的铁路不仅非常老旧，而且还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正常使用。受帕米尔高原地势的影响，目前，巴基斯坦与中国暂时没有铁路相通，这也为中巴铁路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① 杨翠柏、刘成琼编著《巴基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 159 页。

(二) 巴基斯坦重视中巴经济走廊铁路系统建设的原因

巴基斯坦人口快速增长，目前已达 2.2 亿人，经济快速发展，对外经贸联系范围不断扩大，但目前巴基斯坦的交通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发达，如铁路系统。改造现有铁路系统、引进先进的铁路技术和装备是巴基斯坦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措施，铁路系统应该成为巴基斯坦优先发展的领域。

为促进本国交通发展（其中包括促进铁路发展），巴基斯坦政府制定了相应的规划，并发布了《巴基斯坦 2025 愿景》^①（以下简称《愿景》）。《愿景》指出，交通为巴基斯坦贡献了 10% 的 GDP 和超过 6% 的就业岗位。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愿景》寻求建立一个高效和综合的运输系统，以促进竞争性经济发展，主要目标是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安全水平，促使农村地区与市场/城市中心之间高效连接、省与省之间快速往来，整合经济枢纽（包括空港、海港和陆港），实现地区主要贸易伙伴的公路、铁路之间有效连接。

根据《愿景》，巴基斯坦铁路系统将进行升级，主要包括：速度从 95 千米/小时提高到 120 千米/小时 ~ 140 千米/小时；主要线路延长；利用现代信号系统增加线路容量；建立南北和东西走廊；通过公路和铁路发展联通中亚国家、中国和其他邻国；设置单独的货运通道。这样，巴基斯坦铁路部门将更加健全，成为客运和货运服务的优质供应商。^②

2018 年 8 月 30 日，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长巴赫蒂亚尔在会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时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着眼全球共同发展和国际治理需要提出的伟大倡议。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和中巴互利共赢的标志性项目，巴新政府对其高度重视，愿同中方加强在能源、产业、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民生等领域的合作，积极欢迎第三方

① Pakistan 2025 One Nation - One Vision, <http://www.pakbj.org/statics/css/pakbj/pdf/Pakistan - Vision - 2025.pdf>,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0 月 16 日。

② Pakistan 2025 One Nation - One Vision, <http://www.pakbj.org/statics/css/pakbj/pdf/Pakistan - Vision - 2025.pdf>,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0 月 16 日。

参与走廊建设,让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乃至本地区人民。^①

2018年8月31日,巴基斯坦铁道部长拉希德在会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时说,伊姆兰·汗总理和新政府将继续全力支持走廊建设,在铁路基础设施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同中方合作对接,推动走廊更快、更高质量建设。姚敬表示,中方赞赏伊姆兰·汗总理及巴新政府重视走廊建设的立场,愿同巴方进一步探讨和开展铁路领域合作,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充分发挥走廊对巴经济民生的促进作用。^②

巴基斯坦铁路发展目标一旦实现,或者依然在实现过程中,必定会给巴基斯坦,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带来诸多好处。一是能提升巴基斯坦物流水平,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稳定运输通道。二是能促进经济发展,改变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三是能更加方便人们出行,完善交通设施。四是能提升巴基斯坦制造业水平,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巴基斯坦工业发展。五是能提高巴基斯坦军事运输能力,进一步保障国家安全。六是能提高巴基斯坦的“国际通道”地位。这条国际通道可以通过铁路连接巴基斯坦、中国、伊朗和阿富汗,并且能经过伊朗连接土耳其、西亚其他国家和欧洲,经过阿富汗连接其他中亚国家。七是能从交通运输方面助推中巴经贸合作。它为中国提供了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也为巴基斯坦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条通往中国东部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的便捷通道。中国东部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都是发达国家,与这些地区和国家合作能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八是能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助力。

二 中国参与国际铁路系统建设的背景

(一) 中国铁路带动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的秘诀之一就是“要想

① 《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会见巴计划发展部长巴赫蒂亚尔》,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网站, <http://pk.chineseembassy.org/chn/zbgs/zywj/t1590185.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2月23日。

② 《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会见巴铁道部长拉希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网站, <http://pk.chineseembassy.org/chn/zbgs/zywj/t1590177.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2月23日。

富，先修路”，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对于中国的成就和进步，中国铁路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铁路高速发展的过程，或者说两者几乎同步发展，相辅相成。

2018 年，中国铁路货运增量行动开局良好、成效显著，全国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 40.22 亿吨，同比增长 9.1%，增运 3.34 亿吨，其中，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 31.9 亿吨，同比增长 9.3%，增运 2.72 亿吨，超额完成全年增运 2 亿吨的目标。增加的货运量与公路完成同样货运量相比，可节省 299 万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 736 万吨，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是打赢蓝天保卫战做出积极贡献。^①

在中国铁路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他相关产业受益或者被带动发展。例如，昆楚大线开通运营后一票难求，日均旅客发送量从开通首日的 3 万人次持续攀升至 5 万余人次。与此同时，云桂铁路、沪昆高铁、昆玉河铁路等都迎来了较大客流量。仅两个月，随着高铁量增质升，一个由铁路客运网织就的交通大动脉为云南旅游注入了动力，也为西南边陲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撑。^②

中国铁路曾非常落后。20 世纪 70~80 年代，杭州到上海最快的一趟火车要 3 个多小时。从 1997 年 4 月 1 日开始，中国铁路进行了多次大提速。2007 年 4 月 18 日完成的第六次大提速的最大亮点是时速 200 公里及以上的动车组开始投入使用。^③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时速 300 公里或超过 300 公里的高铁时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许多地方正在被越来越密集的高铁网联系起来。这张愈加密集的高铁网是一个庞大的世界级基建工程。^④

中国铁路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高铁的发展，带来的好处不只便利了人们的

① 《2018 年铁路货运增量行动成效显著》，中国铁路总公司网站，http://www.china-railway.com.cn/xwdt/jrt/201901/t20190116_9231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2 月 23 日。

② 《高铁量增质升引发云南旅游“蝴蝶效应”》，中国铁路总公司网站，http://www.china-railway.com.cn/xwdt/jrt/201809/t20180906_7246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2 月 23 日。

③ 《列车飞驰四十载——改革开放中的中国铁路巨变》，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9/27/c_137495381.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④ 《中国研发“超级高铁”底气：项目初步方案已完成》，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902/15637405_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出行和往来。它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建设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高铁可以把相距 250 公里的两个城市间的运输时间缩短到一小时以内,产生“同城效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说,铁路发展不仅可以稳增长,还能促进社会和谐,带动城镇化,有“一石多鸟”的作用。铁路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命脉,是人民群众的重要出行方式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作用不可替代。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交通要先行。^①

(二) 中国在铁路建设领域水平卓越、成果突出

中国于 2004 ~ 2008 年引进国外高铁技术,并在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系统集成创新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开展了大量高速铁路科技创新活动,中国现已自主掌握动车组车体、转向架、牵引控制、牵引变压器、牵引变流器、牵引电动机、制动系统、列车网络控制系统和动车组系统集成技术等九大高铁关键技术,以及高铁受电弓、空调系统等十大配套技术。^②

截至 2017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7 万公里,其中高铁的营业里程为 2.5 万公里,高铁量占世界高铁总量的 66.3%,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军”。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陆东福表示,中国高铁“四纵四横”主骨架已基本形成。但是,“四纵四横”并不是中国铁路的终点。2016 年,经中国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印发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在“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的基础上,增加客流支撑、标准适宜、发展需要的高速铁路,形成以“八纵八横”主通道为骨架,由区域连接线衔接、城际铁路补充的高速铁路网,实现省会城市高速铁路通达、区与区之间高效便捷相连。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我国铁路网规模在 17.5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在 3.8 万公里左右,比 2015 年底翻一番。到 2030 年,全

① 《李克强:推销中国高铁我特别有底气》,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24/c_1112201246.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② 《中国高速铁路创新发展的优势》,高铁网, <http://news.gaotie.cn/tielu/2018-01-25/443217.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国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届时，全国铁路网全面连接 20 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速铁路网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 50 万人口以上大中城市，打造相邻大中城市间 4 小时交通圈。^①

目前，若是与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这些世界顶级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很多领域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但是在铁路方面，特别是在高铁方面，中国已经实现了对它们的超越，而且这种超越还将继续保持下去。中国创造性地研制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动车组，它以 350 公里的时速进行商业运营，是世界上速度最快也是能耗最低的高铁，更是对中国高速铁路创新发展的完美诠释。中国高速铁路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营业里程和在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高铁创新体系别具特色，科技创新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速铁路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中国高速铁路将分阶段集中力量进行转型升级。^②

尽管中国铁路，特别是中国高铁已经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但中国高速铁路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2018 年 2 月 26 日，中国高铁控制技术领军人物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秉军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开发 400 公里时速的变轨距列车、600 公里时速的下一代磁浮列车也在进行研究，以后旅客坐进我们的高铁，感觉就会像进入家庭影院一样舒服……”他还表示，（中国“未来高铁”）人均能耗比“和谐号”降低 17%、84% 的列车按照中国标准生产、1000 多项发明专利构成技术体系……^③还有媒体报道，中国铁路相关机构正在研究论证一项“高速飞行列车”项目，这一结合磁悬浮技术、超声速飞行技术以及真空管道技术的综合轨道项目方案即将按照三个时速目标分步完成：1000 公里、2000 公里以及 4000 公里。^④

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铁路建设成就综述》，人民铁道网，<http://www.peoplerail.com/rail/show-456-356559-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2 月 23 日。

② 《中国高速铁路创新发展的优势》，高铁网，<http://news.gaotie.cn/tielu/2018-01-25/44321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③ 《中国高铁将有新面孔：时速 400 公里以上的智能高铁将要驶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2/26/c_112245693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2 月 23 日。

④ 《中国研发“超级高铁”底气：项目初步方案已完成》，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902/15637405_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毋庸置疑,中国拥有当今世界最庞大、最先进的铁路网络,拥有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拥有世界最丰富的现代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拥有世界一流的铁路及其设备的生产能力,拥有较强的铁路研发能力。对于作为中国亮丽“名片”的高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曾说,“我每次出访都推销中国装备,推销中国高铁时心里特别有底气”^①。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拥有和掌握了世界上较为先进的铁路技术、装备、工程建设能力和运营管理经验等,还十分愿意与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分享相关技术、装备等。

中国铁路技术、装备、工程建设能力和运营管理经验等正在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在铁路方面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表示,除了发展快、规模大外,经过多年的铁路建设和运营实践,中国铁路具备技术先进、安全可靠、舒适快捷、兼容性强、性价比高等综合优势,得到了国际铁路市场的认可。目前,中国与其他国家在铁路合作方面,已开工建设的项目有印尼雅万高铁——“中国高铁第一单”、中老铁路——中老国际铁路玉磨铁路项目,已经启动项目合作的有中泰铁路、匈塞铁路等。^②此外,近年来,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营的铁路项目有蒙内铁路(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首都内罗毕)、亚吉铁路(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首都吉布提)等。

可喜可贺的是,蒙内铁路开通仅一年就取得了良好成绩。肯尼亚铁路局长马伊纳表示,“毫无疑问,蒙内铁路正在为肯尼亚经济腾飞注入动力”。这条铁路向西的延长线内马铁路目前正在建设。他说,(蒙内铁路)沿途站点开始出现新的商机,不少外国投资涌入,当地的商人也在考虑更好地利用蒙内铁路,从而更方便地把产品运输到肯尼亚大中城市、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地。^③

① 《李克强:推销中国高铁我特别有底气》,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24/c_1112201246.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6日。

② 《中国铁路得到国际铁路市场认可》,搜狐网, http://www.sohu.com/a/84997569_119731,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2月23日。

③ 《“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方式是开创性的”——访肯尼亚铁路局局长马伊纳》,《人民日报》2018年6月1日。

三 中巴铁路合作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一)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现状

中巴经济走廊被称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经过多年的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初见成效，对改善当地民生、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为促进巴基斯坦及相关地区互联互通提供了重要机遇。2018年4月，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我们已经开始收获中巴经济走廊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红利。中巴经济走廊投资及其带动效应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我们国家电网发电能力增加了1万兆瓦，这改善了我们长期以来的能源短缺局面”^①。

2018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传来好消息，巴基斯坦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苏库尔至木尔坦段（简称“苏木段”高速公路）首段33公里通车仪式于2018年6月初举行，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取得初步成果。全长392公里的“苏木段”高速公路，南起巴基斯坦信德省苏库尔市，北至旁遮普省重要城市木尔坦，处于连接南北的关键节点上。该项目总投资约为2.8亿美元，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工期为36个月。^②

被视为中巴经济走廊巴方起点的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重点。2013年，瓜达尔港的运营权由原来的新加坡运营公司移交给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作为瓜达尔港运营协议的一部分，瓜达尔自由区建设于2016年正式启动。根据建设规划，瓜达尔自由区的总占地面积约为923公顷，分四期进行建设，起步区为一期项目。

时至今日，瓜达尔港及其附近配套项目已初具规模。瓜达尔港自由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耀宗表示，“现在瓜达尔港已经全面恢复运营能力，能装卸集装

^① 《巴基斯坦总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加速推进》，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8-04-12/doc-ifyuwqez936279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6日。

^②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再添新成果》，《人民日报》2018年6月3日。

箱、散货、件杂货以及混装货物等,装卸效率大幅提升”^①。目前,酒店、银行、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物流公司、海外仓、粮油加工企业、渔业加工企业、家电组装企业等 30 多家中、巴企业已入驻自贸区,直接投资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入驻企业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将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现在巴基斯坦飞瓜达尔的航班从每周一班增加到每天一班,每班几乎满员。原来货轮不定期停靠瓜达尔港,现在瓜达尔港有了自己的航线,每周有一艘班轮停靠。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取得的成果,得到了第三方的肯定与支持。2019 年 2 月 17 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开始访问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三国。巴基斯坦官方消息显示,穆罕默德此行为巴基斯坦带来总价值达 210 亿美元的投资。其中,计划投资总额为 100 亿美元的瓜达尔港炼油厂项目备受巴方各界关注。巴方人士表示,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下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缓解了巴基斯坦的能源短缺问题、改善了交通网络,而且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巴基斯坦的面貌,让外界看到巴基斯坦的投资潜力,沙特的投资是对中巴经济走廊作用和贡献的一次证明。^②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初衷是加强中巴之间在交通、能源、海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两国互联互通,促进两国共同发展。^③中巴经济走廊多年的建设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表明,中巴两国政府、企业等有关方面已在许多领域展开了合作,其中包括中巴铁路合作。中巴经济走廊也为中巴铁路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对于中国来说,中巴经济走廊提供了通过瓜达尔港运输物资的廉价交通线。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中巴经济走廊能推进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改革,以及加强与中国陆路、铁路和海路的互通。通过连接中国与阿拉伯海以及波斯湾,中巴经济走廊将发掘中巴以及全世界的贸易潜能。居住于中国、东南亚、中亚、中东的几十亿人口将直接受益于该项目。因此,对于该地区的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有利的项目。^④

① 《通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驶入发展快车道》,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12/c_129870586.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② 《沙特王储大手笔开启亚洲三国行》,《环球时报》2019 年 2 月 19 日。

③ 《中巴经济走廊》,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B7%B4%E7%BB%8F%E6%B5%8E%E8%B5%B0%E5%BB%8A/4871573?fr=aladdin>, 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④ 《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网站, <http://www.pakbj.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0&id=16>, 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二) 中巴铁路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21 世纪伊始，中巴两国就铁路项目进行过合作。2001 年 5 月 11 日，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与巴基斯坦铁道部正式签署《授予合同协议》，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巴基斯坦政府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出席了签字仪式。合同标的总金额近 1 亿美元。合同规定，除 40 辆客车在中国生产并以整车形式出口外，其余 135 辆车均以散件形式出口，并在伊斯兰堡客车厂进行生产和组装。中方提供客车在当地生产和组装所需的全部新型技术装备，对巴方技术人员进行全面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对巴方生产和组装散件客车的全过程进行技术监督。这些客车组成特快列车，被穆沙拉夫亲自命名为“喀拉昆仑”号，并于 2002 年 7 月 27 日交付巴方。^①

中巴经济走廊设想提出之后，中巴铁路合作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前景。2015 年 4 月 20 日，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中国国家铁路局局长陆东福与巴基斯坦铁道部国务秘书、铁路委员会主席帕尔文·阿格哈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铁路局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铁道部关于开展 1 号铁路干线（ML1）升级和哈维连陆港建设联合可行性研究的框架协议》。^② 2017 年 5 月 15 日，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国家铁路局局长杨宇栋与巴基斯坦铁路委员会主席阿格哈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铁路局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铁道部关于实施巴基斯坦 1 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哈维连陆港项目建设的框架协议》。^③

巴基斯坦 1 号铁路干线从卡拉奇向北经拉合尔、伊斯兰堡至白沙瓦，全长 1726 公里，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南北铁路干线。哈维连站是巴基斯坦铁路网北端尽头，规划建设由此向北延伸，经中巴边境口岸红其拉甫至喀什铁路，哈维连

① 《中巴铁路》，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巴铁路/4857491>，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② 《中巴就联合开展中巴经济走廊铁路项目可研签署合作文件》，国家铁路局网站，http://www.nra.gov.cn/xwzx/xwdt/xwlb/201504/t20150422_1322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③ 《杨宇栋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签署中巴关于巴基斯坦 1 号铁路干线项目实施的框架协议 会见铁组主席》，国家铁路局网站，http://www.nra.gov.cn/xwzx/xwdt/xwlb/201705/t20170519_38738.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

拟建陆港, 主要办理集装箱业务。巴基斯坦 1 号铁路干线升级和哈维连陆港建设, 是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联合合作委员会确定的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先推进项目。^① 中巴双方在这一项目的合作, 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 以及巴基斯坦交通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巴基斯坦铁路运输的发展, 意义重大。

除了铁路客车制造、铁路工程建设等外, 中巴双方还在人员培训方面进行合作。2016 年 4 月 12 日, 由中国承办的巴基斯坦铁路既有线提速改造技术管理人员培训班在中国成都开班。中国国家铁路局负责人、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出席了开班仪式。巴方派出了包括总经理安瓦尔在内的 23 名巴铁高管和专家参加此次培训。中国国家铁路局党组成员郑健主讲第一课“快速发展的中国铁路”, 从中国铁路发展历程、建设成就、发展启示三个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② 据悉, 在 10 天培训期间, 中国铁路专家向巴方学员做中国铁路建设项目管理模式、铁路建设投融资模式、高速铁路发展经验、既有线提速改造技术体系等方面的主题讲座。巴方学员还到中方铁路现场和装备制造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

中巴双方在铁路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还在第三方场合/国际多边进行。2018 年 9 月 16 ~ 21 日, 中国国家铁路局副局长刘克强率中国国家铁路局代表团出席了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铁路部门(铁路)负责人首次会晤及随后举行的高级别国际会议。会晤就有效利用和进一步发掘上合组织成员国铁路过境运输潜力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讨论了《上合组织成员国铁路部门(铁路)在铁路领域的协作构想》等文件, 签署了会晤纪要, 决定负责人第二次会晤于 2019 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印度、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部门(铁路)负责人参加了会晤。上合组织观察员国阿富汗、白俄罗斯、伊朗、蒙古国, 对话伙伴国阿塞拜疆, 主办方邀请国土库曼斯坦铁路部门(铁路)负责人或代表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出席了会晤。^③

① 《中巴就联合开展中巴经济走廊铁路项目可研签署合作文件》, 国家铁路局网站, http://www.nra.gov.cn/xwzx/xwdt/xwlb/201504/t20150422_13225.s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0 月 16 日。

② 《巴基斯坦铁路既有线提速改造技术管理人员培训班开班》, 国家铁路局网站, http://www.nra.gov.cn/xwzx/xwdt/xwlb/201604/t20160414_23249.s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0 月 16 日。

③ 《刘克强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铁路部门(铁路)负责人首次会晤》, 国家铁路局网站, http://www.nra.gov.cn/xwzx/xwdt/xwlb/201809/t20180928_66469.s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0 月 16 日。

虽然中巴两国在铁路方面业已开展合作，但是鉴于中国在铁路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巴基斯坦的铁路现状，以及在铁路发展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中巴铁路合作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未来中巴经济走廊对交通运输需求的增长，都表明中巴铁路合作大有可为。

四 结语

中巴铁路领域合作前景广阔，但笔者认为，还应在以下几方面予以重视。

一是中巴铁路合作应该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协调。一些现有中巴铁路合作项目，本身就属于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伴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中巴铁路合作需要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一步协调，例如，未来中巴经济走廊沿线产业园/工业园、商业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建设等，必须与涉及铁路线路/站点的中巴铁路合作项目一并加以考虑和规划。

二是中巴铁路合作应该顾及巴方发展规划。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巴基斯坦对于自己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建设等也有相应的规划和愿景。除了中央政府外，巴基斯坦地方政府也会有自己的发展构想。相信在中巴经济走廊设想提出之后，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会尽量将其发展构想与中巴经济走廊对接。所以，中巴铁路合作应该顾及巴方的发展构想。

三是中巴铁路合作应该助力巴方制造业水平提升。巴基斯坦是一个发展程度不高、各方面相对落后的国家。虽然巴基斯坦有能力研发核武器和中程导弹，但对于许多工业产品，特别是那些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工业产品，其还不能生产，需要花外汇进口。中国应该利用中巴铁路合作的契机，助力巴方相关制造业乃至整体工业水平提升。

四是中巴铁路合作应该注重对巴方专业人才的培养。巴基斯坦是一个拥有2.2亿人口的国家，是世界人口第六大国。不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巴基斯坦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掌握高科技知识、专业技能的人才相对不足。铁路建设和运营维护需要相关专业人才，中国正好可以利用铁路合作的机会，为巴方培养大量相关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可以为中巴铁路合作以及促进巴基斯坦铁路发展所用，还可以为巴基斯坦其他行业的建设所用。

五是中巴铁路合作应该注重对当地环境的保护。虽然巴基斯坦是一个世界级人口大国,但巴基斯坦国土面积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不仅如此,巴基斯坦还有相当大比例的沙漠、荒漠等,这就使巴基斯坦不但人口密度较大,而且总体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因此,中巴双方在进行铁路合作(包括相关施工、作业和运营等)时一定要注重对当地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六是中巴铁路合作应该兼顾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铁路接轨。巴基斯坦与中国、印度、伊朗和阿富汗四个国家接壤,并且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相连。就陆路而言,巴基斯坦可以通过铁路,再经过其邻国与南亚、西亚、中亚甚至更远的国家和地区相连。就目前中巴之间尚无铁路相连的现实而言,双方应该尽早将两国的铁路网连接起来。

七是中巴铁路合作应该酌情吸收第三方参与进来。从未来发展和需求着眼,中巴铁路延伸的范围不会仅局限于中巴两国,或是两国的铁路网,也不会止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有可能经过周边国家和地区通向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并与它们的铁路网相连。铁路建设,尤其是高等级铁路建设,所需资金非常多,所以,无论是从中巴铁路向其他国家/地区延伸,还是从资金/融资角度等方面考量,中巴铁路合作都应该酌情吸收第三方参与进来。有学者建议,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三国可设立共同基金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国和巴基斯坦可邀请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出资设立三方共同基金,投资巴基斯坦铁路、高速公路、电站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现中国技术、设备和管理与巴基斯坦土地、劳动力和沙特资金的完美结合,使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能够更多、更快地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改善巴基斯坦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收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①

八是中巴铁路合作应该向巴方分享中方发展经验。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前面提及的“要想富,先修路”,巴方可以学习、借鉴和运用其中的一些经验,例如,中国在发展包括铁路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时,更多的是从重要基础设施角度审视,注重综合效应,即政治、经济、民生、社会等多方面的现实好处和长远利

^① 《龙兴春:印度极力反对的这一中国重大项目 为何沙特豪掷千亿?》,人大重阳网, http://rdcy-sf.ruc.edu.cn/Index/news_cont/id/55291.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2月23日。

益，而不是单纯从商业角度着眼，将短期的投入回报率看得很重。

中国与巴基斯坦互为友好邻邦，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堪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典范。如今，中国有不少领域有了长足发展，如中国的铁路技术、装备和运营经验，以及中国的发展理念等。它们可以并值得与中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巴基斯坦分享。中巴之间本来就有非常好的关系，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基础非常牢固。在铁路方面，中巴两国早已进行相关合作。中巴经济走廊为中巴铁路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巴铁路合作可以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助力。二者能够良性互动。希望中巴两国有关方面对此予以充分把握和利用，在推动中巴铁路合作的同时，使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为顺利，进而造福两国人民，增进中巴友谊。

(责任编辑：王 畅 蒋蓝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ortance of
Railway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Wang Nan

Abstract: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the current Chinese railway system, especially the High-speed Rail, has ranked the first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world. With the most advanced railway technology, equipment, construction ability, operational experience and R&D capacity, China is ready to share its achievement in railway with other memb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railway is gain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and acknowledgement from the world. To take China and Pakistan as an example, we have witnessed the long-term cooperation between these two friendly neighboring nations in

the field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As the flagship project in the Belt and Road,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has attained periodical success and injected new vitality to the China-Pakistan railway cooperation. In view of the ample space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eight proposals will b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in the railway, thus better adapting to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kistan.

Keywords: Chinese Railway; China-Pakistan Railway Cooperation;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建设性 参与阿富汗社会重建研究

闵 捷

【摘 要】 阿富汗是中国的邻国，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国家。2001 年阿富汗战争后，中国即参与了阿富汗的社会重建，并逐渐建成喀布尔共和国医院、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等。当前，中国应以民生为抓手，进一步加强阿富汗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建设，并提振阿富汗社会重建的信心。

【关键词】 一带一路 阿富汗社会重建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 闵捷，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1 年 12 月 22 日，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并正式行使职权。2002 年 1 月，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访华，中国政府宣布在 2002 ~ 2007 年向阿富汗战后重建提供援助，双方签署了中国向阿富汗提供紧急物资援助的换文。2002 年 2 月 6 日，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正式复馆，中国建设性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的工作全面展开。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在政治领域，中国积极支持国际社会为解决阿富汗问题而达成的共识和进行的多边努力，以避免通过双边渠道干预阿富汗内部事务。在社会领域，中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建工作。中国在阿富汗社会重建中的建设性参与，既体现了中国积极推动解决周边地区热点问题的负责任立场，也反映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与切实努力。

一 中国建设性参与阿富汗重建的历史与现状

2002 年 1 月, 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访华, 中国向阿富汗提供 3000 万元紧急物资援助、100 万美元现汇, 与此同时, 中国宣布于 2002 ~ 2007 年向阿富汗提供重建援助 1.5 亿美元。1.5 亿美元在最初的协议中分为两部分, 一半为无偿援助, 另一半为优惠贷款; 后来优惠贷款也转变为无偿援助, 并用以修复帕尔万水利工程, 援建喀布尔共和国医院等项目。2002 年 5 月, 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访问阿富汗, 签署了向中国提供 3000 万美元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02 年 11 月, 阿富汗临时政府外长阿卜杜拉访华, 中国向阿提供 100 万美元物资援助。2003 年, 卡尔扎伊总统两次过境访问中国, 中阿签署三个合作文件, 其中包括中国向阿富汗提供 1500 万美元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① 2004 年, 在阿富汗问题柏林国际会议上, 中国宣布当年向阿提供 1500 万美元无偿援助, 同时为阿富汗大选提供 100 万美元物资援助, 并免除阿富汗 960 万英镑债务。^②

2006 年 6 月, 卡尔扎伊总统访华, 中阿双方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并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与阿方加强教育、文化交流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 为阿富汗经济社会重建提供智力支持和帮助。两国政府还签署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 中方给予阿方 278 种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同年 11 月, 中阿双方签署了《禁毒合作协议》。2006 ~ 2007 年, 中国向阿提供 1.6 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2008 年, 喀布尔大学成立阿富汗首个孔子学院。该年 6 月在法国巴黎“支持阿富汗国际会议”上, 中国宣布向阿提供 5000 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③ 2009 年, 中国向阿赠送价值 178.75 万美元的清淤设备, 提供价值 3000 万元人民币的小麦 (共 8000 多吨), 喀布尔共和国医院建设完成并移交给阿富汗。2010 年 3 月, 卡尔扎伊总统访华, 中国向阿提供 1.6 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双方签署换文, 约定从当年 7 月 1 日起, 中国向阿 60%

① 钱雪梅:《阿富汗的大国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第 142 页。

② 胡森:《中阿经贸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前景研究》,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第 2 页。

③ 《外交部长杨洁篪在“支持阿富汗国际会议”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gzdt/2008-06/13/content_1015458.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6 月 11 日。

的产品提供零关税待遇，2011年起每年为阿提供1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同时为阿开设农业、卫生、教育、经贸、通信和禁毒6个培训班。同年6月，第一次中阿经贸联委会在昆明举行。2011年，中阿签署若干援助协定，涉及中国援建阿富汗科教中心项目、喀布尔大学中文系教学楼和招待所项目；援赠救护车、教学物资、办公设备和总统府物资等。该年12月，在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上，中国宣布向阿提供1.5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①

2012年6月，卡尔扎伊总统访华，中阿发表联合宣言，同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同期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上，阿富汗被上海合作组织接收为“观察员国”，这给阿富汗政府带来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机会。同年9月，中阿双方签署《中阿落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以及经贸、文教卫生、安全合作协定。该年中国完成了帕尔万水利项目二期增项工程援建并移交，交接赠送阿富汗卫生部100辆救护车，与此同时，阿对华出口产品的零关税优惠比例提高到95%。

2013年9月，卡尔扎伊再次访华，双方发表了《中阿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方欢迎阿方于当年11月派遣艺术团及文化专家赴昆明参加第十三届亚洲艺术节，中方在该年为阿方举办经贸、财政、农业等培训班，年内为阿开办教育、水利等培训班。同时，中方为阿富汗青年来华留学提供包括政府奖学金在内的便利，支持在阿汉语教学活动，鼓励两国高校进行交流，中方积极致力于利用双边及多边渠道加强与阿方在传统医药、灾难医学、新发传染病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此外，该年中国政府向阿方提供2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14年7月，中国外交部首次就阿富汗事务设立特使，这表明中国对阿富汗局势及中阿关系高度重视。同年8月，中方主办了“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交部长级会议，该会议是阿富汗政府发起的旨在促进亚洲14个中心国家合作的重要会议之一。^② 该年10月，阿富汗新任总统加尼访华，中阿双方发

① 《中国将再向阿富汗提供1.5亿元人民币援助》，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12-20/354373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8日。

② [阿富汗]古尔·侯赛因·艾哈迈迪：《中国与阿富汗双边关系》，刘伟译，《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1期，第108页。

表了《中阿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宣布 2015 年为“中阿友好合作年”。根据中阿签署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15~2017 年，中国向阿提供 15 亿元无偿援助；2015~2019 年，中国积极支持阿方加强能力建设，为阿富汗培训各领域专业人员 3000 名，并提供 500 个政府奖学金名额。^① 两国还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文件，涉及援阿农业机械设备项目、共和国医院技术合作项目、共和国医院医护人员培训项目等。2018 年 6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青岛会见来华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阿富汗总统加尼时指出，中方愿继续为阿富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阿富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实现阿富汗同地区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要促进中阿人文交流，使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加深友谊。加尼表示，阿富汗钦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阿富汗的大力帮助，阿富汗支持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和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主张，愿深化阿中在双边各领域及地区事务中的合作。^②

中国政府一贯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进程，并通过加强双边交流与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进行人力资源培训，以及进行医疗与教育等交流合作，力求发挥建设性作用。

二 中国参与阿富汗社会重建的案例分析

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初，阿富汗是世界上医疗条件最差的国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对外透露，截至 2002 年 1 月，阿富汗共有 600 万人处于医疗条件恶劣的状态中，在塔利班执政时期，禁止培训医疗卫生人员，特别是女性，导致该国医生极度缺乏，致使男子平均寿命为 43 岁，女子平均寿命为 47 岁。^③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结束对阿富汗的访问后向外界表示，重建医院和恢复医疗中心的正常运转是阿富汗卫生部门面临的首要问题，培训医务人员以及控制传染性疾病的解决问题的关键。

① 《中国与阿富汗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29/c70731-2593146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6 月 2 日。

② 《习近平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0/c_112296471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1 月 5 日。

③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课题组编《阿富汗：后冲突时期的稳定与重建》，时事出版社，2015，第 156 页。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阿富汗医疗卫生领域的重建。2003年8月，中国政府援助阿富汗战后重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喀布尔共和国医院。喀布尔共和国医院是阿富汗规模最大的医院，拥有250张床位和许多训练有素的医生，在阿富汗国内极具影响力。经过多年的战乱，该医院不仅缺乏基本的医疗物资，还缺少常用的医疗设备，难以正常运转。喀布尔共和国医院重建项目是中国政府承诺为阿富汗战后重建所提供的1.5亿美元援助的一部分，是阿富汗战后重建金额最大的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时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孙玉玺指出，中国政府对阿富汗民生情况非常重视，重建后的喀布尔共和国医院将成为阿富汗国内医疗条件最先进的医院。^① 喀布尔共和国医院重建项目的内容主要包括，全面维修医院主楼，重建三层辅助楼及门卫、道路、围墙等辅助设施，安装、调试中国提供的发电机组和医疗设备等。阿卫生部官员对中国的援助极为肯定，认为项目全部完工后，该医院一定会成为阿富汗最好的医院。

在援建过程中，阿富汗国内形势较为严峻，恐袭事件时有发生。2004年6月10日，中铁十四局集团公司援建阿富汗的公路建设项目盖劳盖尔工地遭到一伙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11名中国工人死亡，另有4名工人受伤。^② 尽管如此，喀布尔共和国医院重建项目依然正常推进。为了使喀布尔共和国医院能够在阿富汗社会重建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在已有援建内容基础上，2006年11月，中国政府援建的医院新主楼开工建设，新主楼高10层，共有350个床位，总建筑面积约为1.7万平方米。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出席了奠基仪式，并表示新主楼建成后，将给阿富汗民众就医带来极大便利。

喀布尔共和国医院重建项目于2009年竣工后，由于阿方的原因，长时间没有被有效使用。2013年3月，阿富汗内阁会议决定全面启用喀布尔共和国医院，并要求将其建成喀布尔乃至阿富汗国内管理最完善、技术最雄厚、设备最先进的示范性医院，阿卫生部逐步开展入迁工作。2013年10月，应阿富汗公共卫生部长苏拉亚·达利勒邀请，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邓锡军考察了喀布尔共和国医院，并就支持阿方尽早启用医院一事与苏拉亚部长交换了

① 《中国援助的阿富汗医院项目开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http://af.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308/2003080011482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5日。

② 王凤编著《阿富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97页。

意见。^① 苏拉亚部长对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向阿提供大量无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肯定了中方援建的喀布尔共和国医院是阿目前最先进的综合性医院,其本身就是两国政府和人民深厚友谊的最好见证。邓锡军大使表示,喀布尔共和国医院是中方援建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综合性医院,中方将同阿方一道,共同推动医院尽快重启,推进阿富汗社会重建。

在中阿双方的高度重视下,2014年1月,中国援建的喀布尔共和国医院正式开业,阿富汗第二副总统穆罕默德·哈利利与邓锡军大使出席开业仪式,其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穆罕默德·哈利利说,阿富汗每年有大量患者花巨资去邻国就医,中国援建的先进医院方便了阿富汗人民就近就医。邓锡军大使表示,中方将继续与阿方密切合作,为喀布尔共和国医院的运营维护和医护人员能力建设提供援助,推动喀布尔共和国医院平稳运行,造福更多阿富汗人民。他同时指出,中国在阿富汗的援建侧重于医院、教育和水利工程等能够让民众直接受益的民生项目。^②

为了使援建喀布尔共和国医院项目真正落到实处,2015年,在中阿两国建交60周年暨“中阿友好合作年”期间,中国政府援助阿富汗共和国医院技术合作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为期两年,总援助额为1641万元人民币,内容主要包括对医院的土建装饰、通风空调、给排水、暖气供水、发电照明、电梯、弱电信号等系统及医疗设备进行维修维护,以及培训相关技术人员,提供部分设备、材料及零配件。中国驻阿参赞指出,涉及该医院的技术合作项目是民生窗口项目,中方专家组帮助阿方完善医院功能,让阿富汗民众受益。喀布尔共和国医院院长帕尔迪斯认为,多年来中国对阿富汗的无偿援助在加快阿富汗文化、医疗、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起到巨大作用。^③

除此之外,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也是值得研究的成功案例。

2001年9月,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玛丽·科尔汶在美国大兵压境时欲采

① 《驻阿富汗大使邓锡军考察我援阿共和国医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网站, <http://af.china-embassy.org/chn/sgxx/sghd/t1086382.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30日。

② 《中国援建的阿富汗共和国医院开业》,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121/c157278-24187317.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10日。

③ 《我国援助阿富汗共和国医院技术合作项目正式启动(图)》,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1/22/c_127411287.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8日。

访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但奥马尔拒绝了她的采访，并送给她一封装在桃红色信封里的亲笔信：“我真的非常忙，我只接受那些非常重要人物的来访。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妇女几乎没什么事可做，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接见像你这样的妇女。”奥马尔的回信形象地展现了塔利班执政时期阿富汗妇女的地位。^①阿富汗重建后，教育事业尤其是女性教育得到重视。2004年宪法明确规定，接受教育是阿富汗所有公民的权力，阿富汗致力于推动全国各地教育事业平衡发展，其中包括促进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尽管如此，阿富汗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仍是阿富汗与国际社会目前的一项共同的、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

基于此，中国在参与阿富汗社会重建中，高度重视对阿富汗教育领域的援助，尤其是对女性教育领域的援助。其中，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已逐渐成为中阿在教育领域长期稳定的品牌合作项目。

2008年3月，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项目启动，由中方太原理工大学与阿方喀布尔大学共同建设。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建立之初，办学条件较为简陋。最初的校舍只有很小的不足30平方米的教室、15平方米的办公室和15平方米的汉语图书室。学校办学条件差，缺乏师资力量和汉语教材，甚至中方和阿方都没有同时会说两种语言的老师。尽管如此，在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基础上，太原理工大学协助喀布尔大学筹建了阿富汗第一个汉语系，并于同年开始招收汉语专业本科生。

在创办初期，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发展受到了阿富汗安全形势的严重制约。2011年10月，中方人员由于安全原因撤离阿富汗。之后，喀布尔大学向中国国家汉办提出复课申请，2013年4月，中方决定恢复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在复课仪式上，喀布尔大学校长哈比卜充分肯定了孔子学院在阿重建中的积极作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徐飞洪则重申了中国政府对教育援阿的重视，使馆也将全力支持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和援阿项目建设。^②

为了进一步推动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建设，中阿两国政府于2011年签订援建阿富汗喀布尔大学中文系教学楼和招待所项目的换文。该项目属于中国成套援

① 蒲瑶：《国际妇女 NGO 在阿富汗：作用与挑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第98页。

② 《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复课仪式》，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hw/jy/2013/04-08/470917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8日。

外项目、精装修交钥匙工程，是中国政府支持阿富汗战后重建的重要援助项目，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座新桥梁。中国援建阿富汗喀布尔大学项目包含中文系教学楼和招待所两部分，中文系教学楼为地上三层，总建筑面积为 2053.5 平方米，可容纳至少 200 名学生同时上课；招待所为地上四层，局部地下一层，总建筑面积为 4588 平方米，主要为喀布尔大学的外籍教师提供 48 套宿舍及配套设施。该项目于 2012 年 10 月开工，2014 年 12 月 23 日正式移交阿富汗，并被称为“阿富汗最坚固、最漂亮的建筑”^①。

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发展创造了空间。2012 年以前，喀布尔大学中文系每届学生的规模都会控制在 25 人左右，但从 2013 年开始，在阿富汗高教部的推荐下，该系年招生规模在 50 人左右。与此同时，2013 年，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成功申办了阿富汗首个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同年 4 月，HSK 首次在阿富汗举行。之后，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相继开设涵盖初级、中级、高级各阶段的汉语课程，同时开设旨在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各种技能的所有汉语课程。2015 年 5 月 3 日，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为喀布尔大学非汉语专业学生开设首期汉语培训班。2016 年 5 月，阿富汗首次举行“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此外，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还在 2016 年开设文化技能课程，这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技能课程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技能，如书法、中国画、剪纸、太极拳、中医、茶艺等；同时，还会介绍一些与阿富汗文化相关的技能，如阿富汗武术、书法等。

随着汉语教学内容的丰富，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在师资队伍建设及学生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步。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在中方的高度重视下，2014 年，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新培养并吸收 3 名阿富汗本土汉语教师，从而使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累计培养的阿富汗汉语教师达到 7 人，其中 4 名阿富汗籍汉语教师获得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奖学金并来华进修硕士学位。学生培养方面，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自 2008 年 3 月底开始招生后，招生数量稳步增长，其中第一届学生为 15 人，第二届学生为 16 人，第三届学生为 24 人，第四届学生为 29 人，第五届学生为 50 人，第六届学生

^① 《中企工程扮靓喀布尔大学》，《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23 日。

为45人，第七届学生为63人，第八届学生为50人。至2016年3月，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已招收八届292名学生，第一届到第五届学生已全部顺利毕业。在培养质量上，292名学生中，先后有197人获得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奖学金。^①

以此为基础，2016年10月，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在马里法特学校开设中文教学点。马里法特学校是喀布尔市基础教育领域最为著名的学校，集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全校有3000多名师生。中国驻阿大使姚敬高度认可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和马里法特学校在推进阿富汗中文教学、促进中阿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鼓励学生认真学习中文，将来做促进中阿两国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并表示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将继续大力支持阿富汗中文教学事业。马里法特学校校长罗耶什表示该校将积极推动中文教学工作，不断扩大和提升教学规模和质量，并欢迎中国师生来校访问、交流。中文教学点的开设，标志着马里法特学校在英语、法语之后，首次开设汉语课程，成为阿富汗全国第一所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

继马里法特学校正式建立阿富汗首个中文教学点之后，2016年11月20日，第二个中文教学点在阿维森纳大学开办。该中文教学点由阿维森纳大学与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建立。阿维森纳大学地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是阿国内一流的私立大学。阿维森纳大学设有外语学院，中文教学点就设在该学院。在合作中，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不仅为阿维森纳大学提供师资力量的支持，也会在汉语教材方面提供帮助。至此，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形成了“一院两点”、从小学到大学的全覆盖教学模式。

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能够在战乱频仍的阿富汗重建时期取得突出成绩，中方教师的奉献精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喀布尔大学副校长拉赫纳·波帕尔扎伊就曾评价孔子学院是喀布尔大学最好的学院之一，并亲切地称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为“自己的阿富汗同事”。新疆财经大学的古丽尼沙·加马力老师于2017年3月到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教授中文，与其结婚35年的丈夫吐尔逊提前办了退休手续并到阿富汗陪伴妻子，却不幸在阿因病去世。在古丽尼沙老师回国办理其丈

^① Wahidullah Halimy:《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发展现状与面临的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第8页。

夫后事时,很多人都劝她留在乌鲁木齐生活,但古丽尼沙老师仅在一周后就强忍悲痛回到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重执教鞭,因为她放不下阿富汗的学生,希望与阿富汗的同事和学生同甘共苦,用自己的教学成绩告慰丈夫。^①她的事迹在喀布尔大学广为传颂,为阿富汗教育重建注入了中国女性的精神力量。

2017年9月,姚敬大使、阿高教部副部长卡尔扎伊、喀布尔大学校长法鲁奇参加了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孔子学院日”系列活动,姚大使积极评价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在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华文化和促进中阿人文交流等方面所做的贡献。卡尔扎伊副部长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对阿教育事业的帮助和支持,并认为当前阿处于和平重建的关键时期,孔子学院为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阿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交流互鉴,推动两国教育合作再上新台阶。法鲁奇校长指出当前阿中关系蓬勃发展,汉语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孔子学院为阿富汗培养的大量毕业生在推动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友好交流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中作用巨大。^②

同年12月,在第12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召开期间,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2017年度理事会同期进行。中国太原理工大学及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校长以及相关事务负责人参加会议。中阿双方一致认为,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经过近10年的发展,运转顺利。汉语推广在阿富汗反响良好,受到孔子学院总部的认可和肯定,2017年在太原理工大学的阿富汗学生已经达到129名,这些学生通过学习汉语国际教育课程,促进了中阿教育和文化交流,加深了中阿双方友谊,双方计划在学生互访和文化活动外,推动科研、教育研究等方面的深度交流和全方位合作。^③会议围绕“太原理工大学—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运行协议的修订”和“汉语教师、志愿者派出及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发展相关事宜”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2018年5月,在阿富汗外交学院、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和喀布尔大学孔子

① 《驻阿富汗大使刘劲松:中阿两国女性各项半边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web/dszlsjt_673036/t1540738.s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11日。

② 《驻阿富汗大使姚敬出席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zwbdt_674895/t1498582.s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日。

③ 《我校召开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2017年度理事会》,太原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网站, <http://ciee.tyut.edu.cn/info/1007/2385.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日。

学院多次沟通磋商后，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阿富汗外交学院汉语培训班开班典礼举行，阿富汗外交学院院长莫海博·斯宾哈尔等出席。该培训班是阿富汗政府部门与孔子学院的首次合作，第一期培训班招收外交官学员 10 人，为期 6 个月，每周 4 课时，共计 96 课时。由阿富汗外交学院提供教学场所，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提供教学材料和教师。通过课程学习，受训官员能够用汉语进行简单的表达和交流。^①在此基础上，9 月，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青年领袖访华团成行，此次访问为期 13 天，其中有 11 位来自阿富汗总统府、议会、外交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17 日，访华团访问了孔子学院总部，感谢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的资助和访问机会，并表示未来将为两国人员、教育、商务往来和交流做出更大努力。18 日，访华团访问了中国外交部，与中国外交人员就中阿关系、南亚和平与安全局势进行讨论，并对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保持地区安全和稳定达成共识。19 日，访华团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部进行了座谈交流活动，并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在更多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此外，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青年领袖访华团在华期间访问了中铁十四局，选择到访该局是基于其在阿富汗的影响及特殊贡献。据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慧阳介绍，“孔子学院不少学生毕业后到中铁十四局阿富汗项目部工作，在那里学习成长进步，很多已成为项目管理的中坚力量”^②。

2019 年 2 月，驻阿富汗大使刘劲松到访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专程向孔子学院老师拜年，感谢他们的努力和奉献，并向其致以春节最美好的祝福。刘劲松指出，“需要更多懂中文爱中国的外国朋友，需要国人有更多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情怀，需要更多有战乱之地工作经验的人才。因此，阿富汗这块土地需要也值得中国人来耕耘”^③。

此外，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发展也在整体上推动了中国建设性参与阿富汗教育重建进程。

① 《我校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阿富汗外交学院汉语培训班开课》，太原理工大学网站，<http://www2017.tyut.edu.cn/info/1028/8431.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2 月 5 日。

② 《中铁十四局集团公司：筑牢中阿友好的基石》，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8-09/13125789.html?agt=15438>，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1 月 15 日。

③ 《驻阿富汗大使刘劲松慰问春节期间留守工友和孔院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zwbdt_673032/jghd_673046/t1636196.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2 月 15 日。

2014年4月15日,中国出资援建的阿富汗国家科教中心正式落成,阿富汗教育部长法鲁克·瓦尔达克在项目交接仪式上称,该中心设计独特、设施先进,是双方在教育领域合作的典范,是阿富汗现代教育的里程碑式建筑。2017年4月,中国援助阿富汗国家职业技术学院项目正式开工,工程主要包括新建教学楼、综合楼、宿舍楼,进行汽修车间技术升级改造。2017年10月,中国援阿富汗喀布尔大学综合教学楼和礼堂项目开工典礼举行,该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4100平方米,其中综合教学楼的建筑面积为8350平方米,礼堂的建筑面积为5200平方米,设备用房的建筑面积为550平方米,主要涉及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强弱电系统、给排水系统、空调通风系统、教学办公设备安置、室内家具器具、室外工程等。建成后,其将成为喀布尔大学最大的建筑综合体。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代表阿富汗政府阐释了中国政府援助的阿富汗喀布尔大学综合教学楼和礼堂项目以及其他教育援助项目对阿富汗社会重建的重大意义,肯定了中方对阿富汗教育领域的贡献,并指出阿富汗目前处于战后重建关键时期,人才需求量大,该项目将成为促进阿富汗高等人才培养及阿中两国人文交流的巨大助力。^①2018年12月,中国十九冶集团承建的援阿富汗喀布尔大学综合教学楼和礼堂项目顺利通过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组织的中期验收检查,工程质量被评定为最高等级“优良”。

在中国等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帮助下,阿富汗的教育重建成效渐显。2013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阿富汗教育部长法鲁克·瓦尔达克的陪同下参观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爱莎·杜兰妮学校。该校以首位创办阿富汗女子学校的女性名字命名,它曾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博科娃说:“在这所学校里,我看到了阿富汗取得的巨大教育成就,2001年时还没有一个女生能够进入学校学习。阿富汗具有悠久的历史,现在又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你们可以通过下一代的共同努力将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②

教育重建过程十分漫长,当前阿富汗依然有约370万名失学儿童,其中70%是女童。面对国内政治及经济领域重建的压力,阿富汗政府宣布将2018年

① 《中国援阿富汗喀布尔建筑物项目开工典礼举行》,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0/11/c_1121782692.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25日。

② 陶媛:《阿富汗致力于保护女童的受教育权》,《世界教育信息》2013年第12期,第74页。

命名为“教育年”，将教育事业置于优先地位。该国教育部长米尔韦斯·巴尔希认为，“教育是对抗战争、贫穷和失业的利器”^①。他也明确表示，阿富汗政府正着力增加投入、创造条件以发展教育。

总之，中国通过医疗、教育等关键性民生项目援建来参与阿富汗社会重建，与北约派出军队进驻他国、美国无人机误射无辜平民等形成鲜明对比，将对中阿关系发展、阿富汗战后重建乃至阿富汗和平进程等均产生深远影响。

三 “一带一路”下深入推进中国参与阿富汗重建的对策

（一）应以民生为抓手进一步改善阿富汗民生状况

医疗卫生建设是民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喀布尔共和国医院的援助，改善了阿国内的医疗卫生状况，有助于阿富汗重建工作顺利进行。教育建设同样也是国家民生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社会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的影响力和作用日益凸显。2014年9月29日，前财长阿什拉夫·加尼宣誓就任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就职讲话中表示，进行革新、减少贫困并改善阿富汗人民的生活状况是阿富汗政府近期的第一要务。^②可以说，通过阿富汗10余年的重建历程，阿政府已意识到民生在国家重建中的重要性，中国政府以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为抓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阿富汗国内高校及中小学学生，尤其是女性的文化素质，并深化两国高校间各学科领域的交流，从而为阿富汗青年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在民生等社会重建领域积累的经验将为中阿两国进一步加强社会重建项目合作奠定基础，尤其是中国对阿富汗教育基础设施的援助，不仅在阿富汗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还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切实帮助朋友、关心对方社会发展和民生情况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因此，中国今后应以民生为抓手进一步改善阿富汗民生状况，以深度参与阿富汗重建进程。

^① 《阿富汗儿童教育困局难解》，《人民日报》2018年6月6日。

^② 《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宣誓就职 前总统卡尔扎伊祝贺》，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9-29/664413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11日。

(二) 应进一步加强阿富汗人才培育合作机制建设

中国参与阿富汗社会重建以来,以培养阿富汗医疗人才、教育人才为抓手,为阿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2004 年至今,中国政府针对阿富汗重建开设了阿富汗护理人员培训班、阿富汗公共卫生高级官员研修班、阿富汗农业研修班、阿富汗教育研修班、阿富汗种植业管理研修班、阿富汗防洪经验研修班、阿富汗灾害管理研修班、阿富汗经贸研修班、阿富汗新闻媒体管理研修班、阿富汗铁路规划与管理研修班、阿富汗高级邮政官员研修班、阿富汗农业发展政策与经验研修班、阿富汗财政研修班、阿富汗国家公共管理研修班、阿富汗禁毒反恐研修班、阿富汗矿产开发与管理研修班、阿富汗电信研修班等,从对社会领域的人才培养逐渐扩展至对阿富汗各个领域的人才培养,从根本上提升了阿富汗的重建能力。因此,今后应有步骤、成机制地为阿富汗重建培养人才,中阿更应加强机制建设,开展人力资源合作,进一步提升阿富汗的重建能力。

(三) 应进一步提振阿富汗重建的社会信心

尽管阿富汗战争早已结束,但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依然堪忧,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依然影响阿富汗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受阿富汗形势的影响,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国新疆周边国家及克什米尔等地区安全形势不稳定。在社会重建领域,中方承诺加大对阿和平重建的支持力度,包括帮助阿方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培养各类人才,进行农业、水电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方在阿矿产和能源投资项目取得实际进展,促进阿国内经济发展和民生状况改善。中方重申支持阿富汗加强地区合作,欢迎阿方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①从具体社会重建项目的运作来看,不少项目的内核建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如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可以增加中国文化方面的教学内容,通过开设相关文化课程及举行相关活动,不仅可以让阿方学生了解中华文化,还能展现当前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的热情与信心。这类活动如能走进喀布尔社区,则可

^① 《王毅: 中巴经济走廊将以适当方式向阿富汗延伸》, 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1227/c1002-29731923.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5 月 25 日。

吸引更多的阿富汗民众了解中华文化与当代中国。在此基础上，在阿国内主要大城市增设汉语教学点或新建孔子学院，使阿富汗的汉语教学机构形成整体布局，让民众了解中国，进而为提振阿富汗重建的社会信心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责任编辑：王 畅)

Study on China's Constructive Participation
in Afghanistan's Social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Min Jie

Abstract: Afghanistan is a neighbor of China and an important partner in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After the 2001 Afghanistan War, China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and gradually formed typical cases such as the Republic Hospital of Kabul a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Kabul University. At present, China should still focus on people's livelihood, further strengthen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talent cultivation for Afghanistan's reconstruction, and boost the social confidence of Afghanistan's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Afghanistan's Social Reconstruction; China's Diplomacy

波斯文化典籍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荷兰] 阿里阿斯噶尔·赛义德古拉卜

【摘要】 诗歌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表现形式，在表达民族情感上具有独特的作用，能够定义某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亲疏关系。诗歌在波斯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是诠释民族身份、塑造文化形象的主要文化因素。本文通过历史上波斯诗歌对中国的定位及对中国元素的应用，分析其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影响，并从美学角度阐述诗歌在当代国家形象互构中的作用。

【关键词】 波斯诗歌 中国形象 中国故事

【作者简介】 阿里阿斯噶尔·赛义德古拉卜，莱顿大学副教授。

在《美学与世界政治》(*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一书中，罗兰·布莱克(Roland Bleiker)以美学在理解过去20年重要国际事件(如恐怖袭击、战争、种族清洗、气候变化等)中起到的作用为例，论证了艺术与诗歌在国际关系中能够发挥一定作用。通过分析这些事件中涉及的语言，罗兰·布莱克得出结论：诗歌是语言的核心，语言是人类的精华。若想通过检视这些事件来深入理解语言中蕴含的情感 and 政治动机，则诗歌是最好的媒介。人们在讨论国际关系时，通常不考虑情感因素。但是，重要的国际事件通常是涉及情感的，如恐怖袭击。布莱克引用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特拉(Gaston Bachelard, 1884 ~

* 本文节选自2018年12月18~19日于莱顿大学举行的“中国与伊朗——文化与政治”国际研讨会开场论文。译者为王诚，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教师。

1962)的部分观点,如“诗歌是灵魂与思想,回馈我们以梦想,让创造‘从未经历过的,生命中也不会有有的形象’成为可能”^①等,他认为诗歌是“美学与政治联系的完美阐释,是可以观察美学作为一种微缩景观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的途径”。^②

布莱克又对阿瑟·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的观点加以阐释,认为语言是主观的,语言的主观性控制着我们的思维。照这样推理,语言就成为思想与信念的缩影。他甚至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改成“我即思维”。^③布莱克认为,诗歌是思想的核心表现,是反映民族精华的一面镜子。由此可以推知,诗歌控制人们的思维,给予生命以意义,创造身份,塑造人们的敌友观念。布莱克写道:“诗歌的精华并非主要存在于其形式层面,比如节奏和韵律。诗歌的核心在于其中蕴含的自我意识,它能将语言与社会政治现实连接起来。”^④

诗歌的核心实际上并不是节奏或韵律,而是比喻及形象化的语言。尼采认为,语言是现实的隐喻体系,而诗歌是比喻的宝库,能够呈现真实可触的事件。与物体、事件及抽象概念本身相比,比喻可以让这些事物更加形象化地呈现在人们的脑海中。^⑤在描述现实时,诗歌能够创造一种模糊空间,人们通过反复阅读来探索其中新的含义。通过这种方式,诗歌将生活与现实以新的角度呈现在读者面前,启发读者进行思考。由此可见,诗歌创造了含义与属性的有形体系,通过比喻和形象化的描绘,将文化作为一个“实体”展现出来。因此,诗歌不仅可以定义一种文化的身份,还定义了该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亲疏关系。

诗歌作为波斯文学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的各个族群中都十分流行,吟诗已成为上至皇室、下到民间都流传甚广的文化符号之一,甚至连目不识丁的人都能将数百行诗歌熟记于心,在谈论某个事件时对诗歌信手拈来。因此,波斯诗歌在诠释民族身份、塑造文化形象时的重要性可能比其他文学作品和文化要素都要高。波斯诗歌中对中国的描绘并不多,但是可以找到一些内容。大部分伊朗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源于具有千年历史的波斯诗歌。

①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85.

②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86.

③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88.

④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93.

⑤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90.

此外,中国与伊朗在各个领域的交往由来已久,文化传播与交往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中伊两国人民都认为,文化在两国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以中伊关系史为主题的书和文章也以两国古代的艺术和人文交流开篇。即便是涉及当代政治议题,如果仅从西方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的视角出发,忽视中伊两国数个世纪以来的文化交流,则其研究成果就是不全面的。约翰·W.加弗(John W. Garver)在《中国与伊朗:一个后帝国世界的古代伙伴》(*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2006)的开篇写道:“在深入研究中伊关系时,会遇到很多关于古代文明、千年友好交流、共同反对西方压迫的描述。”^①加弗在该书后面章节中强调,中伊双方对彼此的影响力表示尊重。^②由此可知,两国之间延续至今的文化交流及相似的历史走向是论述、分析中伊两国当代关系的基础。诗歌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亦是中伊两国文化交往的重要一环。加弗写道:“波斯诗歌影响了中国唐代的诗歌。马球从波斯传入中国,在朝廷广受欢迎。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庙’(Ātashkada)中跳的祭礼舞蹈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波斯菜肴在中国大受欢迎,对中国烹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位权威人士曾说过:在唐代,尤其是在8世纪前半叶,中国人痴迷于各种波斯物件和习俗,包括食物、布料、家具、音乐和舞蹈。”^③这些文化符号都以波斯诗歌为载体,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

由上文可知,波斯诗歌中对中国与中国人的比喻和描绘揭示了伊朗文化对中国形象进行定义的方式,而其本身作为伊朗文化的重要符号,也在历史上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出以及在深化中国与伊朗两国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波斯诗歌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及波斯诗歌赋予中国和中国人的特征;波斯诗歌所体现出的中国在古代伊朗人世界观中的地位;从中国传入伊朗的理想挚爱形象影响两国关系的原因和方式;伊朗的绘画艺术与中国的相关性,以及这种相关性是如何得到进一步阐释的。在此提出一个假设:

① John W. Garver, *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 3.

② John W. Garver, *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 3.

③ John W. Garver, *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 14.

在伊朗文化中，其他民族（如中国）的形象首先是通过诗歌来进行塑造的，之后普及至音乐、绘画等文化、艺术领域。诗歌是我们了解中国在伊朗文化中的呈现方式的途径^①，它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载体，对中伊两国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 波斯诗歌对中国最初的定位

在伊朗文化中，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主要是通过波斯诗歌塑造的，尽管也有一些老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形象是通过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所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②塑造的。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取决于其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各种文化呈现在世界的方式各不相同，人们对自我及周围环境的描述与文化观念息息相关。受伊朗文化的熏陶，伊朗人的世界观在本质上以伊朗为中心，以世界其他地方为边缘。这一世界观的引申含义是：伊朗人是最有天赋、最美丽和最强大的民族。“伊朗中心论”的观点从波斯诗人内扎米·甘哲维（Nizāmī Ganjivī, 1141 ~ 1209）的叙事诗《七美人》（Haft peykar）中可见一斑：

خنک آنکس که او به فصل بهار
لذتی دارد او به بوس و کنار
خانه چین گشاده منظر او ی
شاه قیصر نموده دختر او ی

中文译文：

如果说整个世界是身体，那么伊朗就是心脏；
做这个类比的人不必脸红。

① 有关这些问题及相关问题的分析见本文完整版。

② 本句用阿拉伯语表述如下：uṭlibu'l- 'ilm wa lau bi 'l-ṣīn。本文对于有关中国在波斯诗歌中形象的研究内容有限。下面这篇文章的研究对象比较全面，但分析内容较少：Shirzād Täyefi, Bubin Kuy, Ali-Rizā Pürshabānān, "China in the Prism of Persian Poetry (Chīn dar manshūr-e shi'r-i fārsī)," *Pazhūhishnāma-yi zabān va adabiyāt-i Fārsī*, Issue 4, Vol. 3, 1389/2010, pp. 137 – 160.

伊朗是地球的中心，
心脏当然要比身体优越。^①

这种思想背后的逻辑是波斯的“七国说”^②，其在伊朗文化中是常见的世界地理划分方式。根据这种学说，世界分为七个国度，由海洋、森林或山脉分隔开，伊朗位于世界的中央，比其他六个国度加起来还要广阔、繁荣、富有。伊朗人认为，人类诞生于伊朗地区，随后迁徙到其他国度繁衍生息，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宗教。中央国度的国王可以统领其他六个国度。在希腊人看来，“七国之王”，也就是“王中之王”的表达是由伊朗人创造的。

在这种地理划分体系中，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由伊朗统治。中国皇帝是伊朗“王中之王”的一个封臣。中国的具体区域不明确，但通常是从中亚到大地东边的一个地方。这种划分体系试图理解世界及伊朗周围的环境，但有时会随社会政治与宗教发展版图的变化而变化，有些地区会进入世界中心，有些地区则会被排除出世界中心。比如，阿拉伯通常被定义为“七国”之中的一块独立领土，尽管从 11 世纪起，阿拉伯的宗教圣地麦加就成为世界中心，但其仍然被认为是伊朗的一部分。这种地理划分体系也体现了“各国”之间的强弱关系，而不只停留在传说层面。尽管中国是“七国”之一，但中国有自己的统治体系和疆土。中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遥远的国度，神秘莫测，到处都是异域面孔。

在波斯古典诗歌中，理想挚爱的形象来自中国。波斯诗歌无数次提到中国的挚爱形象。

二 中国在波斯诗歌中的表现形式

(一) 中国的建筑在波斯诗歌中的应用

波斯诗歌描述中国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大量的意象、隐喻和寓言将中国和中国

① Nizūmī, “Haft peykar,” in V. Dastgirdi, ed., *Tehran: Armaghān*, 1315/1934, p. 31.

② A. Shapur Shahbazi, “HAFT KEŠVAR,”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 XI, Fasc. 5, pp. 519–522,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haft-kesvar> (Accessed on December 30, 2012).

的建筑艺术联系起来。在早期的波斯诗歌中，就出现了一些体现中国元素的词，如中国宫殿（Īvān-i-Chīn）、中国房屋（Khāna-yi-Chīn）等。如今，在巴尔赫（Balkh）、加兹尼（Ghaznī）和巴米扬（Bāmiyān）这些伊朗文化圈东部的城市都可以看到中国寺庙。11 ~ 12 世纪的波斯语诗人安萨里（’Unsarī, 1058 ~ 1111）曾创作了一部浪漫作品《红白偶像》（*Surkh-but u Khing-but*），其中就描写了“巴米扬悬崖边的巨大石佛”，这座石佛在 2001 年被塔利班摧毁。^①

关于中国壁画的典故在波斯诗歌中比比皆是。笔者已经在其他地方阐述过波斯宫殿中的壁画以及波斯诗人是如何尝试用文字来描绘图像的。^② 或许部分参考文献是间接的，但提供了具体的证据，证明在宫殿等建筑中确实装饰着丰富的画作。有关中国建筑的绘画典故在早期伽色尼王朝（Ghaznaviyān, 962 ~ 1186）时期的波斯诗歌中就出现了。

伽色尼王朝诗人萨纳伊（Sanā’ī）在他的抒情诗和教诲诗中大量提及中国。他在代表作《真境花园》（*Hadīqat al-haqīqa*）中描绘春季时，指出了波斯帝国的东西方。在西部边境，恺撒将女儿嫁给波斯王子以化敌为友，而处在波斯东部的中国早已成为与波斯帝国关系十分密切的朋友：

خنک آنکس که او به فصل بهار
لذتی دارد او به بوس و کنار
خانه چین گشاده منظر اوی
شاه قیصر نموده دختر اوی

中文译文：

他在春季时是如此欢欣愉悦
在怀抱中他尽情享受亲吻

① 地理学家和史学家也意识到了“but”这类词的用法，以及它与佛像、雕塑和佛教寺庙的联系。Melikian-Chirvani 指 *Ḥodūd al-Īlam*，该作品指的是巴米扬的巨型雕塑。Asadullah Souren Melikian - Chirvani, “Buddhism ii. in Islamic Times,”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 IV, Fasc. 5, pp. 496 - 499,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buddhism-ii> (Accessed on January 1, 2000).

② Seyed-Ghorab, “Description (Wasf) and Ekphrasis in Anvari’s Poetry,” *Studies on the Poetry of Anvari*, in Daniela Meneghini, ed., *Venice: Studi Eurasiatici* (Ca’Foscari University, 2006), pp. 111 - 126.

中国的房屋/宫廷尽他所有
伟大的恺撒把女儿托付于他。^①

诗中所提的情况很难找到对应的历史事件，但它们确实能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伊朗人对中国的印象。我们从历史资料中可以得知，波斯国王霍斯鲁·帕尔维兹 (Khusrū Parvīz, 590 ~ 628) 逃到拜占庭帝国，寻求莫里斯皇帝 (Emperor Maurice, 582 ~ 602) 的帮助以对抗军队指挥官巴赫拉姆·楚宾 (Bahrām Chūbīn)，为此，他与玛丽亚姆 (Maryam) 完婚。根据波斯语资料，玛丽亚姆是莫里斯的女儿。^② 显然，这是一场旨在改善波斯与东罗马帝国关系的政治婚姻。这些典故强调波斯人如何看待周边的世界，也使读者对“敌人”和“朋友”形象的构建更加明确。萨纳伊的这首田园诗描绘了春天来临时人们的喜悦，还强调中国壁画以及拜占庭公主怀中的恋人形象。

(二) 波斯诗歌中的中国故事

波斯人常将绘画艺术与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 (Mānī) 联系在一起，他将自己的绘画教学称为“Ardahang”，甚至有关他的书名是 Artang-i-Chīn。一般来说，绘画被视为中国艺术。如果不讨论“中国和希腊画家之间的较量”这一典故，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地呈现中国艺术在伊朗的分量。这个最受欢迎的讨论话题最早出现在 12 世纪，由多才多艺的穆罕默德·卡扎利 (Muḥammad Ghazālī) (公元 1111 年) 在他的作品中提出。随后，内扎米 (Nizāmī) 的《亚历山大大帝之书》(Iskandar Nāma) 和鲁米 (Rūmī, 1207 ~ 1273) 的《玛斯纳维启示录》(The Mathnawī: The Spiritual Couplets of Jalaluddin Rumi) 也提及这个话题。内扎米的史诗《荣耀颂》(Sharaf-nāma) 提及亚历山大作为伊朗人和穆斯林的大帝曾访问中国。在宫廷的一次节日聚会中，朝臣们讨论世界上哪个民族聪明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各个地区的人都有独特的才能。其中一个希腊人赞扬本国人在绘画方面的

① Sanā'ī, “Hadīqat al - haqīqa,” in M. Rowshan, ed., *Tehran: Nigāh*, 1377/1998, p. 290. 这些诗句在 Mayram Hoseynī 的版本中没有出现，这里的诗句出自 Shirzād Tavīfī 等的作品。

② “玛丽亚姆是莫里斯的女儿”出自 Paola Orsatti, “Kosrow o Širin,” *Encyclopaedia Iranica*,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kosrow-o-sirin> (Accessed on August 15, 2006)。

卓越才能，这引起了一位中国朝臣的反对，一场较量就此展开。双方画家被邀请在两个相对的穹顶上作画，作画区域用布隔开，以防止他们看到对方的作品。双方画家同时开始作画，当画作完成、帷幕升起时，亚历山大大吃一惊，因为这两幅图像完全相同。于是，为了表扬两位画家，亚历山大便说希腊画家在绘画上更胜一筹，而中国画家在抛光上是一流的：

چو شد صفة چینیان بی نگار
شگفتی فرو ماند از آن شهریار
نگر ره حجاب از میان بر کشید
همان پیکر اول آمد پدید

中文译文：

中国人画穹顶时没有用到任何图纸

国王一度担心焦虑，

但当帷幕 (hijāb) 揭开

两幅画竟是一模一样。^①

事实上，内扎米并未言明，这个故事还有更深的精神层面的含义。“hijāb”除了具有“帷幕”这个含义外，在精神层面，它还指人与神之间的“面纱”。人是神的化身、神的反映，人可以通过“抛光”自己的“心灵之镜”来看到自己的神性。

鲁米充分认识到精神层面的含义，认为这是讲述精神“成长”的寓言。鲁米认为中国人的绘画技艺水平更高，而希腊人则更善于抛光。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悖论，它强调“神秘经验胜过后天所得的知识”。在这个故事中，如果“抛光”较好，则“镜子”可以反映任何现实，其中包括神性。然而，这种反映的水平并不高于绘画（神性），但一定高于后天所得的知识。^②

① Nizūmī, “Haft peykar,” in V. Dastgirdi, ed., *Tehran: Armaghān*, 1316/1935, p. 403.

② 创造悖论是鲁米常用的典型手段，以强调神性就在人心中或者就在人身边，但是人总是无法察觉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泡沫与海洋”。在一首诗中，他说，泡沫与海洋不舍昼夜地运动着，但是人们看不到海洋，只能看到泡沫。

三 结语

笔者首先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在波斯文化中，其他民族主要是通过诗歌来定义和传播的。因为在波斯语中，诗歌是表述外界身份的主要媒介，它使我们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是其他方式都无法做到的。历史上，中国是伊朗神话世界观的一部分，作为伊朗统治下的七个国度之一，中国因“理想挚爱”的形象以及艺术的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形象。这样的表述为伊朗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提供了宝贵的来源。我们在对比波斯诗歌中中国人与阿拉伯人的形象时发现，阿拉伯人的形象是负面的，充满了对伊朗的偏见；而中国人则具有积极的形象。美学在这些话题中的参与能够使我们理解和评估一个民族在某种文化中的定位，这对建立互相了解的国家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责任编辑：赵 阳)

China's Image in Persian Culture: The Role of Aesthe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i-Asghar Seyed-Ghorab

Abstract: As a common approach of literary presentation, poetry has its unique role in expressing emotions related to nations, and it can als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ertain kind of culture and other cultures. Poetry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Persian culture as the main cultural factor for interpre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shaping

^①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174.

cultural image. Through Persian poetries' historical portraying of China and the adoption of Chinese el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poetry on the mutual portraying of contemporary countries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Keywords: Persian Poetry; China's Image; Chinese Stor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经验和启示

刘 晨

【摘 要】 本文从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入手，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方针、制度保障、运作模式等方面，从而总结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经验，并结合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实际情况，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新加坡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是注意各个族群社团的沟通融合，二是注意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协作，三是注意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这些措施不仅有效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提高和增强了其国民的文化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

【关键词】 新加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多元文化

【作者简介】 刘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一 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形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国土狭小，面积只有 700 多平方千米，资源匮乏，但地理位置异常重要，素有“远东十字路口”与“东直布罗陀”之称。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新加坡自古便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海上桥梁，其社会文化发展因而呈现多元与外向特性。

（一）新加坡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

文化，对内可以整合国家，提升国家认同水平，增强民族自信心；对外可

以通过传播辐射、吸引和感召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提升国际威望。新加坡文化既包含华人移民的儒家思想，也吸纳西方的民主法制文化，即非单一的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而采众者之长，形成独特的文化。多元主义是新加坡文化最为显著的特点。

新加坡政府历来重视文化建设，通过推行多元主义政策，促进种族融合，形成文化向心力。今日的新加坡各族群及其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传统艺术、风俗习惯、节庆活动等在此交集荟萃，呈现五彩缤纷的美丽景象。新加坡已发展成为一个文化性突出的“国际大都市”，呈现异彩纷呈、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景观。

（二）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形成过程

从新加坡历史来看，新加坡文化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即狮城王朝时期、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和独立建国后。经过各个时期的文化熏陶，今日新加坡多元民族文化特性得以形成。

1. 狮城王朝时期：狮城王朝是新加坡古代史上首个也是唯一的封建王朝^①。狮城王朝时期，新加坡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层面的发展水平均达到历史顶峰，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但由于狮城王朝仅持续一个多世纪便覆灭，其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今日的新加坡被称为“新加坡”及“狮城”^②，正源于14世纪的新加坡狮城王朝。

2.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人将新加坡辟为商港。这一时期，华人、马来族、印度族等移民大量涌入新加坡，英国殖民者对各族群分而治之，新加坡逐步形成西方制度与东方人文观念相结合、英国殖民者主导、以华人为主体的多元异质移民社会与文化。^③

3. 独立建国后：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互动，新加坡政府在建国之

① 关于狮城王朝创立的年代无确凿证据，但其于1391年因强敌入侵而覆灭是定论。据马来史诗《马来纪年》记载，狮城王朝传五世，于14世纪末灭亡，五世王共统治123年。

② 狮城，在梵语中称“新加坡拉”（singapura）。

③ [英]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新加坡史》，欧阳敏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第6页。

初即确定将多元主义政策^①写入宪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涉及华人、马来族、印度族及其他族群^②的新加坡多元民族文化形成。

(三) 新加坡多元文化形成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前文所述,新加坡作为移民国家,多元民族、多元语言与多元宗教共生共存。新加坡的多元文化造就了新加坡独特的民族风俗,经过历史的锤炼,新加坡形成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世界知名民俗博物馆和学术界公认的人类文化多样性宝库,新加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丰富多彩的。正如新加坡文化遗产咨询小组主席杨淑爱教授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我们与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文化根源连在一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代代相传的活文化,传承者和社群在传承相关知识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③。

虽然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没有一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新加坡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意识和保护实践水平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和提升。政府和民众越来越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而且能够唤起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同时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成为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二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特点 与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一)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特点

1.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分类标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

① 新加坡政府在建国之初将多元主义写入宪法,确立包括多元民族(Multiracialism)、多元语言(Multilanguage)、多元文化(Multiculture)和多元宗教(Multireligion)的“4M”原则,承认新加坡建立在民族、语言、文化、宗教的多元性基础之上。

② 新加坡人口主要以四大族群来区分:华人(华族,占总人口的74.2%)、马来族(占总人口的13.3%)、印度族(占总人口的9.1%)和欧亚裔/混血(占总人口的3.4%)。对新加坡各族群人口的研究可参见[新加坡]苏瑞福《新加坡人口研究》,薛学了、王艳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第10~13页。

③ 转引自谢燕燕《创建本地非物遗文化库,新加坡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联合早报》2016年7月19日。

遗产”的定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被定义为源自特定社区并以传统为根基的集体创作，包括所有形式的传统和民间的文化。这些创作是通过口头和身姿传承，在历史上经过了一个集体再创造的加工过程。它们包括口头传统、习俗、语言、音乐、舞蹈、仪式、节庆、传统医药、厨艺以及各种与物质文化（如工具）、地方特产相联系的特殊技艺”^①。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具有巨大影响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很短的时间里被广泛传播，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标准为：①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及相关濒危语言；②传统表演艺术，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戏曲等；③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即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风俗习惯的重要礼仪、节日活动、庆典活动等；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即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知识和实践；⑤传统手工技艺，即世代相传、技艺精湛、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⑥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即集中体现或展现某种特定文化传统的区域、场所，如文化生态保护区等。^②

2.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与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将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如下种类。

(1) 口头传说类：主要包括民间口述传说，典型的有新加坡“鱼尾狮传说”。

(2) 表演艺术类：主要包括传统舞蹈，如华族舞蹈、马来舞蹈、印度舞蹈、多民族舞蹈；传统戏剧，如华语戏剧、马来戏剧；传统音乐，如华语音乐（如东山歌册）、马来音乐；民间诗歌，如潮州歌谣、马来班顿等。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英文表述为：The intangible heritage is defined as embracing all forms of traditional and popular or folk culture, i. e. collective works originating in a given community and based on tradition. These creations are transmitted orally or by gesture, and are modified over a period of time through a process of collective recreation. They include oral traditions, customs, languages, music, dance, rituals, festivities,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pharmacopoeia, the culinary arts and all kinds of special skills connected with the material aspects of culture, such as tools and the habitat. 转引自史阳《保护东南亚的文化多样性：东南亚的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第82页。

② 吴杰伟：《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看东南亚文化的区域性特点》，《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12期，第26页。

(3) 风俗礼仪类：主要包括婚姻习俗，如华族婚俗、娘惹婚俗、马来族婚俗、印度族婚俗；饮食习俗，如各族群饮食习俗；祭祀礼仪，如春秋两祭仪式、万缘盛会仪式等。

(4) 节庆活动类：主要包括传统民族节会、宗教节会，如桑格拉提节、屠妖节、中元节、大宝森节、蹈火节、哈芝节等。

(5) 传统手工技艺类：主要包括传统饮食制作技艺、传统民俗工艺，如长茶技艺、娘惹菜制作技艺、肉骨茶制作技艺、罗提抛饼制作技艺、海南鸡饭制作技艺、炒粿条制作技艺、酿豆腐制作技艺、椰浆饭制作技艺、华人婚嫁礼饼制作技艺、传统面包制作技艺等。

3.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1) 具有民族性特点。新加坡民族构成复杂，除了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三大族群外，还有欧亚裔/混血。每一个族群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特点，这可以通过该族群成员的语言、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体现出新加坡复杂族群的民族性特点，例如，具有华族特色的各种礼仪活动和节庆活动、具有马来族特色的舞蹈和音乐、具有印度族特色的手工艺技能。

(2) 具有地域性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定的地域产生和流传的，该地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习俗从各个方面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因此，新加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有其地域特色，如新加坡马来族的马来舞融合了新加坡各民族的风格，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民族舞蹈，具有地域性特点。

(3) 具有传承性特点。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了长期的传播、演绎与发展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去。传承性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保护的突出要求，如新加坡“鱼尾狮传说”经过民间代代口头相传，具有传承性特点。

(4) 具有互通性特点。新加坡是东南亚独特的国家，其族群构成的特点使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互通性特点，如新加坡是华人重要的聚居地，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祖先来自中国南方，闽粤尤为突出。在新加坡华人中，四成是闽南人，接着为潮汕人、海南人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与中国在某些非物质

文化遗产方面具有互通性，如新加坡菜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饮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①，这些饮食制作技艺在新加坡当地文化影响下逐渐改良创新，成了新加坡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如新加坡潮州歌谣在新加坡是传唱广泛的华语戏剧形式，早期由华人移民传入新加坡。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虽与中国颇有渊源，但其形式和内涵已发生较大变化。

（二）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概述

1. 口头传说类：“鱼尾狮传说”

“鱼尾狮传说”是一个讲述“狮城王朝”开疆拓土建立国家的民间传说，是新加坡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鱼尾狮”（Merlion）源于这个传说，是一头由狮首鱼身组合而成的异兽。

“鱼尾狮传说”最早载于马来西亚史诗《马来纪年》中，其中“圣尼罗优多摩的创建狮城”篇写了如下内容。某日，圣尼罗优多摩王子携王妃及部下去丹戎盘盘（Tanjong Bemban）游玩。其间，王子眺望淡马锡国雪白如棉的沙滩，于是带人出海前往。忽然，海上风浪大作，船开始漏水，船员一面排水，另一面抛弃行李减轻载重，虽屡经努力，但仍旧无效。船主请求王子将其王冕抛下，王冕一抛，风浪即止，船从水中升起，众人安全登陆淡马锡。在河口平原上，他们看见一只黑头赤身、胸生白毛，比公山羊略大的野兽奔驰而过，它敏捷强壮，极为俊美。王子问随从此野兽为何物，可没人知晓，等他去问陀曼黎峇耽时，才得知其为古籍中所载的狮子。王子认为此地是吉地，所以才会有如此威武的野兽，于是决意在淡马锡国内建立一座城市，在征得岳母廖内王后的同意后建国，国名为“信河补罗”（Singapura）。在梵文中，Singa为“狮子”，Pura为“城”，“信河补罗”即“狮城”之意。^②

“鱼尾狮传说”中昔日一闪而过的威猛之狮，逐渐演变为搏击风浪、患难共进、驻守海岸的“鱼尾狮”。鱼与狮的拼贴组合，不仅诠释着人们对海洋与陆地的生活化理解，也包含当地居民对“海城”和“狮城”历史的想象性记忆，更

① 王云庆、向怡泓：《中国—东南亚共同文化遗产的现状 & 保护对策》，《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71页。

② 王丹、王红：《新加坡“鱼尾狮传说”传承与保护研究》，《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25页。

含有人们渴望吉祥、自由、勇敢等的朴素想法。“鱼尾狮传说”是对“狮城”建国历史的想象性建构，也是对新加坡“狮文化”源头的追溯式表征。在增加强大而辉煌的“狮城王朝”的神话色彩之时，狮子的吉祥如意更丰富了新加坡的文化底蕴。可见，传说形象的具象化以及国家意象化实践能在新加坡国内发生，基于其特殊历史文化积淀而非偶然。

当下的鱼尾狮已脱胎于“鱼尾狮传说”，经过新加坡政府、民间组织共同参与的实体性和想象性建构实践，以及具象化和符号化的发展历程，成为新加坡的城市标识和国家意象，在强化国族身份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

2. 表演艺术类

(1) 传统舞蹈：华族舞蹈、马来舞蹈、印度舞蹈、多民族舞蹈

①华族舞蹈。新加坡华族人口数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 74.2%，新加坡华族舞蹈在新加坡舞蹈中具有重要地位。新加坡华族舞蹈主要由不同时期传入新加坡的中国传统舞狮、舞龙、红绸舞以及众多经过改编的民族舞（如采茶舞、荷花舞、剑舞等）构成。新加坡华族舞蹈借鉴了中国传统舞蹈元素，同时注重采用本土题材进行创作，并加强与新加坡马来舞蹈、印度舞蹈的合作与交流。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政府积极支持华族舞蹈发展，国家文化部下的国家舞蹈团于 1970 年成立。人民协会于 1971 年成立了华族舞蹈专业艺术团，有力推动了华族舞蹈艺术表演形式的推广与传承。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大量民间华族舞蹈团体涌现，如凤凰舞蹈团、晋江会馆舞蹈团、华人舞蹈团、聚舞坊、福建会馆舞蹈团、舞跃舞乡等，极大地推动了华族舞蹈的繁荣发展。

②马来舞蹈。马来族人口数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 13.3%，相应地，马来舞蹈是新加坡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马来舞蹈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木杆舞、遮阳舞等。由于新加坡马来族较少表演仪式舞蹈，早期马来舞蹈在新加坡社会主要被视为一种娱乐方式。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促进了马来舞蹈的发展。一个新成立的文化机构希里瓦纳^①（Sriwana）赋予马来舞蹈新的生命。希

① 希里瓦纳成立于 1950 年，原为音乐团体。1955 年，在新加坡人民反殖民主义情绪高涨时，其成为一个促进马来艺术与文化发展的文艺团体，积极开设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课程，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公开讲座等。

里瓦纳的最初目标是推广 Keroncong 音乐，但很快就扩大其范围，专职传播马来文化与艺术，并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来文化组织。新加坡马来舞蹈通过融合马来西亚舞蹈家的表演风格，形成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米南加舞、爪哇舞、巴厘舞、吉兰丹宫廷舞等舞蹈形式。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除了希里瓦纳外，更多政府及民间团体^①开始积极推广新加坡马来舞蹈，加上新加坡政府的大力支持，马来舞蹈得到极大发展。马来舞蹈增强了新加坡人民的文化认同和马来族的身份认同，其与印度舞蹈及华族舞蹈一起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②

③印度舞蹈。尽管印度族人口数仅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 9.1%，但印度舞蹈在新加坡舞坛上占有重要位置。新加坡印度舞蹈有多种流派，包括南印度舞 (Bharata Natyam)、卡塔克舞 (Kathak)、卡塔卡里舞 (Kathakali)、婆罗多舞 (Bharatanatyam) 等。其中婆罗多舞以优雅的编舞风格和几乎每个动作都讲究姿态优美而著称。新加坡印度舞蹈融合印度古典舞，使用创造性的表达形式，体现出新加坡多元文化主义的特色。^③新加坡印度高雅艺术协会培训舞者，并在实里尼维沙伯鲁玛兴都庙等进行表演。印度舞蹈在新加坡并非仅在印度族中流行，其也逐渐在华族和马来族中表演。许多印度舞蹈改编自马来西亚及中国的民间故事，如新加坡印度舞蹈编舞家巴斯卡先生将马来西亚民间传说《红山的故事》和中国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的《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改编成了卡塔卡里舞。印度舞蹈的推广有利于各族群间的理解和团结，近年来，新加坡印度艺术协会致力于印度舞蹈的传播与推广工作。婆罗多舞借助泰米尔语使曲调、表情和节奏相结合。

④多民族舞蹈。新加坡多民族舞蹈是指融合了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现代西方舞蹈的多元舞蹈表演形式。多民族舞蹈简称“CIMO”，意即“Chinese、

① 积极推广马来舞的马来团体除了希里瓦纳外，政府予以资助的团体有国家舞蹈团、人民协会舞蹈团，民间团体有马来青年文学协会 (Perkumpulan Seni Melayu)、观察组 (Pasukan Kawalan)、新精神 (Semangat Baru)，参见张跃、张琨《新加坡文化概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第 156 页。

② [新加坡] 蔡曙鹏：《社区在保护无形文化遗产中扮演的角色——以新加坡的马来舞为例》，周雪帆译，《贵州社会科学》2013 年第 7 期，第 34 页。

③ [新加坡] 蔡曙鹏：《舞蹈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新加坡的经验》，李修建译，《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1 年第 4 期，第 9 页。

Indian、Malay、Other”，这种舞蹈可以将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现代芭蕾的舞步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舞蹈。^① 多民族舞蹈可以取材于各族群的民间故事，也可以歌颂民族团结，反映新加坡多民族团结与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政府积极进行多民族舞蹈推广，编写了简单易学的多民族舞蹈曲目，并在本地传媒不间断播放。今天新加坡的多民族舞蹈已深入不同族群，成为民族团结的重要标志。

(2) 传统戏剧：华语戏剧、马来戏剧

①华语戏剧。新加坡华语戏剧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包括戏曲、话剧、歌舞剧、木偶戏、皮影戏、南音等多种表现形式。新加坡华语戏剧在新加坡华语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华语戏剧的主体形式是华语戏曲，多源于中国闽粤一带的方言剧种，包括高甲戏、粤剧、潮剧、闽剧、歌仔戏、梨园戏等。^② 早期新加坡华语戏剧与华人民间信仰紧密结合，主要出现在节庆活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华语戏剧在新加坡越来越具有承载、传承传统文化并增强民族认同的重任。华语戏剧是新加坡华人族群十分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 世纪 80 年代后，新加坡政府开始重视对华语戏剧的保护，通过资助各类文化社团等加大对华语戏剧的保护力度，如新加坡一些潮汕会馆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华语戏剧的保护与传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③

②马来戏剧。新加坡马来戏剧在 20 世纪初兴起，早期马来戏剧在剧本、服装和配乐方面都相对简单。马来戏剧的发展体现了新加坡多元民族融合的特点，马来戏剧最初是马来神剧，其后多改编自英语剧作，如《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马来戏剧使用的乐器早期仅有印度手风琴和小鼓，以后开始使用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方乐器。戏剧服装形式多种多样，有传统马来服装，还有印度式、现代样式的服装等。新加坡马来戏剧由专门的马来艺术协会剧团进行演出，其还曾表演改编自《雷雨》的作品。除了马来艺术协会剧团外，希里瓦纳也是马来戏剧的重要演出单位，其表演的作品在新加坡戏剧界具有重要影响。

① 张跃、张琨：《新加坡文化概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第 159 页。

② 康海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语戏曲的宗教背景》，《戏剧艺术》2013 年第 1 期，第 36 页。

③ 周宁：《东南亚华语戏剧研究：问题与领域》，《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第 59 页。

(3) 传统音乐：华语音乐（如东山歌册）、马来音乐

①华语音乐（如东山歌册）。新加坡华语音乐主要由华人移民引入，经过发展，传统的华语音乐如“东山歌册”表演形式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新加坡华语音乐是由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与新加坡当地文化融合衍变出的音乐表演形式，其作为新加坡华人的主要音乐表现形式，深受新加坡华人的欢迎。如“东山歌册”是新加坡传统华语音乐的一种，其历史久远，由广东移民引入。“东山歌册”旋律与语言声调结合密切，音域较窄，一般在六度以内，偶尔也有超过八度的；调式以羽调式为主，角调式与徵调式次之。“东山歌册”近年来已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团的关注。近年来，新加坡东山会馆通过青年人的传唱保护和海外交流的方式，对新加坡传统华语音乐的发扬光大发挥了有效作用。^①新加坡华人社会还有众多的华语音乐社团，如钟声音乐研究社、云庐音乐社、悠扬音乐研究社等，这些华语音乐社团对华语音乐的传承与保护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新加坡政府重视对华语音乐的保护，新加坡艺术学院专门开设华乐学科，新加坡人民协会还设立了人民协会华乐团。1996年，在人民协会华乐团基础上组建了新加坡华乐团，这使传统华语音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②马来音乐：阿斯利、浪迎、扎频、马斯里和久贾。新加坡马来音乐受异域文化影响较深，风格独特，其音乐表现形式具有多元色彩。新加坡马来音乐主要分为五种类型：阿斯利（Asli）、浪迎（Ronggeng）、扎频（Zapin）、马斯里（Masri）和久贾（Joget）。它们在节奏和影响上各不相同。马来音乐的配器相对简单，常用乐器是不同形式的鼓与锣，木管乐器通常为一种叫作肖姆管的双簧管，弦乐器一般为源于阿拉伯的具有两弦或三弦的弓形弹拨乐器。^②

(4) 民间诗歌：潮州歌谣、马来班顿

①潮州歌谣。潮州歌谣是大批潮州人移民到新加坡后，在日间工作之余，不断传唱朗诵的一种民间诗歌表演形式。潮州歌谣历史悠久，随着一代又一代潮州移民在新加坡落地深耕，这种歌谣也在不断演变与发展。在新加坡当地民间文人

① 朱少文：《新加坡东山会馆举行成立75周年庆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歌册”首次走出国门交流》，《联合早报》2013年12月2日。

② 张跃、张琨：《新加坡文化概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第156页。

的润饰后,其读来朗朗上口,在新加坡民间不断传承与发展。潮州歌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一方面,潮汕移民很早便运用他们熟悉的歌谣形式来倾诉他们的苦难;另一方面,保存了早期新加坡潮汕移民在异国垦殖饱受剥削压迫的真实记录。随着新加坡移民生活的变迁,潮州歌谣曾经濒临失传。幸而新加坡潮汕社团十分重视对潮州歌谣的保护,新加坡社会同心协力,使潮州歌谣的境地大大改善,这是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典案例。新加坡华语电台、报纸、书刊等都曾积极传播过潮州歌谣。1988年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出版了由马凤、洪潮合编的《潮州歌谣选》,1995年新加坡还发行了黄正经的《音译潮州儿歌撷萃》。1990年新加坡举行潮州儿歌演出会。潮州歌谣在新加坡得到传承,发挥了促进东西方文化交融贯通的作用。

②马来班顿。马来班顿(Pantun)是新加坡马来人的一种诗歌,不仅是新加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马来西亚的重要文化遗产。马来班顿通常由四行组成一首,所以也被称为马来四行诗,歌词多属抒情性质。马来班顿最初以口传方式流布于民间,据传在2000年前已开始流行。用文字书写的马来班顿可从16世纪成书的《马来纪年》里找到证据,书中收录了许多优美动听的马来班顿。马来班顿的押韵有严格的规定,四行马来班顿第一行与第三行的最后一个字音要同韵,第二行和第四行的最后一个字音也要同韵。对于六行马来班顿,一、四,二、五和三、六行的最后一个字音同韵。对于八行马来班顿,一、五,二、六,三、七和四、八行的最后一个字音同韵。现在新加坡的马来班顿仍在蓬勃发展,在其独特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在新加坡马来人的言谈中、宴会庆典上,或者歌唱、舞蹈和朗诵会上,都少不了马来班顿,如著名新加坡电视剧《小娘惹》中说,“峇峇(巴巴)和娘惹互唱班顿表达爱慕之情”^①。

3. 风俗礼仪类

(1) 婚姻习俗:华族婚俗、娘惹婚俗、马来族婚俗、印度族婚俗

①华族婚俗。新加坡华族婚俗既保留了部分纳采、迎亲、回门等华族民间传统,又吸收了诸如着西服、撒彩纸等西方婚礼习俗,是具有新加坡特色的“中西合璧”式婚礼习俗。纳采是新加坡华人结婚最重要的程序,即根据皇历选择

^① 王红:《东南亚各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6期,第52页。

吉日，在婚礼前一两周由男方把聘金和聘礼送到女方家。如果正式送聘礼，则男方一般会由一位长辈健在、子孙满堂、夫妻和睦的女性亲属陪同，俗称她为“全福之人”，这预示着新人未来的生活能如此美满幸福。订婚时，双方新人一般先交换戒指，接着祭祀祖先以示禀报喜讯，然后分赠亲友由写有“囍”字的红纸包裹的花生饼，也可以用蛋糕代替。迎亲时，新郎穿着西服或燕尾服，坐着扎着彩花的轿车，带着活鸡、猪肉、喜酒和水果，由媒人领到新娘家。新娘到新郎家之后须先拜祖先，然后进行“献茶”仪式，新人向长辈叩头献茶，这门婚事才算得到认可。

②娘惹婚俗。娘惹（Nyonya）婚俗为海峡华人或土生华人的习俗。娘惹是祖辈由中国华南地区迁徙至马来半岛，与当地通婚，经数百年发展，吸收马来语言和生活习惯而形成的一类族群。新加坡娘惹婚俗是既保留了华人传统习俗，又深受新加坡文化影响衍生出来的婚庆习俗。娘惹出嫁前通常会按照习俗亲手为夫家缝制珠鞋（Kasut Manek），珠鞋上的每颗珠子都是手工缝上去的，耗时很久，显得复古而高贵。所用的珠子为产自欧洲的切割珠（Manek Potong），造型立体而富有光泽。婚礼当天的午餐宴席是华巫传统结合的长桌宴（Tok Panjiang）^①。惹娘正式的全套婚礼会持续12天。“梳头礼”是其中重要的仪式，通常于大婚前一晚或当日仪式前，在新郎和新娘家分别举行。举行“梳头礼”仪式时，新人要坐在倒立的米斗（Gantang）上，米斗的开口端代表女性，封口端代表男性。给新人梳头的必须是女性长辈，边梳边说吉利的“上头歌”，祝福新人白头偕老、子孙满堂、婚姻美满。

③马来族婚俗。在新加坡马来族婚俗中，誓婚仪式（Akad nikah）和“并坐礼”是婚礼重要的两个组成环节。婚礼的司仪被称为“玛克·安达姆”^②，其负责婚礼相关事务。誓婚仪式代表婚姻被伊斯兰教法认可，是宗教意义上的仪式，由当地教区的教长主持。按照伊斯兰教法，誓婚仪式结束之后双方就是合法夫妻。“并坐礼”向世人昭示新郎与新娘已成婚，按照新加坡马来族婚俗，新婚夫妇只有在举行“并坐礼”之后才能住在一起。所谓“并坐礼”，是指新婚夫妇在

① “Tok”是福建方言，意为桌子，“Panjiang”是马来语，意为长，长桌宴寓意吉祥。

② [日]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编《走遍全球——新加坡》，罗玉泉译，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第232页。

公开宴请宾客的婚宴上盛装并坐高台，以接受宾客祝福并向宾客宣示两人结为夫妻。“并坐礼”是新加坡马来族婚礼的最后环节，也是整个婚礼的最高潮，“并坐礼”完毕，婚宴才能圆满结束。新加坡马来族婚礼一般为期 3 天，即从周五“主麻日”开始，到周日结束。

④印度族婚俗。新加坡印度族婚礼被称为“康亚丹”(Kanyadan)。婚礼开始前，新娘要用特制的宗教神油沐浴，用豆粉清洁皮肤，并在手脚画上鲜艳的图案。婚礼开始后，僧侣会在一个铁杯状的容器中点燃火种，夫妇两人围着圣火“净化”。然后，他们坐在事先准备好的席子上，新郎将象征婚姻黄色丝线挂在新娘脖子上后，众人便向新人抛黄色的米粒。黄色丝线上面系着金色的缀饰，一般被称为“芒加苏特拉”(Mangalsutra)或“他利”(Thali)。米粒代表繁荣，祝新人日后发达。亲友还会向新人赠送礼金或珠宝作为贺礼。礼金通常是吉利的单数，如 51 新元或 251 新元。^①

(2) 饮食习俗：各族群饮食习俗

新加坡各族群在饮食习俗上各有特色，相互包容。经过不断的发展，饮食习俗具有新加坡特色，已越来越受到新加坡国家遗产保护委员会的重视。已有新加坡有识之士表达了将新加坡各族饮食习俗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的愿望。

新加坡马来族吃饭时遵循一定的习俗规范，就餐时男子盘腿而坐，女子屈膝跪坐，吃饭时先用右手取食，用餐具将食物盛到盘子中，随后用手指取一点菜放在米饭上，将菜与饭捏成球状用大拇指送进嘴里。进食时不用手掌抓取食物，而用指尖捏取食物。马来族就餐时餐桌上会有一碟食盐作为调料，象征着宾主间的友谊天长地久。就餐完毕会用柠檬水洗净双手。

新加坡印度族习惯将主食、蔬菜、泡菜和调味酱放在天然的香蕉叶上，一般会用手吃饭，只使用右手，因为在印度族文化里，左手专门处理不洁之物。通常新加坡印度族会用食指、中指和拇指指尖抓饭，然后手指朝上，将饭放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以拇指指背推送入口。如果进餐时吮吸手指，则会被视为粗鲁的表现。

(3) 祭祀礼仪：春秋两祭仪式、万缘盛会议式

新加坡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非常盛行，主要包括祖先崇拜和罗摩崇拜等。这

^① 鲁虎编著《新加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 328 页。

些民间信仰主要通过各种祭祀仪式和表演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新加坡华人重视社群的凝聚力，每年的祭祀仪式隆重而庄严，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祭祀仪式逐渐成为新加坡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之一。^①另外，祭祀礼仪逐渐成为新加坡华人社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两祭仪式一般会先放置“龙牌”，书写龙牌可以使用红、黄、绿、蓝等多种颜色。龙牌也可以有不同种类，可分为甲、乙、丙、莲花座等，以不同种类组合方式进行祭祀，是新加坡华人祭祀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春秋两祭仪式一般在10点开始，由社团领袖担任主祭，仪式上会敲锣打鼓，伴有舞狮表演。

对于新加坡部分由广府、肇庆、惠州移民组成的社群来说，万缘盛会仪式是特殊的祭祀祖先的仪式。参与祭祀者常有万人以上，乃结万人缘之意，“使孝子贤孙心有所安”^②，故称“万缘盛会”。万缘盛会仪式自1921年开始举办，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万缘盛会仪式通常持续三天四夜，先进行“树幡”仪式，然后正式进行“超度”仪式。仪式上会设立僧、道、尼三坛，祭祀超度广惠肇三属社群祖先，这体现了新加坡广惠肇三属社群的团结意识。其间还会进行民间艺术表演，举行游行活动。

4. 节庆活动类：传统民族节会、宗教节会

新加坡节庆活动众多，能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的主要是传统民族节会、宗教节会等传统民间节庆活动。^③

新加坡桑格拉提节（Sankaranthi）又称泰米尔丰收节，每年从1月13日至16日连续庆祝四天。每天的庆祝活动的含义都不相同。第一天叫“Bhogi Pongal”，主要是为了祭拜雷神因帝拉（Indra），在这一天，新加坡印度族人不用忙于农事，一家人一起大扫除。第二天叫“Pongal”，主要祭拜太阳神苏利亚（Surya）。第三天叫“Mattu Pongal”，是供奉神牛的日子，感谢公牛耕种土地。第四天叫“Kanum Pongal”，这天早晨，人们会在庭院中集合，向太阳神供奉米粥和甘蔗，祈祷家庭

① 曾玲：《新加坡华人的龙牌崇拜初探——兼与祖先崇拜比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39页。

② 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第168页。

③ 参见新加坡旅游局网站，<http://www.yoursingapore.com/content/traveller>。

兴旺发达。今天的桑格拉提节更多的是为了增强日益淡化的族群凝聚力。

新加坡大宝森节 (Thaipusam) 是为了纪念战胜邪恶并赋予人们以美德与力量的苏布拉马亚神 (Lord Subrahmanya), 时间在 1~2 月。在新加坡大宝森节期间, 人们游行, 一般从新加坡斯里尼瓦沙柏鲁马印度庙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 出发步行至丹达乌他帕尼印度庙 (Thandayuthapani Temple)。节日期间会举行传统仪式, 祭拜神灵, 新加坡各族群也会在节日当天到寺庙还愿。

其他重要的节庆活动还有屠妖节 (Deeppavali 或 Diwali)、中元节 (Hungry Ghost Festival)、蹈火节 (Theemidhi)、哈芝节 (Hari Raya Haji) 等。

5. 传统手工技艺类

新加坡饮食制作技艺或其他传统民俗工艺是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宝库,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新加坡饮食文化是华族、马来族、印度族饮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借鉴的结果。有些菜肴可能源自中国、印度, 但经过新加坡人的创新, 不再是原来的中国菜或印度菜, 而变成了具有新加坡文化特色的菜肴。许多制作技艺能够经过几代人传承与创新, 有的来自中国的菜肴在制作中融入了马来风格, 表现出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特色。较为著名的新加坡饮食制作技艺有新加坡长茶技艺 (Stretched Tea)、娘惹菜制作技艺 (Nyonya)、肉骨茶制作技艺 (Bak-Kut-The)、罗提抛饼制作技艺 (Roti)、海南鸡饭制作技艺 (Hainanese Chicken Rice)、炒粿条制作技艺 (Char Kway Teow)、华人婚嫁礼饼制作技艺等。

三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新加坡政府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孕育了更强烈的历史想象以及更深层次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与欣赏。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重要的象征, 可以帮助新加坡人重拾过去, 并在寻找国家认同上发挥关键的作用。

(一)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

1.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 塑造国家认同, 构建新加坡民族文化

在新加坡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 社会文化高度异质化, 各族群保持各自文化

特性，泾渭分明，缺乏国家认同感。为此，新加坡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在国家层面推行多元主义一体化政策，塑造国家认同，消除种族隔阂，增强民族凝聚力。新加坡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成立了国家遗产保护委员会，其指导思想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塑造超越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增强国民自信心，建立国民意识，增强文化向心力，构建多元一体的新加坡民族文化。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国家和人民都非常重要，它塑造国家认同感，帮助人民面对和适应改变带来的冲击。新加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民的集体记忆汇集而成的国家故事，它属于每个国民，因此，人人都能做出贡献。”^①

2.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方针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方针是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引导民众积极参与，增强民众的自豪感。特别是教育新加坡年轻一代，使其崇本思源，从而增强其对文化根源的识别能力以及理解现实文化环境的能力。新加坡政府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仅靠政府推动，应调动民众广泛参与的积极性，促使公众意识觉醒，真正使民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这样才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运作模式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运作模式主要是由政府主导设立的，但运作机制相对灵活，大多由民间组织负责，其资金来源广泛，基金会、社群组织、宗教团体等机构予以财力支持。新加坡政府是主要发起者，同时起到协调、监督作用，通过各个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施加影响，动员民众真正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新加坡国家层面设有国家遗产保护委员会，该机构为政府主导设立的非营利性法定机构，机构运作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但同时其也接受各类族群社团组织、宗教组织的资金资助。国家遗产保护委员会下设执行机构遗产保护中心（Heritage Conservation Centre），其具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与管理工作。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相继设立了马来遗产中心（Malay Heritage Centre）、印

^① 转引自丁松《新加坡鼓励公众参与遗产保护》，《中国文化报》2013年7月25日。

度遗产中心 (Indian Heritage Centre) 和欧亚遗产中心 (Eurasian Heritage Centre) 等机构。

政府除了在国家层面设立统一机构统筹协调外, 也通过倡议设立一些地方民间机构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社区的传承和普及, 如人民协会和希里瓦纳。^① 这些机构通过各个层面的推进从而形成合力,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二)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措施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 新加坡政府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效显著。这些措施包括政府层面的法律与资金支持、民众层面的观念与意识增强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关心和保护等。我国早已意识到相关问题, 并采取类似的措施予以应对。本文主要总结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值得借鉴的有效措施, 并总结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经验。

1. 设立国家机构,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管理

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国家统一机构, 避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出现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的状况。新加坡政府于 1993 年合并了原来分散于文化部、青年部、社区部等机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能机构, 设立国家级机构——国家遗产保护委员会, 由其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这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执行机构遗产保护中心已进行了多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力求掌握第一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涵盖表演艺术、民间传统制作工艺、礼仪习俗文化、节庆文化等不同领域。遗产保护中心将国家投入的资金全部直接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遗产保护中心拥有独立的文化艺术展示中心, 用

^① 人民协会成立于 1960 年, 下辖 2000 多个基层组织, 分布在新加坡 84 个选区。人民协会是新加坡进行社区自治管理的有效组织。人民协会于 1968 年成立了人民协会艺术团体, 其主要传承新加坡各族群的舞蹈、音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艺术。希里瓦纳现已成为新加坡最有影响力的马来文化组织。希里瓦纳对马来舞、马来音乐、马来戏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艺术的保护卓有成效。

图像、实物等相结合的形式向国民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中心定期开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班及讲座，向热爱文化艺术的年轻人传播相关手工技艺。新加坡政府于2008年推出“文化遗产事业援助计划”（Heritage Industry Incentive Programme），金额高达800万新元，总共为140余个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提供资助，并于2013年拨出500万新元推出为期四年的“文化遗产资助津贴计划”（Heritage Grant Scheme），进一步帮助个人与团体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①，同时通过增加和扩大民间传承人的数量与活动范围，推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和培育。

遗产保护中心通过有效筹措资金，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的培养与科学研究力度，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校与社区的推广与普及，建设科研人员、管理人员、民间艺人队伍，为有效、持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基础。另外，新加坡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品牌效应，如新加坡邮政部门组织设计、发行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材的邮票，新加坡艺术节展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创意产品等。在国际交流层面，遗产保护中心定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2. 设立文化节会，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机会

新加坡政府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应仅限于对非遗项目进行资金投入与进行相关项目立项，还应给予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的展示平台，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入民间，走入大众，走入生活，与民众充分接触，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再停留于国家重视层面，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更多机会得到传承与发扬。

新加坡在国家层面设立了新加坡文化遗产节（Singapore Heritage Festival）、新加坡艺术节（Singapore Arts Festival）和新加坡艺术周（Singapore Art Week）等文化平台，通过文化节会的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深入人心。新加坡文化遗产节于2004年首次举办，规模与参加人数每年都在不断扩大与增加，至今参与者已有一百万名。据新加坡国家文化遗产中心统计，新加坡文化遗产节已获得越来越多民间团体的支持，民众有意愿为新加坡文化遗产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

^① 陈能端：《不只留住回忆》，《联合早报》2013年7月27日。

2012 年仅有 1 个社团参加新加坡文化遗产节,到了 2013 年,增至 9 个团体,2014 年增至 13 个团体^①,2016 年第 13 届新加坡文化遗产节,吸引了 120 多个社团参与^②。新加坡政府通过举办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活动等,鼓励普通民众探索本地渐被遗忘或者鲜为人知的非遗技艺。通过新加坡文化遗产节这个平台,不同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得到展示,人们可现场观看艺术表演,也能现场学习传统技艺。新加坡文化遗产节这个平台给不同社团、会馆、学校、文化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新加坡文化遗产节举办期间,新加坡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路线,许多涉及传统非遗技艺的摊位也被纳入。普通居民可以根据路线寻访非遗传承人,了解传统非遗技艺,进一步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这增强了新加坡民众对自身文化的归属感。

新加坡艺术节则是另一个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的良好平台。新加坡艺术节一般为期一个月,艺术形式包括美术、工艺、戏剧、音乐、舞蹈等。新加坡艺术节虽然并不单独为非遗项目提供平台,但新加坡希里瓦纳、人民协会、地方会馆等艺术团体可借此平台展演富有特色的舞蹈、戏剧等,使民众近距离接触与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新加坡艺术节除了展演外,还设立为期三周的大众学堂(Open Academy),让普通民众与艺术家有直接交流与接触的机会。举办新加坡艺术节,对于增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是大有裨益的。

文化节会平台还包括节日的庙会、传统庆典仪式等。借助文化节会的展示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走出历史名册,形成品牌效应,这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与新加坡相比,我国还没有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平台,许多民众对非遗保护的认识仍停留在非遗保护名单上。

3. 设立民间组织,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影响力

新加坡政府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有真正走入民间,增强非遗项目在社区的影响力,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聚合力量,才能有效提高非物

① 王舒杨:《11 年来数目最多,13 社团参加新加坡文化遗产节》,《联合早报》2014 年 7 月 14 日。

② 黄靖晶:《新加坡文化遗产节,一道细赏我们的家园》,《联合早报》2016 年 4 月 21 日。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新加坡政府通过设立马来遗产中心、印度遗产中心等国家级民间组织以及致力于进行社区推广的人民协会、希里瓦纳等地方性民间组织，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区参与面扩大，使新加坡居民自发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开发中。这些民间组织虽然由官方推动设立，但其资金主要来自基金会、社团、宗教组织，其运作模式也非政府机构运作模式，而多半具有公司形态。这样一来，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大大提高，不受政府机制的束缚，其走入社区进行推广的意愿更强烈，如马来遗产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马来遗产基金会和马来社群组织，其运行机制比政府机构更为灵活、有效。

正如新加坡戏曲学院院长蔡曙鹏所言，“如果社区认识到其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种艺术形式将得到蓬勃发展。组织机构的支持是有帮助的，并将为从业者提供更多的资源，但最终是社区发挥的力量最重要”^①。通过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影响力，不同族群加深了对不同文化遗产的认识，这有利于提高人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水平，也有利于多元族群的理解与融合。舞蹈、民族音乐等艺术表演类非遗项目，其他传统手工艺、节庆文化也需要走入社区，最大限度提升民众的积极性，以使民族文化认同感进一步增强。

四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经验

从以上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中可以看出，新加坡根据国家特性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注重各个族群社团的沟通融合

新加坡种族构成复杂，各个族群与各个社团构成国家的根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必然涉及不同族群及不同宗教团体的利益。对不同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投入多少资金，或是在让一个族群学习另一个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

^① [新加坡] 蔡曙鹏：《社区在保护无形文化遗产中扮演的角色——以新加坡的马来舞为例》，周雪帆译，《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34页。

时, 该如何维护各个族群的平等利益, 是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问题。虽然新加坡华族人数较多, 但新加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并没有偏向华族, 也没有偏向其他族群, 而是充分贯彻各族群平等的观念, 特别注意各个族群的沟通融合, 破除单一族群的狭隘观念。

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大力支持下, 新加坡马来遗产中心和印度遗产中心分别成立, 李显龙还亲自为两个中心的成立揭幕^①。新加坡政府认识到, 族群问题十分复杂, 处理不好就会造成不同族群之间出现嫌隙。特别是近年来, 新加坡政府重视让各族群青年加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②, 使青年人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代表各个族群的历史文化价值, 而且能唤起人们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以珍惜新加坡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新加坡各族群节庆文化活动众多, 政府在支持各族群节庆文化活动的同时, 进行积极沟通与协调, 使新加坡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及其他族群在节庆日活动方面平等。印度族人口虽然很少, 却获得了与华族同样的法定节庆天数。新加坡政府鼓励各族群学习不同族群的舞蹈, 但不强制, 通过加强沟通, 鼓励马来族学习华族舞蹈, 印度族学习马来舞蹈, 华族学习印度舞蹈, 鼓励编舞者选用非本族群的题材进行创作, 进而鼓励不同族群学习融合不同风格的舞蹈, 从而衍生出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多民族舞蹈。

(二) 注重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协作

新加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特别重视公众的认知和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协作。20 世纪 80 年代后, 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单靠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不够的, 公众的意识觉醒和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协作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为有效。新加坡政府充分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官方机构、社群组织、文化团体、媒体及个人的力量, 积极营造整个社会一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十分关键的。正如上文对马来舞蹈的

^① 参见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Officiated the Launch of the Much-anticipated Indian Heritage Centre (IHC), Which Opens to the Public on May 8, on Thursday Evening, <http://malayheritage.org.sg/en>。

^② 参见 Channel News Asia-Build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Heritage,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Arts a Key Focus for MCCY, <https://www.gov.sg/news>。

保护案例，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载体，只有各种社会力量在社区投射，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入人们的生活。如果单靠政府亲力亲为，则显然无法增强普通民众的保护意识。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言：“我希望更多新加坡人挺身而出，为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出自己的构想和计划，从被动的受众变成积极的创造者与参与者。”^①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在于民众自身，让民众积极参与，除了靠官方机构外，还要靠各类民间组织、媒体等广泛参与。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特别注意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协作，通过调动各种有利因素形成合力，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民众之所急，而非仅政府之所急。政府的角色虽然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仅起到协调沟通的作用，调动社会力量特别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十分重要。新加坡社群团体组织规模庞大，其更能调动起民众的参与积极性。当然只有民众参与进来，具有广泛的民众普及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才能真正实现“不再遥不可及”。

（三）注意对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

新加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十分注意对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新加坡政府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性，因此注重通过多种技术手段保存资料，留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方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久流传。现代技术能更好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民众近距离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具生动性，得到民众的喜爱。遗产保护中心、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近年来通过笔录、摄影、录音、录像等多种形式和技术记录民间传承人和相关人员的口述和表演，特别留意搜寻民间传抄的唱本、歌本、经书、图画册等，以及各种报刊、社团组织的文献资料和相关实物。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部门认识到方法技术的创新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如通过数字化技术，将一些涉及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档案，如书、手稿、地图和乐谱等，转化成电子文本格式进行保存。

^① 转引自丁松《新加坡鼓励公众参与遗产保护》，《中国文化报》2013年7月25日。

这种方式有利于完整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资料,同时感兴趣的普通民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遗产保护中心已尝试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档案转化工作促进国际交流,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东南亚国家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研究的机构和个人能阅读和利用与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历史资料。

五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我国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研究的目的在于借鉴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经验,并结合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实际情况,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定启示。正如上文所言,有效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对于增强国民的文化认同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加坡是东南亚小国,但其又是文化大国,各族群及其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传统艺术、风俗习惯、节庆活动等在此交集荟萃,呈现五彩缤纷的美丽景象。新加坡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华人国家,同时又是重要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研究新加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与经验对于我国有实际价值。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投入了大量人力与物力。抢救与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任重道远,只有坚持采取科学的措施,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才能使中国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增强我国文化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人们对中华民族宝贵文化的珍重和关切,这种认识水平上的提高和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是强有力的支撑。文化利益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之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只有修好中华文化这座长城,中华民族璀璨的文明才能绵延不绝。

关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应采取的措施,许多专家学者已

发表了大量富有成效的见解^①，本文在研究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经验时也已提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注意的地方，以下主要结合中新两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谈几点启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重立项、轻管理

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重立项、轻管理的现象。一个典型现象是由于近些年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日趋重视，各地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部分地区之间由于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重叠，出现申遗“扎堆”现象。有些地区为了申报成功而明争暗斗，大打“口水仗”，某些地区之间甚至抢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争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做法有悖文化制造和谐的本义。况且，一些地方争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更好地保护文化资源，而是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获得经济利益。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启示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在于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名声，不在于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立项来获得社会资金，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民众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普及与推广；通过时间的积累，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大众关注，不再处于濒危境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与新加坡不同，不立项就无法获得资金与资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进一步加强立项过程审查，在立项后加强过程管理，建立管理不善问责机制，真正杜绝重立项、轻管理的现象。对于资金的下发，应慎之又慎，以防资金未被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进一步重视管理规范。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重开发、轻保护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地方历史的见证和独特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生命力和创造力。近年来，

^① 关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可参见马晓燕《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综述》，《民间文化论坛》2009年第2期；陈炜、陈能幸《近十年来中国西部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述评》，《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王鹤云、高绍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部分地区热衷于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商业开发,着力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潜在商业价值,以开发创意产业和塑造旅游文化品牌之名行过度商业开发之实,这种现象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造成本末倒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抢注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典型表现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被不当利用、过度开发,把非遗当成“摇钱树”,而不进行保护。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的经验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不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旅游产业,而应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入社区,走入民众中间,有些传统技艺可以适时走入学校,开设群众喜闻乐见的讲座,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民众近距离接触。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挂钩,则显然背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应通过商业开发获得资金,而应靠政府、社区、民间社团、公益组织、媒体及非遗传承人的共同努力。另外,应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资金补助的方式,应采取措施杜绝单独个体直接获得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利益。在此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新加坡的做法是通常不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个人发补助金,而是把补助金发给社群组织或民间社团,让其自行管理,这样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为公平有效。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重个体、轻整体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存在一种现象,即重个体、轻整体。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由于缺乏战略性整体规划,特别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行其是,适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国家层面还缺乏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构,虽然从国家到地方都十分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由于缺乏整体性规划,出现争抢同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局面。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是整体性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保护单一的项目。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面对这些宝贵的文化传统,我们不能以保护个别具体的文化事项来代替对优秀文化遗产整体的关注和保护。因此我们应该在全民范围内增强对整体性文化的保护意识,只要

是能体现人类在特定时空内的活动及其创造力的文化形态，都应该给予关注，认真研究和加强保护。如果不能从整体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关注并进行综合保护，仅仅以个别“代表作”的形式对已经认证的文化内容进行“圈护”，就可能在保护个别文化内容的同时，漠视、忽略、遗弃或者伤害更多未被“圈护”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仅停留在保护一个个“文化碎片”或者“文化孤岛”上。

新加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启示表明，坚持整体性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新加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保护华族或者马来族的遗产，而且是保护整个新加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进行整体性保护，才能使国民形成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认识和规划，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民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有实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责任编辑:王 诚 姜 颖)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Singapor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Liu Chen

Abstract: Singapore is a small country in Southeast Asia with an area of only over 700 square kilometers. Singapore is also a big cultural country.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cultural traditions, religious beliefs, traditional arts, customs, festivals and other activities meet here to present a colorful and beautiful scen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status quo of Singapor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focuses on the strategic principle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operating model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o as to summarize the effectiv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provide usefu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combines the curr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China. When protec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ingapore mai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second, th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of various social forces; third,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multiple technical means. The measures taken by Singapore not only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enhance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hesion of its citizen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measures and experie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Singapor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r China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establish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better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excellen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Singapor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lticultu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丝路沿线佉卢文铭文钱币考述^{*}

杨富学 袁 炜

【摘 要】佉卢文铭文钱币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产生，基本终止于公元2世纪初，最终终止于公元3世纪末。其流布地域包含西北印度、巴克特里亚以及塔里木盆地。其铸行者包含希腊人、塞种人、帕提亚人、印度人、贵霜人和于阗人。其对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佉卢文 钱币 铭文

【作者简介】杨富学，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袁炜，贵州省博物馆馆员。

佉卢文源自西亚地区的阿拉美文，公元前5世纪，随着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对西北印度的征服，阿拉美文逐渐在巴克特里亚和西北印度流行。近些年，在阿富汗收集和刊布了48件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和希腊统治交界时期的阿拉美文文书，这些文书包含税收、贸易、宗教、商品等内容。^①在阿富汗东部靠近贾拉拉巴德的格拉曼谷地发现的两处孔雀王朝第三任君主阿育王在位第16年和第17年的石刻铭文，也采用阿拉美文。^②其逐渐演变为佉卢文，即在阿拉美文的22个辅音的基础上，扩充为5个元音、近30个辅音的文字，其流行于犍陀罗。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A198）的研究成果。

① J. Naveh, Sh. Shaked, *Aramaic Documents from Ancient Bactria (Fourth Century BCE.) from the Khalili Collections* (London: The Khalili Family Trust, 2012), pp. 15 - 60.

② Harry Falk, "The Creation and Spread of Scripts in Ancient India," in Anne Kolb, ed., *Literacy in Ancient Everyday Life* (Berlin: De Gruyter, 2018), pp. 49 - 50.

现存最早的佉卢文铭文见于阿育王石柱。阿育王在印度各地凿刻石柱, 宣扬“正法”。其中遍布于印度各地的石柱上的铭文采用婆罗米文, 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的石柱上的铭文采用阿拉美文和希腊文, 阿富汗格拉曼和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地区的石柱上的铭文采用阿拉美文, 只有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的石柱上的两处铭文采用佉卢文。这说明在公元前 3 世纪中叶佉卢文流行的区域仅是犍陀罗的核心地区白沙瓦,^① 说明当时的印度、中亚统治者选择用不同的语言文字统治具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为佛教宣称的第一位护教法王, 阿育王宣扬的“正法”思想包含大量佛教思想。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至贵霜王朝时期, 在犍陀罗地区, 佛教兴盛。^② 因此, 佉卢文在很大程度上与佛教相关联。由于受贵霜文化的影响, 佉卢文一度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鄯善国时期非常流行。就现有的材料来看, 佉卢文的流行时间在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4 ~ 5 世纪。^③

一 印度—希腊钱币上的佉卢文

将佉卢文用于钱币铭文出现在公元前 2 世纪上半叶。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前 190 年, 德米特里 (Demetrios) 开始发行其戴象头帽头像的钱币, 这可能象征其趁孔雀王朝崩溃时征服印度部分地区 (见图 1)。公元前 190 年至公元前 180 年在位的阿加托克利斯 (Agathocles) 和公元前 190 年至公元前 185 年在位的潘达雷昂 (Pantaleon) 的统治区横跨巴克特里亚南北, 延伸至塔克西拉的印度河流域。他们开始发行希腊文—婆罗米文双语钱币,^④ 且模仿印度印记银币样式, 铸造方形银币。其中潘达雷昂钱币正面为君主头像, 铭文为婆罗米文 Rajane Pantalevasa (王潘达雷昂), 背面为站狮像, 铭文为希腊文 ΒΑΣΙΛΕΩΣ ΠΑΝΤΑΛΕΟΝΤΟΣ (王潘达雷昂) (见图 2)。阿加托克利斯钱币是双语钱币,

①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 文物出版社, 1988, 第 7、11 页。

② 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第 43~49 页。

③ Sten Konow, *Kharoshṭī Inscriptions,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 Part I*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91), p. 13.

④ M. Alram, “Münzprägung in Baktrien und Soudien-von den graeco-baktrischen Königen bis zu den Kuschan,” in S. Hansen et al., eds., *Alexander der Grosse und die Öffnung der Welt-Asiens Kulturen in Wandel* (Regensburg: Schnell & Steiner Gmb H., 2009), pp. 183 - 185.

与之类似。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加托克利斯钱币上，除了君主姓名和王号以外，开始出现 ΘΕΟΥ (神圣的)、ΝΙΚΗΦΟΡΟΥ (胜利者)、Jayadharasa (胜利者) 等赞语并沿用下去 (见图3)。^①



图1 德米特里钱币

资料来源: O. Bope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mhout: Brepols, 1998), pl. 33, fig. 36。



图2 潘达雷昂钱币

资料来源: O. Bope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mhout: Brepols, 1998), pl. 35, fig. 57。

公元前180年至公元前160年在位的阿波罗多托斯一世 (Apollodotus) 首次发行了一面为希腊文铭文 ΒΑΣΙΛΕΩΣ ΑΠΟΛΛΟΔΟΤΟΥ ΣΩΤΗΡΟΣ (王阿

^① 李铁生编著《古中亚币 (前伊斯兰王朝)》，北京出版社，2008，第54~58页。

波罗多托斯 救世主), 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 *Maharajasa Apaladatasā Tradarasa* (王 阿波罗多托斯 救世主) 的双语钱币, 这也是第一种有佉卢文铭文的钱币 (见图 4)。此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阿波罗多托斯一世双语钱币上开始出现 *Tradarasa/ΣΩΤΗΡΟΣ* (救世主) 一词, 此后的中亚地区的钱币铭文中经常出现这一词语, 直到贵霜王朝。公元前后, 中亚地区的钱币铭文使用“救世主”一词, 这与当时欧亚大陆宗教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宗教角度来看, 当时的琐罗亚斯德教琐什扬斯、婆罗门教毗湿奴、犹太教弥赛亚、基督教耶稣、佛教弥勒无不宣扬救世的思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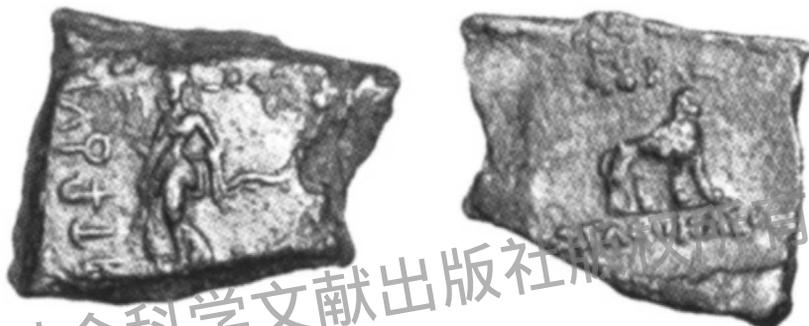


图 3 阿加托克利斯钱币

资料来源: O. Bope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l. 35, fig. 54。

公元前 160 年至公元前 155 年在位的安提玛科斯二世 (Antimachus II) 发行的钱币一面为希腊文铭文 *ΒΑΣΙΛΕΩΣ ΝΙΚΗΦΟΡΟΥ ΑΝΤΙΜΑΧΟΥ* (王 胜利的 安提玛科斯) 及希腊胜利女神尼姬 (Nike) 像; 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 *Maharajasa jayadharasa Aṃtimakasa*^② (王 胜利的 安提玛科斯) 及君主骑马像, 可见此处的佉卢文 *jayadharasa* (胜利的) 其实代表希腊胜利女神尼姬 (见图 5)。^③ 在这一阶段的印度—希腊双语钱币上, 佉卢文是希腊文的准确对译。在 19 世纪, 欧洲学者正是根据印度—希腊双语钱币上希腊君主的希腊文姓名确定佉卢文字母

① 普慧:《琐罗亚斯德教及其救世主: 琐什扬斯》,《世界宗教文化》2016 年第 6 期, 第 60 页。

② 此处铭文大小写按照西文习惯表示, 即句首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人名等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所以, 此处中间词语的第一个字母没有大写, 下同。

③ [意] 朱莉阿诺:《西北印度地区希腊至前贵霜时代的钱币》,载 [意] 卡列宁、菲利真齐、奥里威利编著《犍陀罗艺术探源》,魏正中、王倩编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 59~61 页。

的音值，从而进一步释读出佉卢文。^①

公元前 170 年至公元前 145 年在位的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是最后一位统治横跨兴都库什山南北地域的希腊君主，其发行的钱币一面为希腊文铭文 ΒΑΣΙΛΕΩΣ ΜΕΓΑΛΟΥ ΕΥΚΡΑΤΙΔΟΥ（王 伟大的 欧克拉提德）；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 Maharajasa Evukratidasa（王 欧克拉提德），这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希腊文铭文一面与佉卢文铭文一面并不完全对译的钱币（见图 6）。



图 4 阿波罗多托斯一世钱币

资料来源：O. Bopp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l. 36, fig. 64。



图 5 安提玛科斯二世钱币

资料来源：O. Bopp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l. 36, fig. 70。

①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文物出版社，1988，第 4 页。



图 6 欧克拉提德钱币

资料来源: O. Bope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l. 37, fig. 86。

作为佛教宣称的第二位护教法王, 希腊君主米南德 (Menander) 在希腊历史文献、佛教典籍中均“留有事迹”。北传佛教文献《那先比丘经》和南传佛教文献《弥兰陀王问经》记载了米南德与那先比丘进行宗教对话及思辨的内容。古希腊地理学者斯特拉博在《地理学》中指出,“(巴克特里亚希腊君主) 征服的部落比亚历山大更多, 特别是米南德所征服的部落更多 (如果这是真的, 他起码渡过海帕尼斯河, 向东一直前进到了伊马乌斯山脉), 因为有些是他自己征服的, 有些是巴克特里亚国王欧西德莫斯之子德米特里征服的。他们不仅占领了帕塔雷纳, 还有沿岸的其他地区, 其中包括所谓的萨劳斯图斯和西格尔迪斯王国”。^① 在出土文献方面, 1979 年, 在距印度中部马图拉东南 350 公里, 位于恒河流域的贾木纳河右岸的 Reh 处发现的巴利文碑铭中有米南德的名字及其称号。^② 由此可见, 米南德的统治范围囊括了整个西北印度, 并且其一度征服了恒河流域。米南德发行的钱币均为希腊文、佉卢文双语钱币, 其钱币一面为希腊文铭文 ΒΑΣΙΛΕΩΣ ΣΩΤΗΡΟΣ ΜΕΝΑΝΔΡΟΥ (王 救世主 米南德); 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 Maharajasa tratarasa Menandra (王 救世主 米南德) (见图 7)。有观点认为, 米南德钱币上出现的法轮标识表明米南德为了在钱币上突出佛教的地位。^③

① [古希腊] 斯特拉博:《地理学》, 李铁匠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第 768 页。

②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Vol. IV (London: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2006), p. 14.

③ 杨巨平:《弥兰王还是米南德?——〈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化历史信息考》,《世界历史》2016 年第 5 期, 第 120 ~ 122 页。

但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哈拉帕出土的印度河文明印章中，就有六辐轮形符号。在比佛陀出现的更早的时代，人们就将征服天下的王称为“转轮圣王”。阿育王时期的石刻出现了法轮的形象，桑奇、巴尔胡特佛塔上也均出现了法轮的形象，此后，法轮进一步与佛教相结合，^① 故有必要对米南德钱币上法轮形象的象征意义（代表其征服天下还是对佛教的信仰）进行深入探讨。



图7 米南德钱币

资料来源：O. Bope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l. 38, fig. 103。

米南德死后，印度—希腊分裂，在塞种人入侵之前的50年左右，发行钱币的希腊君主就有十余位。他们发行的钱币的铭文中希腊文、佉卢文变化不大，但有一个称号值得注意，即 ΔΙΚΑΙΟΥ/dhramikasa。^② 在佛教文献中，dhramikasa 被音译为“达摩”，意为“法”，代表佛教正法。dhramikasa 在印度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此词词根为 dhri'，最早出现在《梨俱吠陀》中，最早的意思为“支持”“支撑”“维持”“事物的固有秩序”等。此后词义逐渐演化加深，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 Shāhbāzgarhi 阿育王石柱上，出现了佉卢文 dhraṃma-ma [ha] ma [tra]^③ 一词，意为“主管公正的高级专员”，“公正”是独立于成文法和习惯法，并被法律和正义所依据的原则。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成文的

① 李雯雯：《中印“初说法”图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第34~43页。

② O. Bope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p. 230-251.

③ 此处出现“[]”是由于石柱上的铭文不清楚，学者根据铭文上下文进行补充。

《摩奴法论》中，“达摩”一词已经包含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含义。综合而言，“达摩”有以下几种内涵：一是指事物的本质，二是指道德伦理，三是指法律中的行为规范，四是代指宗教。其中第四点除了代指佛教外，还代指当时流行于印度的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信徒将自身宗教称为 Arya dharma、Sanatana dharma、Vedic dharma 等。^① 可见，印度—希腊的希腊君主在钱币上使用佉卢文 dhramikasa 一词，表明这些希腊君主对印度文化的认同，但无法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认为这些希腊君主信奉佛教。

二 印度—塞克、印度—帕提亚钱币上的佉卢文

约公元前 140 年，塞种人入侵巴克特里亚。约公元前 130 年，被匈奴西逐的月氏占据巴克特里亚。《汉书·西域传》记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② 据研究，从公元前 125 年至公元前 100 年，塞种人的君主毛乌斯 (Maues) 建立印度—塞克 (简称印塞) 王国。大约在公元前 87 年之前不久，乌头劳 [我们将其比定为印塞王国君主阿波罗多托斯二世 (Apollodotus II)] 继任罽宾王 (印塞国王)，与西汉通使，但经常劫杀西汉使臣。乌头劳死后，其子狄俄尼索斯 (Dionysus) 继位，但不久便被西汉使臣文忠和希腊王子阴末赴 [我们将其比定为后印度—希腊王国君主赫帕斯特拉托斯 (Hippostratus)] 合谋攻杀，印塞王国之王位为后印度—希腊王国阴末赴取代。公元前 49 年之后，阴末赴与西汉交恶，其位又被塞种人阿则斯 (Azes) 夺回，印塞王国恢复。^③ 学界传统上认为有两位阿则斯，但近 20 年有钱币学者提出仅有一位阿则斯。除阿则斯外，印塞王国君主还有阿则里西斯 (Azilises)、沃洛奈斯 (Vonones)、斯帕拉霍雷斯 (Spalahores)、斯帕拉雷西斯 (Spalarises) 等。

作为第一位印度—塞克国王，毛乌斯发行的钱币铭文沿用印度—希腊钱币上的希腊文与佉卢文，其中希腊文铭文为 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 ΜΕΓΑΛΟΥ

① 朱明忠：《达摩——印度文化的核心概念》，《南亚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71~74 页。

②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中华书局，1964，第 3884 页。

③ 杨富学、袁炜：《从钱币资料看印塞王国与后印希王国对罽宾统治的交替》，《中国钱币》2018 年第 1 期，第 65~70 页。

MAYOY (王中之王 伟大的 毛乌斯), 佉卢文铭文为 Rajadirajasa Mahatasa Moasa (王中之王 伟大的 毛乌斯) (见图 8), 关于印度—希腊、印度—塞克君主使用“王中之王”这一称号, 我们另文撰述, 在此不多言。有钱币学者认为毛乌斯与希腊公主 Machene 联姻, 并发行铸有两人肖像的钱币。^① 而阿特米多鲁斯 (Artemidoros) 发行的一种双语钱币, 一面为希腊文铭文 ΒΑΣΙΛΕΩΣ ΑΝΙΚΗΤΟΥ ΑΡΤΕΜΙΔΩΡΟΥ (王 无敌的 阿特米多鲁斯), 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 Rajatirajasa Moasa putrasa ca Artemidorasa (王中之王 毛乌斯 儿子 阿特米多鲁斯)。^② 前文已指出, 早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之时, 就用不同的文字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宣扬政治主张。那么在此处, 我们可以认为, 发行此钱币的阿特米多鲁斯, 面向说希腊语的希腊人, 宣扬其自身为“王”; 面向说犍陀罗语的西北印度地区民众, 乃至入侵此地的塞种人, 宣扬其自身为塞种人君主王中之王毛乌斯的儿子。至于阿特米多鲁斯是否为毛乌斯的亲生儿子这一问题, 是因其仰慕希腊文化, 取了一个希腊名字, 还是因其本身即希腊人, 被毛乌斯收为养子, 对此问题的解答有待对今后出土的文物的发现和研究所。但对于阿波罗多托斯二世 (乌头劳), 根据其发行的钱币和《汉书·西域传》中的相关记载, 可以认定其为取有希腊名字的塞种人。

阿则斯在恢复印塞王国后, 发行的钱币的铭文与之前相比, 没有太多变化。但到沃洛奈斯、斯帕拉霍雷斯、斯帕拉雷西斯执政时, 他们发行的钱币中出现了不少联合铸币, 这反映出印塞王国数位君主联合执政的情形。其中, 沃洛奈斯和斯帕拉霍雷斯钱币, 一面为希腊文铭文 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 ΜΕΓΑΛΟΥ ΟΝΩΝΟΥ (王中之王 伟大的 沃洛奈斯), 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 Maharajabhrata Dhramikasa Spalahorasa (大王后裔 正法的 斯帕拉霍雷斯) (见图 9)。^③

除印度—塞克君主发行的钱币外, 1978 年, 阿富汗北部席巴尔干黄金之丘 M4 出土的一枚印度金币 (徽章) 上的佉卢文也值得关注。此金币一面的图案为

① O. Bopearachchi, “New Numismatic Evidence on the Chronology of Late Indo-Greeks and Early Kushans,” 载上海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1, 第 261 页;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Vol. II (London: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2001), p. 2.

② O. Bopearachchi, “Was Indo-Greek Artemidoros the Son of Indo-Scythian Maues?” in *Amluk Dara Hoard Revisited*, *Νομισματικά Χρονικά* 2, 1998, pp. 28 - 34.

③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Vol. IV (London: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2006), p. 4.

走狮，走狮左侧有一个三宝标徽记 (Triratana)，走狮右上方有佉卢文铭文 Sih (o) vigatabhay (o)^① (如狮子般果敢)；另一面的图案为一推一法轮，其旁边有佉卢文铭文 Dharmacakra Pravata (ko) (转法轮者) (见图 10)^②。由图像风格与铭文可知，此金币的打制时间在公元元年前后，打制地点在西北印度地区。^③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佉卢文钱币已经逐渐流布到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地区。



图 8 毛乌斯钱币

资料来源：O. Bope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l. 50, fig. 233。



图 9 沃洛奈斯和斯帕拉霍雷斯钱币

资料来源：O. Bope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l. 51, fig. 241。

① 此处出现“()”是由于金币上的铭文不清楚，学者根据铭文上下文进行补充。
② 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第460、462页。
③ 袁炜：《黄金之丘 (Tillya Tepe) 出土钱币研究——兼论大月氏钱币史》，《中国钱币》2018年第6期，第66页。



图 10 黄金之丘 M4 出土的印度金币

资料来源：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Leningrad, 1985), pp. 185 - 186。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翎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① 当前学界一般认为《汉书·西域传》中作为五翎侯之一的高附翎侯与《后汉书·西域传》中的高附国并非一地，《汉书》中的高附翎侯可能在阿姆河以北的今克里弗 (Kelif)，^② 而《后汉书》中的高附国则是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喀布尔河谷，安息是帕提亚，月氏是贵霜，罽宾是印度—塞克王国。由此可见，上文中《后汉书·西域传》中描述的即为原属于印度—塞克王国的喀布尔河谷，其在公元后被帕提亚人占据，他们建立了印度—帕提亚王国。在公元 60 年前后，贵霜丘就却击败帕提亚人，将喀布尔河谷纳入贵霜版图。从钱币学角度来看，在印度—塞克钱币出现后，接着出现印度—帕提亚钱币，帕提亚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安息。公元前 250 年左右，摆脱了希腊人统治的游牧民族帕提亚，起初在伊朗高原发行希腊文—阿拉美文帕提亚语双语钱币，但此后帕提亚人偏好希腊文化，不但其发行的钱币在很长时间恢复了希腊文单文字，而且在公元前 140 年左右，其发行的钱币上的涉及君主称号的铭文中出现了 ΦΙΛΕΛΛΗΝΟΣ (爱希腊) 一词。^③

①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中华书局，1965，第 2921 页。

② Harry Falk, “The Five Yabghus of the Yuezhi,”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Vol. 28, 2014, p. 33.

③ 杨巨平：《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1 期，第 189 ~ 192 页；D. Sellwood, “Parthian Coins,” in Ehsan Yarshater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9 - 298.

在公元元年至公元 60 年, 印度—帕提亚钱币上的铭文继承了西北印度地区印度—塞克钱币的希腊文—佉卢文双铭文样式, 如贡多法雷斯钱币, 一面为希腊文铭文 ΒΑΣΙΛΕΥΣ ΣΩΤΗΡΟΣ ΥΝΔΟΥΦΕΡΡΟΝ (王 救世主 贡多法雷斯), 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 Maharajasa Gudaphamasa tratarasa (王 贡多法雷斯 救世主) (见图 11), 此外, 在一些贡多法雷斯钱币上还出现了佉卢文 devavrata (天誓) 这一称号。^①

三 佉卢文在贵霜王国、鄯善国及巴克特里亚 钱币中的行用

公元 30 年至 64 年, 贵霜翎侯丘就却攻灭四翎侯, 翻越兴都库什山, 占据犍陀罗等地, 建立贵霜王国。^② 贵霜丘就却仿照印度—希腊君主赫玛攸斯钱币 (见图 12)、印塞王国阿则斯钱币 (见图 13)、罗马帝国钱币 (见图 14) 和印塞总督泽奥尼塞斯钱币 (见图 15) 发行了多种带有佉卢文铭文的钱币。学界研究表明, 丘就却发行的佉卢文钱币的流行区域都在兴都库什山以南, 其中丘就却仿印度—希腊君主赫玛攸斯钱币流行区域在贝格拉姆和塔克西拉, 大王样式钱币流行区域在贝格拉姆、喀布尔和塔克西拉, 戴头盔武士样式钱币流行区域在贝格拉姆和塔克西拉, 盘腿坐君主样式钱币流行区域在塔克西拉。在这些钱币中, 出现了希腊文 ΖΑΟΥΥ、佉卢文 yavugasa/yavug̃sya/yaĩasa/yaüsa, 学界将其比定为中文“翎侯”一词。^③ 牛与骆驼样式钱币流行区域在克什米尔,^④ 此样式钱币也是第一种出现源自汉文化

① O. Bopearache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 267.

② Harry Falk, *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 (Bremen: Hempen Verlag, 2015), pp. 85–88; 余太山:《贵霜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5, 第 26–37 页。

③ Job Cribb, “Kujula Kadphises and His Title Kushan Yavuga,” in Victor H. Mair, ed., *Sino-Platonic Papers*, 2018, p. 12, 参见 [英] 克力勃《丘就却及其贵霜翎侯头衔》, 袁炜译,《吐鲁番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 第 134 页。

④ David Jongeward, Job Cribb,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4), pp. 30–37. 也有学者指出, 丘就却牛与骆驼样式钱币的发现地点在塔克西拉和贝格拉姆, 故将其流行区域归为克什米尔的观点还需要更多资料证明, 参见 Robert Bracey, “The Mint Cities of the Kushan Empire,” in Fernando López Sánchez et al., eds., *The City and the Coin in the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Worlds* (Oxford: Hadrian Books Ltd., 2012), p. 126.

的“天子”（佉卢文为 devaputrasa）一词的钱币。^①由此可见，在丘就却统治贵霜王国时，虽说贵霜王国将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两地统一于一个政治实体中并广泛发行和使用佉卢文钱币，但佉卢文钱币的流布范围依旧仅限于西北印度地区。

《后汉书·西域传》根据班勇的记载，描述了两位贵霜王国君主，一位是贵霜王国开国君主丘就却，学界将其视作佉卢文贵霜王国君主 Kajula Kadphises 的对译；另一位是丘就却之子阎膏珍，学界传统上将其视作佉卢文贵霜王国君主 Vima Kadphises 的对译。^②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阿富汗罗巴塔克碑被发现和释读，这一结论被彻底推翻。从罗巴塔克碑中可以发现，贵霜王国前四代世系父子相承，按丘就却、Vima Takto、Vima Kadphises 和迦膩色迦的顺序排列。^③对于《后汉书·西域传》中的阎膏珍指的无论是 Vima Takto 还是 Vima Kadphises，抑或是将两人的事迹误认为一人的事迹，学界都有极大的争议。在此，我们在研究 Vima Takto 和 Vima Kadphises 佉卢文钱币时尽量不涉及此争议。

Vima Takto 仿照丘就却，继续发行牛与骆驼样式希腊文—佉卢文双语钱币（见图 16）。在同一时期，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也发行仿照这一样式的钱币，即马样式或骆驼样式的汉文—佉卢文双语钱币（简称汉佉二体钱），在此笔者将其铭文逐一罗列。

印塞王国泽奥尼塞斯发行一面为牛、另一面为狮子样式的钱币，其上佉卢文铭文为 Manigulasaputrasa Chartapasa Jihuniasa，意为“Manigula 之子 Chukhsa 州的泽奥尼塞斯”。^④贵霜王国君主丘就却继承了此钱币样式，发行一面为牛、一面为马样式的钱币，其上佉卢文铭文有四种，分别为：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Kuyula Kaphasa（大王 王中之王 丘就却）

maharajasa mahatasa Kushaṇa Kuyula Kaphasa（大王 伟大的 贵霜 丘就却）

① 袁炜：《丘就却王号研究》，《西域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6～11 页。

② [日]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第 193 页；Janos Harmatt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The Development of Sedentary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700B. C. to A. D. 250, Volume II*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1996), pp. 247–249.

③ Harry Falk, *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 (Bremen: Hemen Verlag, 2015), p. 113.

④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Vol. I* (London: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2001), pp. 96–97;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Vol. II* (London: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2001), pp. 121–122.

maharayasa rayarayasa devaputrasa Kuyula Kara Kaphsasa (大王 王中之王
天子 丘就却)

maharayasa rayatirayasa Kuyula Kara Kapasa (大王 王中之王 丘就却)



图 11 贡多法雷斯钱币

资料来源: O. Bope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l. 56, fig. 288。



图 12 丘就却仿印度—希腊君主赫玛攸斯钱币

资料来源: David Jongeward, Job Cribb,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4), pl. 3, fig. 51。

据考证, devaputrasa 一词当为“天子”,^① 这也是中亚希腊化钱币第一次出现汉文化因素。此外, 从这些铭文中也可以看出丘就却发行的钱币仅样式继承了泽奥尼塞斯钱币的特点, 铭文与印塞王国完全无关。

^① 袁炜:《丘就却王号研究》,《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第6~11页。



图 13 丘就却仿阿则斯钱币

资料来源: David Jongeward, Job Cribb,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4), pl. 5, fig. 113。



图 14 丘就却仿罗马帝国钱币

资料来源: David Jongeward, Job Cribb,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4)。

丘就却之子 Vima Takto 继任贵霜王国君主后, 继承了丘就却仿印塞王国泽奥尼塞斯样式钱币, 佉卢文铭文为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devaputrasa Vema Takho (大王 王中之王 天子 威玛 塔克图)。^①

^① David Jongeward, Job Cribb,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4), p. 48.



图 15 丘就却仿泽奥尼塞斯钱币

资料来源: David Jongeward, Job Cribb,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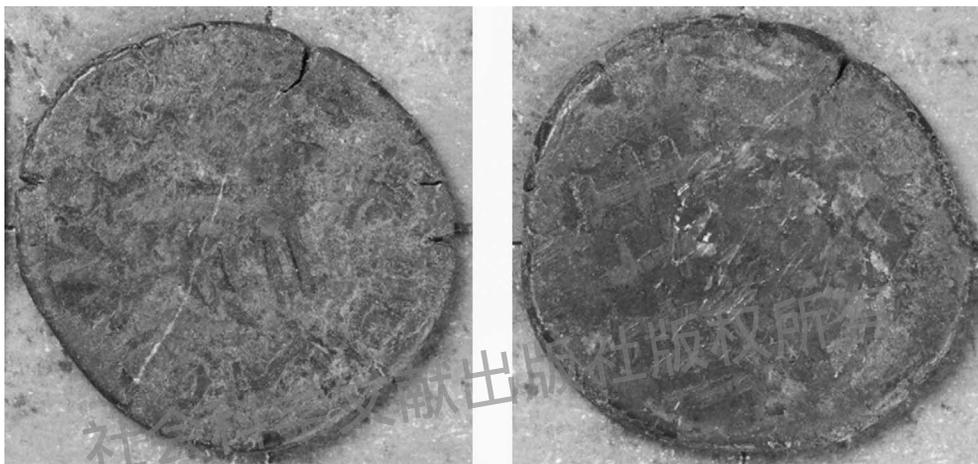
图 16 Vima Takto 牛与骆驼样式钱币

资料来源: David Jongeward, Job Cribb,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4)。

汉佉二体钱 (见图 17) 上的佉卢文铭文有 11 种, 分别为:

- maharaja Yidiraja Gurgadamasa
- maharaja Yitiraja Gurgasa
- maharajass Yidirajasa Gurgamoasa
- maharaja Yitiraja Gurgamoasa
- maharaya Yidiraya Gurgamoya

maharaja Yitiraja Gurgamayasa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Yidirajasa Gurgamoyasa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Yidirajasa Inabasa
 maharajasa rajati□□□^①dogasa
 maharaja□□□sa Panadosana
 maha□□□dosana^②



(a) 汉佉二体钱正面

(b) 汉佉二体钱背面

图 17 汉佉二体钱

资料来源：由甘肃省钱币博物馆提供。

由汉佉二体钱上的佉卢文铭文可知，汉佉二体钱上有 rajatirajasa（王中之王），无 devaputrasa（天子），故认为该钱币发行时，于阗国从属于汉而非贵霜王国。^③ 这里的“王中之王”同前文所言，最早为波斯帕提亚国王，^④ 希腊文写作 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佉卢文的 rājatirāja 虽为国王称号，但与其在波斯、印

① 由于钱币此处磨损严重，学界无法释读，故本文用“□□□”表示，下同。

② Job Cribb, “The Sino-Kharosthi Coins of Khotan: Their Attribution and Relevance to Kushan Chronolog: Part 1,”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Vol. 144, 1984, pp. 128–152; [英] 克力勃:《和田汉佉二体钱》, 姚朔民编译,《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第31~40页。

③ 袁炜:《从汉佉二体钱上佉卢文铭文看于阗国与东汉、贵霜的关系》,《中国钱币》2016年第4期,第3~6页。

④ Sir John Marshall, *Taxila—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Vol. I: Structural Remain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 1975), p. 46; [英] 约翰·马歇尔:《塔克西拉》, 秦立彦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第55、56页。

度指代的内容不同,“意为一国之内王者中力量最大的一个,与疆土面积大小无关”。^① 据《后汉书》和《后汉纪》的记载,公元 90 年,月氏(副)王谢亲领的军队与班超率领的东汉联军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② 汉佉二体钱是那一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最早的含有佉卢文铭文的钱币,表明佉卢文流布到塔里木盆地或许与此事有关,但还缺乏相关的直接证据。除钱币外,从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地区出土的 Dasht-e Nawur 三语铭文可以发现,在公元 104 年 Vima Takto 统治时,佉卢文就已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官方碑铭中使用。^③

在 Vima Kadphises 统治时期,佉卢文钱币的打制范围向北扩展,巴克特里亚开始打制希腊文—佉卢文双语金币,贝格拉姆开始打制希腊文—佉卢文双语铜币,其上的佉卢文铭文为 Maharayasa Rayatirayasa Sarvaloga Isvarasa Mahisvrasa Vima Kadphisa Tratarasa (王 王中之王 世界之主 伟大的主 威玛 伽德菲塞斯 救世主)(见图 18)。^④ 由以上内容可知,佉卢文在巴克特里亚地区流行的时间是 Vima Takto 和 Vima Kadphises 统治时期,这与佉卢文在于阗国流行的时间基本相同。

继丘就却之后,Vima Takto 和 Vima Kadphises 进一步向印度扩张,《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⑤ 《后汉书·西域传》所描述的这些印度“别国”,既有塞种人、帕提亚人在印度次大陆的残存小政权,也有印度本土国家,

-
- ① Kazuo Enoki, “On the So-called Sino-Kharosthi Coins,” *East and West*, Vol. 15, 1965, p. 256; [日] 榎一雄:《论所谓的“汉佉二体钱”》,杨富学、樊丽沙译,载俄军、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货币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第 180 页。
- ②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中华书局,1965,第 1580 页;〔东晋〕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卷十三《孝和皇帝纪上》,中华书局,2002,第 255 页。
- ③ Harry Falk, *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 (Bremen: Hemen Verlag, 2015), pp. 108–109.
- ④ David Jongeward, Job Cribb,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4), pp. 57–62; 杜维善:《贵霜帝国之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 53–55 页。
- ⑤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中华书局,1965,第 2921 页。据《后汉纪》等文献互勘,《后汉书》中的“磐起国”当为“磐越国”,参见董文武《〈后汉纪〉对〈后汉书〉的校勘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 年第 3 期,第 46 页。

其中一些国家发行佉卢文钱币，如印度—塞克政权残余塞种人在今阿富汗南部塞斯坦和印度中索拉什特拉等地建立的西部州政权（Western Kshatrapas），其统治者纳哈帕那（Nahapana）发行了一面为希腊文（讹写），另一面左为佉卢文、右为婆罗米文的三语钱币；印度—帕提亚政权残余势力帕柯雷斯（Pakores）在塞斯坦发行了一面为希腊文，另一面为佉卢文的双语钱币；^① 位于旁遮普地区的印度本土国家 Audumbaras 发行了一面为婆罗米文，另一面为佉卢文的双语钱币；靠近 Audumbaras 的另一印度本土国家 Kunindas 也发行了一面为婆罗米文，另一面为佉卢文的双语钱币。^②



图 18 Vima Kadphises 钱币

资料来源：David Jongeward, Job Cribb,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4), pl. 1, fig. 258。

公元 127 ~ 128 年，贵霜王国迦腻色迦即位，迦腻色迦不再在钱币上打制佉卢文铭文，而仅打制希腊文铭文，并最终转为仅打制巴克特里亚文铭文。^③ 由此，佉卢文铭文钱币的铸行终止。此后，佉卢文对贵霜王国钱币仍有一些影响，如 1908 年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迦腻色迦大塔遗址发掘出土迦腻色迦鎏金青铜圣物盒（见图 19），其上有四行佉卢文铭文、四组神祇塑像，其中一组神祇塑像

① 李铁生编著《古中亚币（前伊斯兰王朝）》，北京出版社，2008，第 129 ~ 132、135、147 页。

② O. Bopearachchi,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p. 47 - 50, 145 - 146.

③ Job Cribb, "The End of Greek Coinage in Bactria and India and Its Evidence for the Kushan Coinage System," in R. Ashton, S. Hunter, eds., *Studies in Greek Numismatics in Memory of Martin Jessop Price* (London: Spink & Son Ltd., 1998), p. 87.

为贵霜王国君主居中，伊朗系神祇日神 Mirro 和月神 Mao 左右护持贵霜王国君主，有学者认为此圣物盒上贵霜王国君主、日神 Mirro 和月神 Mao 与胡维色迦钱币上的相关造型极为相似。^① 这可以说明此圣物盒与贵霜王国钱币之间存在技术、艺术交流，可见，在迦腻色迦至胡维色迦时期，贵霜王国钱币打制工匠依旧与佉卢文密切接触。在贵霜王国后期，一些钱币上出现了单个的佉卢文字母，如迦腻色迦二世发行的一些钱币上有佉卢文字母 vi、瓦西色迦发行的一些钱币上有佉卢文字母 pa、波调二世发行的一些钱币上有佉卢文字母 tra。^② 这些钱币的发行时代在公元 3 世纪 30 年代至公元 3 世纪末，与佉卢文在西北印度流行的最后时代相同。



图 19 迦腻色迦鎏金青铜圣物盒

资料来源: E. Errington,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Dating the ‘Kaniska’ Reliquary,”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ume 8, Kamakura, 2002, p. 116, fig. 1。

- ① E. Errington,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Dating the ‘Kaniska’ Reliquary,”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ume 8, Kamakura, 2002, pp. 101 – 120.
- ② David Jongeward, Job Cribb, *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4), pp. 154, 164, 172.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佉卢文铭文钱币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产生，基本终止于公元2世纪初，最终终止于公元3世纪末。其流布地域包含西北印度、巴克特里亚以及塔里木盆地，其铸行者包含希腊人、塞种人、帕提亚人、印度人、贵霜人和于阗人。这反映了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在中亚及中国新疆地区的交汇与融合情况。

(责任编辑：钱学文 姜颖)

Circulation and Spreading of the Kharosthi Inscription Coins

Yang Fuxue, Yuan Wei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harosthi Inscription Coins,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Kharosthi Inscription Coins was originat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nd century BC, almost stopped in the early of 2nd century AD, and ultimately stopped in the end of 3rd century AD. The circulation and spreading regions contained Northwest India, Bactria and Tarim Basin. Those minters and users contained Greek, Scythian, Parthian, Indian, Kushan and Khotan.

Keywords: Kharosthi; Coins; Inscription

《新丝路学刊》征稿启事

《新丝路学刊》(*Journal of New Silk Road Studies*)创刊于2017年4月,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马丽蓉教授主编,是中国首本专注于“一带一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建构的学术集刊,并因每期刊发高比例专家稿及其卓见而引发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本刊秉承弘扬丝路精神的宗旨,助推百年显学丝路学的发展,在跨学科、多领域中形成问题导向型的研究范式,聚焦打造“一带一路”、丝绸之路、丝路学三个栏目,展开“一带一路”政策解读、丝路历史人文研究及中国丝路学理论体系建构,将丝路学研究的静态学术资源盘活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动态现实资源,以期为“一带一路”提供扎实且全面的学理支撑。

本刊聚焦三大栏目,包括:

一、“一带一路”研究:“一带一路”政策解读、现实洞察及理论研究。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别与区域研究、“一带一路”沿线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一带一路”的“五通”案例研究、“一带一路”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一带一路”与国际体系转型、国际关系变革、全球治理等理论探讨等,旨在对“一带一路”做出客观、全面、学理性的阐释。

二、丝绸之路研究:通过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丝路历史、文化、考古、国际关系、政治制度、经贸往来、社会治理、人文交流,以及“中国与世界丝路古今关系”等议题,旨在彰显中华文明在丝路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贡献。

三、丝路学研究:梳理中、欧、美丝路学派,日、韩、俄研究重镇,以及其他国家的丝路学研究历史与现状,重点关注名家经典论著、丝路学派流变、丝路研究的学术动态、丝路学术共同体构建及丝路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议题,旨在为中国丝路学振兴提供全球研究视野与国际学术语境。

本刊年度推荐选题包括：

一、“一带一路”研究：共建“一带一路”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作用研究；国际组织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研究；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研究；“一带一路”品牌传播和海外舆情监测应对研究；“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风险评估等。

二、丝绸之路研究：历史上的丝路外交与新中国人民外交、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同构性案例研究；“海丝”与“陆丝”的异同案例研究；朝贡制度与睦邻友好政策的关联性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献案例研究等。

三、丝路学研究：中、欧、美、日、韩、俄丝路学派研究；全球知名智库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报告译介分析；丝路学术共同体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丝路学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及学科体系研究；丝路学中外学术史研究等。

本刊欢迎海内外学界同仁踊跃赐稿，敬请关注以下投稿须知：

一、来稿应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选题、观点、材料、方法新颖，内容充实，论证严谨。

二、论文字数不少于1.8万字。来稿除正文外，还应包括内容提要（300~500字）、关键词（3~5个）、作者简介（注明工作或学习单位、职务职称、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请在文末附上文章题目、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的英语译文。

三、来稿中所有引文引证的观点，请以脚注形式注明出处。引用报刊资料请注明作者、文章标题、刊名、刊期、页码；引用书籍资料请注明责任者、责任方式、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引用互联网资料请注明作者、文献名、下载网址和下载时间。外文书刊注释标注可遵循国际惯例。

四、来稿文责自负，但本刊有删改权，如不同意，来稿时请予以注明。

五、切勿一稿多投，一旦发现，本刊将予以追究。若投稿三个月内未接到编辑部通知，可对稿件自行处理。未经采用的稿件恕不退还。

投稿邮箱：nsrjournal@163.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550号《新丝路学刊》编辑部

邮 政 编 码: 200083

网 址: <http://www.isrss.shisu.edu.cn/>

微信公众号: 上外丝路

电 话: 021 - 3537627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丝路学刊. 总第10期/马丽蓉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9
ISBN 978-7-5201-7226-4

I. ①新… II. ①马… III. ①“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丛刊 ②丝绸之路-丛刊 IV. ①F125-55
②K928.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63710号

新丝路学刊 (总第10期)

主 编 / 马丽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组稿编辑 / 高明秀

责任编辑 / 许玉燕

文稿编辑 / 王春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别区域分社(010)59367078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58千字

版 次 / 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7226-4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丝路学刊》总目录

总第 1 期

• 特稿 •

- “一带一路”与中东地区治理吴思科/ 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三大经济走廊道路的考察潘志平/ 12

• 话题聚焦：“一带一路”与中外交流与合作 •

- “一带一路”与中沙战略合作的机遇和挑战吴冰冰/ 25
“一带一路”与非洲工业化——以中埃经贸合作区和亚吉铁路为例毕健康/ 37
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精神联系：历史与想象咎涛/ 50
“一带一路”下中国—伊合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侯宇翔/ 77
“一带一路”与中国巴基斯坦人文交流闵捷/ 94

• 其他 •

- 爱国宗教人士马良骏“和”的思想及其实践研究马晓娟/ 108
“洪汉英工作室”与内地少数民族大学生培养模式苏闻宇 关琳子/ 124
上海自贸区对接“一带一路”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实践王畅/ 138

总第 2 期

• 特稿 •

- “一带一路”助推“全球化”前进杨福昌/ 1
“一带一路”：再造中国，再造世界王义桅/ 9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海合会的经济合作安瓦尔·尤素福·艾勒·阿卜杜拉/ 33
“一带一路”与外语战略人才培养曹德明/ 42

• 区域国别问题研究 •

- 融媒体时代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刘欣路/ 60
委内瑞拉“查韦斯主义”的兴起及其现实影响周楠/ 72
中亚丝路绿洲商道溯源桂宝丽/ 86
历史视域下草原丝路经贸与人文交流合作曹盟 马晓娟/ 103

• 丝路学研究 •

国内“一带一路”研究的基本特点及分析杨 恕/ 120
全球丝路学派比较研究马丽蓉/ 132

总第 3 期

• 特稿 •

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刘迎胜/ 1
关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若干思考[巴基斯坦]纳杰姆丁·谢赫/ 10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全球化主张王健: 25

• 区域国别问题研究 •

“一带一路”背景下以色列智库研究杨 阳/ 39
越南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舆情分析冯 超/ 62
国家安全视域下的泰南穆斯林双语教育研究朱 蒙/ 80
欧洲穆斯林难民政策研究——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例赵 阳/ 94
希腊外国移民生存现状分析——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王 群/ 113

• 丝路学研究 •

“一带一路”、“丝路学”与区域研究晁 涛/ 134
论英国人在中国新疆的探察活动——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
.....艾买提江·阿布力米提/ 144
“丝路学·国际论坛”(2017·上海)会议综述162

总第 4 期

• 特稿 •

“一带一路”建设五周年：回顾与展望王文 刘典/ 1

• “一带一路”研究 •

“双重身份”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杨恕 王术森/ 39
土耳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评估许培源/ 48

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看中巴关系及其前瞻	王 南/ 65
“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季风计划”对接的文化合作路径探索	[印]郎荣吉/ 84
穆斯林移民融入西欧国家的困境和融合模式	虞卫东/ 96
冷战时期泛亚铁路建设实证分析	[希]阿娜斯塔西娅杜·艾琳/ 109

• 丝路学研究 •

丝路宗教交融：入华景教对摩尼教的吸取与借鉴	杨富学 盖佳择/ 125
关于陈寅恪的敦煌学研究	刘克敌/ 139
历史上中国农耕区与北方草原间的和亲人文效应评析	马晓娟/ 151
第二届“丝路学·青年论坛”（2017·上海）会议综述	162

总第 5 期

• 特稿 •

“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贾文山/ 1
-------------------------------	--------

• “一带一路”研究 •

中印关系发展意义、现状及其影响	胡志勇/ 16
“一带一路”的安全与经济：三国案例研究	[美]亨瑞克·浩格林 理查德·吉亚斯/ 32
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苏娟 张丽/ 45
智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法律对中国的启示	周 杰/ 62

• 丝路学研究 •

典籍互译对中俄人文交流的影响研究	宁琦 李明滨/ 76
古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伊朗的商贸交流	[美]詹姆希·乔克希/ 89
大谷光瑞与日本敦煌学	修斌 陈琳琳/ 104
“苏哈尔号”远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影响分析	马和斌/ 117
乡约制度多重功能探析：以新疆乡村治理为例（1884~1911）	赵丽君/ 132
第二届“丝路学·国际论坛”会议综述	145

总第 6 期

• 特稿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亚非国家合作的基于、挑战及应对吴思科/ 1

• “一带一路” 研究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埃及产能合作的主要成就及面临的问题马晓霖 闫兵/ 11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以色列的人文交流郭白歌/ 24

• 国别与区域研究 •

美国大都市劳动力市场拉丁裔创业的多维度研究王清芳/ 39

当代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于漫/ 56

坦桑尼亚新型华人社区的社会互动：以“S”社区为例马骏/ 75

• 丝路学研究 •

文化维度理论下的阿拉伯固有文化特征研究肖凌/ 89

缅甸“罗兴亚人”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分析熊顺清 吴金光/ 103

英国殖民时期马来亚法制的近代化研究张榕/ 116

总第 7 期

• 特稿 •

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的转型：基于明代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万明/ 1

• 丝路历史文化 •

马可·波罗足迹考：从伊朗起儿漫到忽鲁模思的往返路线
.....[伊朗]穆罕默德·博格尔·乌苏吉/ 17

历史视域下的伊朗文化构建程彤/ 30

18 世纪东南亚高地傣掸民族政权与政治生态案例分析张宁/ 42

•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

“一带一路” 框架下中国—伊朗经济合作与伙伴关系构建杨力任嘉/ 59

沙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以《利雅得报》为例刘欣路 范帅帅/ 75

伊朗水资源危机对其国家安全的影响评估王诚/ 94

• 丝路学研究 •

构建一带一路学：中国丝路学振兴的切实之举 马丽蓉 王文/ 109

总第 8 期

• 特稿 •

“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新模式研究：以清华大学“丝路大篷车课堂”为例 李希光/ 1

• 丝路沿线国别问题研究 •

卡塔尔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素研究 吴冰冰/ 22

社会责任与共建“中老经济走廊”的案例研究 钮菊生 任珂瑶/ 36

英国穆斯林难民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其治理研究 赵 阳/ 51

•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研究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拉美人文交流与合作案例研究 马丽蓉 凌晓逸/ 7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人文交流与合作研究 温智宏/ 107

• 丝路学研究 •

元代传入中国的波斯阿拉伯语典籍——从《秘书监志》中的“回回书籍”说起
..... 王一丹/ 135

元明清时期东北亚丝绸之路考论 王禹浪 王天姿/ 148

总第 9 期

• 特稿 •

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壮举：再论杨良瑶的聘使大食 荣新江/ 1

• “一带一路”研究 •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案例研究：以“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为例 李鼎鑫/ 15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人文交流合作案例研究 马丽蓉 蒋蓝辉/ 26

以色列中长期发展战略解析 虞卫东/ 59

伊斯兰合作组织转型新解 刘世吾/ 83

· 丝路学研究 ·

东北亚丝绸之路金上京研究综述	王天姿/ 102
从历代正史民族关系微观视角看内地人士经略西域之得失	马晓娟/ 116
丝路伙伴关系研究：理论与实践	王 畅/ 132

总第 10 期

· 特稿 ·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历史、现状与展望	杨福昌/ 1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发展的挑战	姜 锋/ 15

· “一带一路” 研究 ·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以色列经贸合作案例研究	陈广猛 于忠西/ 26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框架内的铁路合作及其意义	王 南/ 5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建设性参与阿富汗社会重建研究	闵 捷/ 69

· 丝路学研究 ·

波斯文化典籍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 [荷兰]阿里阿斯噶尔·赛义德古拉卜/ 84	
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刘 晨/ 94
丝路沿线佉卢文铭文钱币考述	杨富学 袁 炜/ 121